



庆阳党史系列丛书

战地黄花

红色女性在陇东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主编
谷凌云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庆阳党史系列丛书



战地黄花

红色女性在陇东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主编
谷凌云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黄花:红色女性在陇东/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98-1662-2

I. ①战… II. ①中… III.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360 号

责任编辑:王鸽子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190千字

印 张:12 2面前插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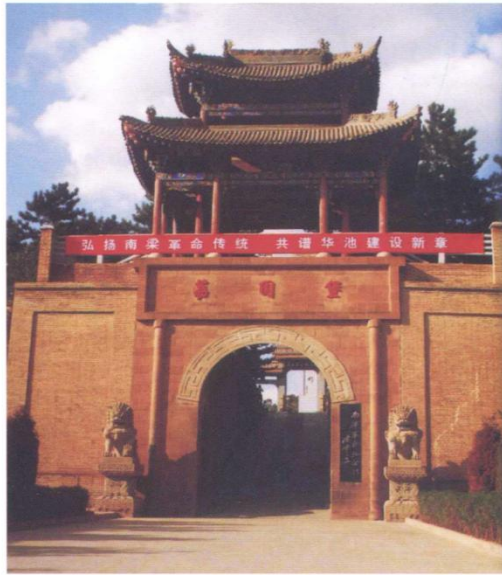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98-1662-2

定 价:36.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3072533



南昌革命纪念馆



南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葛园堡



2007年，部分革命后代在庆阳合影留念



2007年，部分革命后代在南梁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合影留念

永远的山丹丹（代序）

庆阳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是原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围剿”，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后来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地域广阔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对于保存和发展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和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成为党指挥抗日战争的重要政治中心和领导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

80年过去了，战争的烽烟已经散尽，建设的热潮处处涌动。穿越时光的隧道，拨开历史的烟云，当我们重新回首那段艰苦卓绝的光辉岁月时，会发现在那些高大的背影之后，有一些文静柔弱的身躯，像一簇簇绚烂的山丹花，深深地扎根于黄土，栉风沐雨，傲雪历霜，顽强不屈，摇曳生姿，永远盛开在陇东这片红色热土上。

她们是崇高理想的播种者，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她们告别宁静的校园，放弃平静的生活，毅然决然地走向血与火的战场，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彪炳史册的壮歌。

她们是妇女解放的先行者，她们冲破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以我为旗，奔走呼吁，唤醒了千百万劳动妇女，在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们是理想信念的坚守者，她们苦苦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默默忍受了关牛棚、遭批斗、蹲监狱的运动冲击，“虽九死其犹未悔”，

依然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上，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妇女儿童、外交等各条战线上作出了非凡的成就和卓越的贡献。

解读她们的奋斗史和心灵史，可以深刻感知一个民族颠仆前行的曲折轨迹，追溯一个政党发展壮大的苦难和辉煌，激发更多后来者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信心。她们的崇局风范是老区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和最可贵的精神财富，是照亮我们前行的火把，更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

加强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历史的研究，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是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战地黄花》一书的作者历时数年，耗费心血，收集研磨史料，走访那些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战斗和生活过的一辈女革命家及其家属，用传记的体例、翔实的史料、细腻的珍贵的照片，全景式地描摹和再现了那一代知识女性在陇东大地上群像和生活长卷，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材。书中胃的历史细节，叙事写人通俗流畅，行文融史、情、景于一体，有胃可读性和感染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战地黄花》一书、付梓刊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与思考，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历史的研究中来精品力作，结出丰硕成果。

2011 年 6 月

目录

永远的山丹丹（代序）

蔡畅：领导庆阳女性奋起抗争的妇女领袖·····	1
张景文：第一位到南梁苏区的女知识分子·····	15
高敏珍：陕甘边区首位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	24
邱一涵：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长·····	34
罗培兰：搭起中央红军与陕甘苏区桥梁的女信使·····	42
尤祥斋：被谢子长称为“知己难遇”的女革命家·····	51
马奎宣：革命“红娘”·····	59
同桂荣：永远贴心的刘嫂子·····	66
张子芳：从苦难中走出的西北妇女领袖·····	72
齐心：情系陇东的党的好干部·····	80
王克然：抗大七分校的女指导员·····	90
李春霖：“马青天”身边的伟大女性·····	98
袁静：把“刘巧儿”介绍给世界的艺术家·····	107
崔兰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14
波涛：庆阳第一位外出求学的“女秀才”·····	125
赵兰香：凤城走出来的大使夫人·····	131
李建彤：德艺双馨的边区女音乐家·····	140
张月英：一心为党的女干部·····	146
陈文珍：陇东中学女先生·····	148
刘文英：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大家闺秀·····	151

李叶：享誉陕甘宁的陇东“女侠”	157
封芝琴：“刘巧儿”原型	164
田书云等：休言女子何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178
写在后面的话	186

领导庆阳女性奋起抗争的妇女领袖

——蔡畅

蔡畅（1900—1990），原名蔡咸熙，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妇女委员和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省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省苏维埃政府委员，陕甘宁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庆阳中心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兼东北局妇委书记，中国第一位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新中国第一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委第一书记，全国妇联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七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蔡畅 1900 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双峰）县一个败落的家庭。父亲蔡蓉峰靠分得一份祖产维持生计，由于不善于经营，家庭逐渐衰落。母亲葛健豪是位封建家庭里的女豪杰，她出身于清朝官吏家庭，既心细如丝又知书达理，既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具有阳刚豪爽之气。她深受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的影响，渴望男女平等、自由，渴望妇女得到根本解放。她非常欣赏秋瑾的“画龙须画云中龙，为人须为人中雄。豪杰羞伍草木腐，怀抱岂与长人同？”常用此诗激励自己、勉励儿女，希望自己的子女胸怀大志，为国为民。幸有这样一位品格高洁、性格豪爽的伟大母亲，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现了蔡和森、蔡畅两位著名革命家，两位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优秀党员和卓越领导人。

蔡畅是葛健豪最小的女儿，幼时非常聪慧，长相乖巧，性格开朗，在家又一直跟随母亲读书习文，很是讨人喜欢；15 岁时已经出落楚楚动人，求上门来下聘礼的人络绎不绝。父亲蔡蓉峰为了得到 500 块

银圆的聘礼，将不满 15 岁的小女儿卖给当地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家做小媳妇（小妾）。母亲坚决反对，但父亲为财而坚持己见。葛健豪愤而离家，并决然带着女儿离开故土来到长沙，与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三儿子蔡和森住在一起。她们在长沙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租下一座老宅，老宅的正门楣上方悬挂着一幅“沕痴寄庐”的横匾，因年代已久，横匾所书的典故无从考证。只知“沕”为沕水，是湘江的支流。也许这座老宅是沕水之滨一些痴迷诗文的书生们隐居结社的地方吧。老宅前有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枫树及几棵苦楝子树，环境极其幽静，母子三人就在此定居下来。

1916 年夏，蔡畅在蔡和森的帮助下考进了周南女校音乐体育科学习，蔡和森又帮助母亲联系好长沙女子教员养成所，葛健豪开始了读书生涯。1917 年 6 月，蔡畅从周南女校音乐体育科毕业后，留校当体育教员，每月工资 8 元。葛健豪此时也已毕业。其间，大姐蔡庆熙也带着女儿奔母亲而来，蔡庆熙在自治女校学习刺绣，庆熙的女儿刘昂读小学。一家就靠蔡畅的工资和典当母亲的一些首饰勉强维持生计。当时蔡和森已经从高等师范文科毕业，准备考专科，暂时没有从事社会工作。

虽然家里生活拮据，但知书达理的葛健豪的家里经常成为儿子蔡和森和毛泽东等同学聚会的地方。他们经常在此促膝长谈，纵论天下大事，抒发爱国情怀，葛健豪经常供他们饭食。“沕痴寄庐”的几间屋子里经常挤满了人，这些进步青年有：罗学瓚、张昆弟、何叔衡、萧子升、萧三、陈章甫等，他们博学善思，研究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蔡畅经常坐在他们身边，是一位忠实的旁听者，也由此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当时的“沕痴寄庐”旧宅，不单单是进步青年的聚会地，毛泽东的母亲文老太身体不好，从韶山冲来看病，也住了进来。葛健豪用卖

掉首饰的钱，把医生请到家里为文老太太诊病、做饭、煎药。老太太非常感激葛健豪，更喜欢聪明、漂亮的蔡畅，亲昵地叫她“毛妹子”蔡畅“毛妹子”的这个称号，就此诞生了。

当时的湖南，是北洋军阀与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争夺的要地，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在酝酿组织新民学会。

1918年春，毛泽东回湘潭度寒假。不久，与蔡和森到洞庭湖滨游览。其间，他们详细商谈了新民学会的方针。4月17日，由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在蔡和森的家中举行了成立大会，“沔痴寄庐”为中国革命史记录下了这光辉的一页。蔡畅虽然只是一个大会议程的旁听者，但她与母亲、姐姐为这一重要会议做了后勤保障工作，为这些热血青年做饭送水。虽然蔡畅还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但在她少女的心中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火苗也一天比一天燃烧得更旺。葛健豪的家成了革命问题的讨论中心，蔡畅接触到了很多进步思想和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当时这些刊物都旗帜鲜明地宣扬反封建、反军阀、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及出国勤工俭学运动之类的新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她们母女。她们也义无反顾地追随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等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之路。

1918年6月，蔡和森代表新民学会赴北京，通过杨昌济先生落实向外发展的切实可能性。蔡和森设想在3年之内使新民学会成为中国之中心点，而且带动女界同时进步，蔡畅是蔡和森革命理想的实践者和得益者。1919年5月蔡畅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不久，当蔡和森和萧子升弄清了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的途径后，蔡畅就积极投入到了这一工作中，她与向警予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她们一家也决定赴法留学。10月，蔡畅与母亲葛健豪、向警予离开长沙到上海。12月25日与蔡和森、徐特立等一行人，从上海杨树浦

码头起程赴法国，毛泽东到港口为这第一批留学生送行。这次留法学生中共有6名女性，即：葛健豪、向警予、熊季光、李志新、萧淑良、蔡畅。到达法国后，他们由华法教育会负责分配到蒙达尼，之后，分别入男女中学学习，从此开始了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旅途。



1949年9月，蔡畅（左）和邓颖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席上

蔡和森到达蒙达尼后稍加休息，就埋头刻苦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他在北京期间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密切的联系，还参加了李大钊指导的少年中国学习会。这次到法国，他是为了更仔细地研究

和研究认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社会非常混乱，形形色色的党派、思潮、主义，令人眼花缭乱。所以，一踏上法国的土地，蔡和森就开始翻译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为国内的革命青年，提供学习马列主义的便利条件。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走苏联武装革命的道路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每有哥哥的演说，妹妹就会积极发动同学去听。所有这一切，就像一盏明灯，为艰辛的海外求学者照亮了路途，留学生们都非常敬仰他们兄妹。很快，蔡家在巴黎又成了“浣痴寄庐”，常常聚集着许多青年人，为鼓励留学生的士气、宣传革命道理创造了重要条件。当蔡和森基本掌握了马列原理后，就立即与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与赵世炎、李立三、向警予、蔡畅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统一领导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部

分华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那时候，勤工俭学者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月只能拿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发给的 10 法郎生活费，后来这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也停发了，学生们只有靠做工挣钱维持生计。德高望重的葛健豪便成了留学生们共同的“女妈”，大家都喜欢到蔡家聚会，一方面可以听到蔡和森的演说；另一方面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和蔼的蔡伯母总是千方百计做好吃的湖南菜来招待学生们。来蔡家聚会的同学中，邓小平当时年龄最小也最活泼，李富春更是蔡和森忠实的追随者和其主义的执行者。

李富春自幼学习用功，酷爱史书，对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人十分仰慕，中学时就积极参加查抄日货、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参加了五四运动，于 1919 年 10 月 31 日先一步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他系统地研读了蔡和森翻译的马列著作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刊，受益颇深。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一边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和宣传，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谴责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揭露资本主义对华工的残酷奴役和压榨。在与蔡和森接触后，李富春与李维汉、罗学瓚、萧三等彻底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转为共产主义战士。其间，李富春和蔡畅有了较多的接触，因蔡畅比李富春大 8 天，李富春称她姐姐。不料，这一称呼就一直伴随了他们一生。这个称呼后来也成了蔡畅的代名词，上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下至普通群众，不分年龄、性别均这样亲切地称呼她，使她成了大家的“大姐”。

在法国的蔡和森没有与国内坚持斗争的毛泽东中断联系，在互通信息、探讨马列主义在中国如何实践的同时，蔡和森提出了“社会主义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明确指出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由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外的积极组织、广泛宣传和毛泽东等人在国内的大力呼吁，中国国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勤工俭学运动高潮，

出国人数直线上升，远远超出了当时预料的范围，使腐败的北洋政府措手不及。大量的学生涌向法国，致使找工作非常困难，华法会地方较小，容纳不了多少人，好多人只好暂时搭棚睡地。这样就给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造成了钻空子的机会。李石曾、吴稚晖等机会分子想拢络一批青年，凡有可能工作的地方，受马列主义影响的青年就无法得到。1920年8月，在“工学励进会”的基础上，以部分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和核心，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的社会主义性质青年团体——“工学世界社”。1921年2月27日，“工学世界社”在巴黎召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决定号召在巴黎及附近工读的学生，第二天去驻法公使馆请愿。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向驻法公使馆请愿，这就是“二八运动”。运动中，蔡畅、向警予等几位女同学走在队伍的前列，她们不畏强暴的精神，给女同学大长威风。这次游行虽然被警察冲散，但他们攻进了公使馆，给国内学生运动增加了勇气，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他们的口号“要读书权，要面包权”，很长一段时间响彻在法国的上空。

经过运动的洗礼，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开始分化。学生分化之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在不断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同时，在蒙丹尼召开大会，研究怎样救中国的问题。会上“无政府主义救中国”、“教育救中国”、“实业救中国”、“富国强兵救中国”等思想全摆了出来，但蔡和森始终认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蔡畅坚决拥护蔡和森的主张。

1921年9月，继“二八运动”之后，蔡和森等人又发起了“占领中法大学”的运动。中法大学是1920年驻法中国政府当局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问题的名义，发起募捐运动筹款而办起来的。学校成立后准许入学的学生都是李石曾从国内另招收

的学生，大批学生找到中国驻法当局，他们推脱说是华法教育会的事，政府与教育会相互推倭，对于这种恶劣做法，勤工俭学学生义愤填膺，认为除了直接行动外，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场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爆发了。9月20日，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组织了100多人的入校先锋队，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率领，从巴黎赶到里昂，浩浩荡荡直奔里昂大学。21日早晨先锋队抵达后，里昂大学看门人不让进。他们勇敢地冲了进去，占领住房。但是，驻法公使陈篆勾结法国反动当局，给学生强加“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由法国警察把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勤工俭学学生强行押上囚车，关进里昂炮台监狱。这次运动显示了中国学生的威力，惊动了法国政府，他们把占领中法大学的110名学生中的104人押送回国，蔡和森、陈毅、李立三、蔡畅，就是这104人中的骨干人物。不久向警予回国，与蔡和森一起工作。

几次斗争的失败，对青年学生的触动非常大，蔡畅、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聂荣臻等一批有志青年在那里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蔡畅不但领导一个学习小组，还参与编办《少年》刊物（法文版），邓小平、李畅英刻蜡版，李富春发行。1923年初，党中央批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作为支部骨干成员，蔡畅与李富春一起积极组织华工会、俱乐部、补习学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共同的革命事业中，蔡畅与李富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之彼此相敬、相爱。葛健豪也非常喜欢这个为人诚实、踏实肯干的小伙子。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在塞纳河畔一家浪漫的法国酒吧里，碰杯结为百年良缘，在场的只有邓小平。从此，这两位革命先驱走上了并肩奋斗的历程。

1924年4月25日，李特特在巴黎降生。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和

学习，蔡畅果断地做了结扎手术。这果敢的举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无疑是中国妇女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向世界显示了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法国的学习和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除了党的其他工作外，大家轮流当刊物编辑。邓小平、李富春等白天为生活而工作奔波，晚上抓紧时间搞党的工作。白色恐怖一天天加剧，为了保存党的实力，1924 年夏，党组织决定将工作转入地下，将留法学生里党的骨干分两部分：一部分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提高文化素养和吸取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另一部分回国继续做党的工作。蔡畅、李富春等人去苏联学习，母亲葛健豪带他们的女儿李特特回国。

1925 年 8 月，为了国内革命工作需要，蔡畅转道蒙古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在白色恐怖之下，奠定了我党在南方妇女工作的基础，为开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27 年，蔡畅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北伐军到南昌后，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任妇女部长。这个时期，作为共产党女界高层干部的蔡畅，成了北洋政府的眼中钉，他们时刻给她施加压力，制造障碍，迫使她的工作阻力重重，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纠集大地主和土豪劣绅，恣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还未掌握强大的军队和财政，革命斗争举步维艰，党的工作只得转入地下。“国人何时觉醒？”从南昌转入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蔡畅大声发问。到上海后，蔡畅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和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长，她领导了上海纱厂大罢工，指导妇女积极从事革命斗争，为争取女权孜孜不倦，呕心沥血。

1932 年，为了加强革命根据地工作，蔡畅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江西。这时期，国内革命斗争极其复杂，通讯落后，共产党人行动受限。她从上海由香港绕道赴瑞金，此时才知道自己尊敬的兄长，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蔡和森，于1931年3月在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时，被叛徒出卖，6月5日参加一个海员工会会议时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后引渡到广州，年底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蔡和森身患严重的肺病，但他任劳任怨，为革命勤恳工作，直到牺牲；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只有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他的牺牲使蔡畅不但失去了好兄长、好战友，党也失去了一名优秀领导者。蔡和森是蔡畅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蔡和森的牺牲，使蔡畅的革命斗志更加坚强。

蔡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教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苏维埃政府委员。当革命事业受挫、中央决定长征时，蔡畅毅然决定跟随红军长征。在为数不多的女同志中，她表现得极为坚强勇敢，人们称她“铁女人”。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旗（吴起）镇，历时一年，疲惫交加，伤痕累累，她顾不得休息，就积极投入到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又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确定了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和任务，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撤销了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西省，随之陕甘宁省成立。蔡畅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统战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长。

1936年12月底，她同红二、四方面军教导师到庆阳驻防，担任庆阳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庆阳县抗日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她关心

广大群众的疾苦，特别同情受压迫的贫苦妇女们的生活。发动妇女开展反封建、求解放、争自由的革命斗争；她鼓励她们、引导她们，冲破封建枷锁，摒弃封建家庭旧习，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独立，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实行男女平等。她从实际出发，给庆阳第一届高小毕业的4位女同学赵兰香、边兰英、樊惠兰、贺惠英大办毕业典礼，并引导她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她积极扩充庆阳第一所女子高校的师资力量，办识字班、夜校，动员妇女上学识字，让她们参加到抗日民众运动中来；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化装成商人等，在教导旅干部战士的配合和掩护下走访群众，以拉家常之便，给广大妇女宣传革命道理，使许多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到县妇女委员会主办的编织厂、鞋厂，参加救亡会，甚至一些妇女还跟着红军女战士到大街小巷刷写“西北妇女站起来”、“动员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而奋斗”、“不当亡国奴”等标语，使妇女开始关心天下大事；她引导和培养了庆阳第一位“女才子”——波涛。1937年3月8日，她主持举行了庆阳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千余人，妇女就有200多名，三八五旅的首长和战士们也都参加了大会。会上，蔡畅详细地阐述了“三八节”的来历，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砸碎封建枷锁的束缚，争取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和压迫妇女的行为，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缠足；号召妇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天下大事。她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与会的许多妇女激动不已，纷纷说“蔡首长讲出了我们妇女的心里话”，使几千年来备受封建压迫的西北偏远山区的妇女从此扬眉吐气，很多女性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边区妇女解放积极努力工作。她领导贫苦人民，打恶霸、斗地主，翻身闹革命。庆阳城有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殷实家之说。人称冯大绅士的冯翊清居八大家之首，财广势重，其弟又是国民党甘肃省驻北京参议员，国民党庆阳县大小官员都护着他，拍他的马屁。他生活糜烂，欺压百

姓，远近闻名。蔡畅在庆阳领导了著名的反冯灭霸斗争。她根据群众的揭发和深入调查之后，果断做出拘捕冯翊清及其恶子冯渠、冯棠等决定，在街头公开组织群众揭发批判，宣布冯氏父子六大罪状。群众揭发信件雪片般飞往红军教导师和庆阳县民众指导委员会，虽然此斗争遭到国民政府的处处刁难，但在蔡畅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强大声势下，冯翊清终以鲸吞赈款、勾结土匪、鱼肉乡民等罪，被判处徒刑 15 年。反冯斗争的胜利，给予了封建地主阶级一个沉重的打击，革命群众志气大长，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为抗日救国、发动群众做出了很好的范例。

蔡畅虽然在庆阳只工作了短短 9 个月，但她的美名却扎下了根，至今庆阳人民还传颂着有关她的许多故事。

1937 年 7 月，蔡畅调人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长。她发动边区妇女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中来，为前线将士纺线、缝衣、做军鞋、送军粮。不久，她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科科长。艰辛而繁重的工作使这位女革命家积劳成疾。1938 年 3 月，她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团办的学习班学习和养病。虽然身患重病，但她始终牢记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神圣的责任和使命。其间，一次在莫斯科郊区，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讨论关于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像列宁那样的伟大领袖的电影讨论会上，在众说纷纭的迷茫中，她霍然起身，为赞扬毛泽东、批判王明而慷慨陈词。



蔡畅

那高亢的声调、有力的手势、端庄的仪表、高雅的气质、炯炯有神的目光，据理雄辩，令在场者无不心悦诚服。

在国外，她不仅工作十分努力而且还十分关心同志和在国外学习的孩子们。对烈士的后代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关心，有些烈士的后



1949年，蔡畅在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蔡畅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代就是她抚养长大的。为了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他们夫妇总是节衣缩食，把当时政府补助给她（病号）的一点营养品都留给孩子们，工作再忙再累，孩子们的衣服总是她亲手洗涮缝补。在苏联每逢周末，儿童院总少不了她的身影，亲亲这个，抱抱那个，以一颗博大的爱心，温暖着远离父母或者父母早已牺牲了的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但她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却十分严格，李特特曾这样对媒体说：每当母亲在孩子们中间幸福地微笑，亲亲这个，抱抱那个，我总是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心中充满了苦涩与酸楚，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伴随我的是母亲的严厉和孤独的环境，我还不满4岁，就随母亲在白区住“机关”，几乎每一天都是在危险中度过的，已经7岁多了，还不能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我总是在心中一遍一遍地默念着“妈妈，你为什么就不能亲亲我，抱抱我呢！”特特只能远远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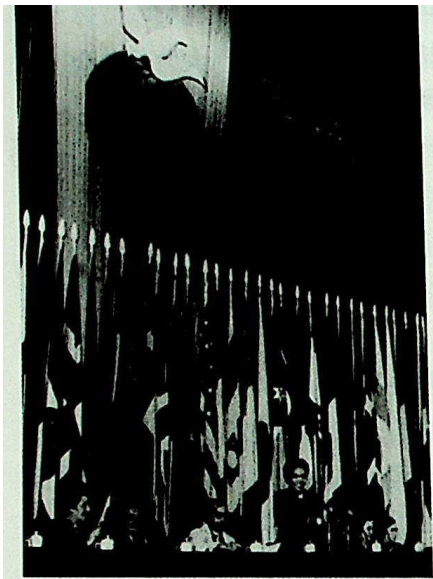
1940年5月，蔡畅回国，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兼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这时，党内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斗争激烈，干部损失严重。她的回国，无疑给党的正确路线的实施以极大的帮助。1955年，党内清除了错误路线的干扰，9月，蔡畅接替了王明在党内的职务，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代理书记，她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始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用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45年，蔡畅任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用血的代价，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还没等喘口气，又进入了内战阶段，国民党反动派肆无忌惮地对解放区发起了猛烈地进攻。为挽救胜利果实，使广大劳苦大众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共产党人又投入到了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中。四年里，共产党人不惜用生命和鲜血，换得了和平。1946年，蔡畅赴东北解放区，任中共中央妇女书记兼东北局妇委书记。她在女界工作的卓著成绩，受到了世界女界的关注。1946年，蔡畅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执行委员，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为求得全世界劳动妇女早日得解放，她呕心沥血，忘我工作。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蔡畅主持召开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之后，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委第一书记，全国妇联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蔡畅长期担任党内高级领导职务，与丈夫李富春经常双双出席中央会议。李富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除了分管经济、计划外，还分管青联、妇联工作。工作中有了上下级别关系，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妻子，积极支持蔡畅的工作，更加重视、关心妇女儿童问题。蔡畅长期掌管“半边天”，外事活动频繁，媒体报道多，知名度比李富春还高，但她处处尊重丈夫的意见，在家中仍无微不至地尽着妻子的责任。他们尊重高层领导间的秘密，互不插手对方的工作，从不翻阅彼此的机密文件，每每家中有人来谈公事，对方总会自觉回避。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形势十分严峻，恶性事件愈演愈烈。他们肩上的担子更重，加之长期从事人民解放工作，积劳成疾，多种

慢性疾病接踵而来，失眠、头痛等疾病长期困扰着蔡畅的健康，但她仍然顽强地工作。1967年2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争执激烈，剑拔弩张。



1956年，蔡畅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上致词

李富春与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同志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倒行逆施行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李富春被冠以“二月逆流黑干将”之罪名，受到横加迫害，就连国务院几位副总理来李家商议工作，也被诬蔑为开“黑会”，并把李家视为“黑俱乐部”。被夺了权的蔡畅“理所当然”地成了“黑俱乐部”的“老板娘”，造反派逼着蔡畅与李富春划清界限，蔡畅嗤之以鼻。在那个布满阴霾的年代里，两位老人相互信任，相互勉励，彼此为对方的精神支柱。每当李富春出去接受批判，蔡畅总是守候在客厅里等待他归来，送上一杯热茶，默默地陪伴着他，分担丈夫心灵的创伤。可谓祸不单行，此时的蔡畅患有严重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心中痛苦不堪。李富春除了关心她的一切生活外，还给她阅读文件、读报读书、讲趣事，以逗她开心。

1975年元旦上午9时，李富春走完了他人生的75个春秋，溘然长逝，蔡畅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送走了这位相濡以沫50个春秋的革命伴侣。后来的日子她一如既往地沿着他们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道路，坚定地向前走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着余热。

蔡畅和李富春一生只有一个女儿李特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她的一切生活和工作条件应该是非常优越的。但谁知道她却是个备受冷落的孩子，自幼心中就充满了“苦涩与酸楚”。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

伟大女性，蔡畅有充足的时间关爱天下那么多的孩子，却没有时间抱抱、亲亲、抚摸自己的孩子，当李特特伤心地流着泪水告诉母亲说“妈妈，你从来不爱我”时，蔡畅沉默了许久说：“特特，你很幸福，要知道，国内的孩子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周围的同学许多是烈士子弟，他们更需要母爱，我1956年，蔡畅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上致词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李特特从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回国后，毫无怨言地选择了农业科研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她抱着出生才4个月的孩子奔赴亘古荒原北大荒创业，在艰难困苦面前没有退缩，坚强地、一步一步地走着自己的路。这一点，她继承了母亲的性格。因为她明白，中国还有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的农民不知比自己还要艰难多少倍，她虽做不了母亲那样伟大的女性，但她作为这样伟大女性的女儿，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特权这扇门对于她来说没有开，也不想去打开它。所以，许多人离开北大荒后大肆叫苦，她却没有任何一声，她认为脚下的路只能往前走，她不想退，母亲也不会给她退路。

创业艰难，守业更难。蔡畅把其优秀的品质传给了女儿，也传给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后代。正如烈士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在纪念蔡畅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亲爱的蔡妈妈，至今，我仍常常在心中呼唤着您。世上只有母亲的爱最伟大，我从您那里，不仅感受到了慈母般的爱抚，而且得到严师般地教导，您那金子般的慈母心，像一盏不灭的长明灯，永远闪耀在我的心里。”

年事已高的蔡畅从20世纪80年代到去世前，身体每况愈下。她平时很少说话，但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一生的崇高目标却始终血液般流淌在她的血管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她坚持去听报告。对妇女儿童的爱始终未减，经常去参加妇联的会议，急切地查问是否按时交了党费。‘1990年4月11日，就在她生命的灯盏即将熄灭的瞬间，她

还动情地哼唱着“东方红，太阳升……”直至走完生命的最后里程。她走了，带着慈祥的微笑，离开了生活了 90 个年头的这个世界。

她的生命是伟大的，这伟大的生命属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属于全世界的妇女和全中国的儿童。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以她独特的魅力耸立在世界的东方，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事业和全世界妇女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续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人尼姆，威尔斯女士这样称赞蔡畅：“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这可以说是对她一生的最准确的总结。

参考文献：

孙晓金：《名人自述》。

《妇女词典》，求实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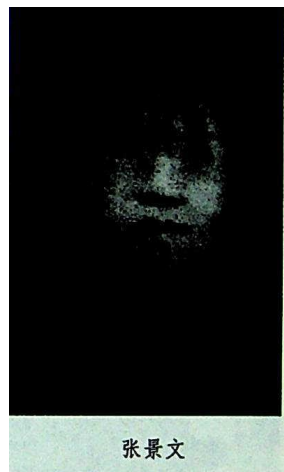
李特特：《父亲李富春为何管母亲蔡畅叫大姐》。《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版。

第一位到南梁苏区的女知识分子

——张景文

张景文（1911—1935），原名张静文，曾用名秀云。中国共产党早期女革命活动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一列宁小学校长。被誉为陕甘边区的“军中才女”。著名作家陈忠实《白鹿原》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白灵的原型。

张景文 1906 年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安村乡宋家嘴村一户开明的富裕农民家庭，家里的人包括娶进门的媳妇都受过文化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蓝田县很有知名度的望族。父亲的开明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她享受到了身边其他女孩子无法得到的良好教育。8 岁时她被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少时的她不仅聪明伶俐，而且性格刚直、豪放，同情穷人，好打抱不平；有年过春节，她把家里刚出锅的一笼包子拿去分给了穷人。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



看见一个商贩欺负农妇，上去就踢翻了商贩的担子、折了秤杆，使得当时围观的群众惊叹不已。这些事情很快传遍乡里，人们赞叹地说：“这女娃将来定是个做大事的人。”1924 年她被送进陕西省教会学校读书。1928 年，她考入陕西省（西安市）女子师范学校就读。

此时恰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大肆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军阀混战，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眼前的黑暗情景击毁了张景文对社会生活美好的憧憬，寻求平等、寻求解放，使天下劳苦大众过上安定的日子，成为了她的追求。

当时的西安也是一个革命风云纷涌之地，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撞。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张景文决心做一名推翻封建压

迫、实现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她积极收集进步刊物，在同学中间常常发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激进言论。1930年初，张景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半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踏上了革命征程，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1931年7月，陕西省委派张景文与宁爱琴到蓝田视察地方党组织工作，部署在商县、蓝田边界建立革命武装。她冒着生命危险，摸清了党组织的受损情况，果断决定让王敬夫负责商县党的事务工作，使已经瘫痪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趁着这次回家的机会，她说服父母和乡亲们，希望不要给女孩子裹脚，让她们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事务。在她的阻止和影响下，家里同她一般大小的女孩子没有一个裹小脚。她走亲戚、串邻居，帮别人洗衣服、抹碗筷、打扫卫生，用这样淳朴的方式接近群众，用聊天的方式谈自己的人生观点，宣传革命道理，号召民众觉醒。在她的积极引导下，她的堂弟张少堂、侄子张吉民（革命烈士）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2年，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寒假工作人员与新闻记者合影，后排右一为张景文

九一八事变后，任女师共青团支部和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的张景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学生上街宣传抗日救亡，揭发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捣毁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焚烧了反动头目的住宅。

张景文是个亲和力极强的人，她生性直率、豪放、豁达，仗义善施，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可谓“一呼百应”。1932年4月，国民党极右分子戴季陶奉蒋介石旨意，来西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4月25日，在西安民乐

园剧场各校学生大会上，戴季陶号召学生积极响应国民政府政策，严厉打击共产党在西安的一切活动。党组织发动青年学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驱戴”斗争。在张景文的带领下，女同学冲上讲台痛打了戴季陶和教育厅的郝朝俊等，台下 5000 多名学生高呼“打倒反动派，戴季陶滚蛋！”“反对不抵抗主义”“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等口号。口号响彻云霄，学生们义愤填膺，石头、瓦片一起向讲台飞去，狼狈不堪的戴季陶在国民党军警的掩护下从后门逃走，愤怒的学生冲开军警，焚烧了戴的汽车。这件事情在西安影响非常大，激怒了西安国民党政府当局。张景文等学生被国民党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通共罪”当场抓捕。狱中的张景文面对国民党的百般诱惑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同年秋天，在家人的帮助和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营救之下张景文终于获释。

张景文回校，女师召开了欢迎会，校长亲自迎接。张景文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在警察局同反动政府斗争的情况，她的英勇举动感染了一大批学生，使更多学生认清了国民党的嘴脸，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来。而重返校园的她从此成为西安学生运动中显赫的领袖人物，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运动的旗帜。她的名字传遍大街小巷，西安人都知道第一个打戴季陶的女学生一张景文，从此她被聘为女师的教师。打铁还需自身硬，张景文深谙其理，除了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革命理论、宣传革命道理之中。她鼓励同学们积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为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而奋斗。

1932 年年底，因革命工作的需要，陕西省委地下党组织派张景文回蓝田县东街小学、麋鹿小学任教，以教师的身份与徐国璉等同志宣传党的事业，发展壮大革命队伍。据赵伯平、张策回忆，该小学是 1931 年屈养正奉杨虎城部属陈养蕃之命，在长安、蓝田交界的麋鹿

村兴办的白鹿原小学，一度成为蓝田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的一个据点。张景文、徐国琏、郗德仁等利用教书之便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消息，培养进步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在学生中建立了反帝同盟组织，讲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消息，还印发传单……”

1933年10月，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从照金根据地出发北上，一路横扫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第二次开辟了南梁根据地。遵从党组织的安排，从女子师范毕业的张景文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使普天下人民早日得解放，与丈夫徐国琏毅然离开了繁华的古都西安城，历经艰险，一路跋涉，到达沟壑纵横、条件及其艰苦的陕甘边区——南梁。她就这么告别了还在呀呀学语的孩子，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告别了生她养她的八百里秦川和那儿时的童话，坚定地去寻求梦想。（今天，他们的儿子徐文岳已经83岁高龄，仍然生活在老家狄寨镇，每当提起父母，徐老总是非常激动，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从此，她成了一位职业革命者。

张景文夫妇的到来，使人才非常紧缺、文化极其落后的陕甘边区福星降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视她为珍宝。当时的南梁苏区，虽然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不少有志青年不甘受压迫、受剥削，纷纷投奔南梁，拿起枪杆子，参加革命斗争。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文化人奇缺，造成宣传工作跟不上，许多群众依然受封建思想的禁锢。由于兵荒马乱多年，当地人不轻易出门，也不轻易相信一些宣传革命的言论。所以，他们的到来无疑是催开鲜花的第一缕春风。

刘志丹、习仲勋立即决定成立一支红色宣传队，由张景文夫妇带领，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路线等革命道理。投入到革命怀抱中的张景文夫妇，激情饱满，革命热情极高，白天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晚上刷写宣传标语，编写顺口溜、故事，填写小曲，以充实宣传材料。徐国琏写得一手好字，弓！

得一些战士常常来请教学习；张景文更是厉害，她双手并用，同时挥毫，往往两天的任务她一个晚上就完成了，同志们赞誉她为：“军中才女”、“女中状元”。

张景文搞宣传，不是古板地说教，而是用拉家常、谈生活、谈理想、讲穷人受苦的根源、教唱信天游、领念顺口溜、同大家一起跳秧歌舞等形式进行宣传。题材灵活多样，群众喜闻乐见；宣传方式随和，不拘时间、地点，深受群众喜爱。不久，许多群众自觉不自觉地 and 革命有了接触，慢慢地便成了邻居、朋友，拿他们当自己人看待。

1934年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的荔园堡召开。会上代表们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出席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刘志丹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一致推选张景文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

作为南梁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的张景文，明白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更明白解放陇东女性的责任，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中。

20世纪初的陇东妇女，同全国其他劳动妇女一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之下，是社会上受歧视的人，是家庭中的受虐待者，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更谈不上政治权利。

张景文顶着巨大的困难，在原来搞群众宣传的基础上，学习党的政策策略，根据当地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挖空心思编“教材”，宣传婚姻自由，解析妇女放足的诸多好处，动员妇女摆脱围着丈夫、孩子、锅台转的三部曲，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作，逐渐自立起来。她性格活泼开朗，话语幽默，把人人都当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待；到群众家中也不生疏，把她那一双黑布方口偏带鞋一脱，光着脚板就盘腿坐

在人家炕上说笑话、拉家常。因为她的存在，窑洞里不时传出朗朗的笑声，惹得姑娘媳妇不一会儿就围成一大圈。这时她便开始给她们讲革命故事、教唱歌曲、念顺口溜段子、教人们写自己的名字等，潜移默化在乐乐呵呵中进行宣传。在她的影响下，渐渐地有许多整天躲在家里从不见人的姑娘、媳妇，纷纷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和革命工作。至今南梁地区的老辈人还记得张景文同志自编自唱过的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长枪短枪马拐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娃娃骑。”“东方太阳出南梁，红军活在咱心上。”“吃米不忘种谷人，翻身全靠共产党。”“自己耕种自己田，多出力气也心甘。打下粮食归自己，感谢恩人刘志丹。”“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领导我们把身翻，把呀么把身翻……”“二月十五夜不眠，满月陪我上高山。宝华山上红旗飘，决心为民要共产。”

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艰苦环境，革命干部往往身兼数职但毫无怨言，只要有一口气，就会坚持到最后。1934年底，为了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使贫苦百姓不再世代做睁眼瞎子，习仲勋发动群众在南梁落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派张景文、霍建德担任该小学教师，张景文任校长。霍建德走后，高敏珍（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的夫人）接任。当时的学校只有两栋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一孔窑洞和60多个动员来的学生。张景文带领学生捡来石块、土坯，挽起裤腿用脚踩和泥巴，亲手垒好土台当课桌、凳子，又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编写教材，把学校办得有声



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艰苦环境，革命干部往往身兼数职但毫无怨言，只要有一口气，就会坚持到最后。1934年底，为了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使贫苦百姓不再世代做睁眼瞎子，习仲勋发动群众在南梁落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派张景文、霍建德担任该小学教师，张景文任校长。霍建德走后，高敏珍（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的夫人）接任。当时的学校只有两栋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一孔窑洞和60多个动员来的学生。张景文带领学生捡来石块、土坯，挽起裤腿用脚踩和泥巴，亲手垒好土台当课桌、凳子，又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编写教材，把学校办得有声

有色，深受边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

列宁小学的教材，在编写方式上采用诗歌、顺口溜的形式，内容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这些山里的孩子既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又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例如：有一段课文的开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张景文任教期间，在列宁小学还有红二十六军团的12名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又都是些孤儿，所以她既是老师又是母亲。当时生活条件差，这些孩子衣衫破旧，缺少换洗衣服，没有讲究卫生的习惯。这位老师妈妈白天教学生习文练字，谁的脸成了小花猫，她总会给洗上一把，让他们清清爽爽读书；晚上坐在灯下，不是一针一线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就是给孩子们抓虱子。孩子们敬重她、喜欢她、离不开她。

边区战事频繁发生，柳村塬战斗，我军失利，伤亡惨重；红四十二师返回南梁地区进行整顿，红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开赴陕北，一些重伤员暂时离开部队，留在南梁地区养伤。王世泰将军回忆说：开始，我在南梁小学养伤。这个小学有两个教员，一个叫王俊（原名霍建德，是我在延安四中时的同班同学），一个叫张景文。在这里，我受到他们两位的精心照料。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张景文大姐，不怕脏，不怕累，给我洗伤、换药、做饭，体贴入微，关心备至。我记得张大姐第一次为我换药时，因为我的伤口流血，腿和棉裤粘在一起，张大姐让我把裤子脱掉。我那时身上只穿棉裤，没穿衬裤，不好意思当着大姐的面脱裤子。大姐嗔怪地责备我，说我太封建，问我是治伤要紧还是面子要紧？张大姐平时精明能干、泼泼辣辣，但在给我洗伤、上药时却是那样的仔细、认真。每当我痛得腿动时，她就用爱怜的目光无声地鼓励我坚持住，我看见她一点一滴为我揩干脓血的神情，总是打心眼里呼出“多好的大姐啊！”

边区政府时期的干部战士，除了千方百计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

外，有空闲便去帮助较忙的单位。张景文更是一位闲不住的人，她除了教干部群众唱歌曲学文化外，还常常去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主持的“红军缝补洗衣站”缝补洗涮。她毫不掩饰自己朴实开朗的性格，走到哪里，把欢声笑语带到哪里，哪里便一片阳光明媚。群众和游击队员都喜欢和她在一起，大家戏谑地称她“张放心”。

1935年春，刚建立起来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遭到了重创。这个春天寒风料峭，乍暖还寒。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十几万兵力，分六路向苏区进攻，发动了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亲自下令：“宁夏三十五师马鸿宾，陕北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井岳秀，关中六十一师杨步飞奋力进剿，以绝根除”。2月，刘志丹、惠子俊带领红三团北上，红一团在南线牵制南路敌人，南梁只留下游击队和赤卫军由习仲勋统一指挥。3月，整个南梁的上空布满敌人“围剿”的阴霾，可游击队缺乏枪支弹药，形势危急。4月，党组织委派徐国琏再次潜回西安搞枪支弹药。徐走到彬县小石崖，不幸遇敌，被捕入狱。敌人软硬兼施，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只好将他以“土匪”罪名残酷地将其杀害并张贴告示，在彬县城门上“悬首示众”。徐国琏牺牲时年仅25岁。据当地高龄老人讲：“敌人已经将他折磨得失去了人样子，甚至无法站立，临刑前由四个人拖着走，整个城隍庙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刑场边上压了好几挺机枪，徐国琏被拖到城隍庙临时刑场中间，他奋力挣脱押解人员的手臂，用尽毕生精力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视死如归。’”

徐国琏，1927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与共产党员赵希仲联络长安、蓝田及白鹿原一带进步人士和名流于益轩等人，筹措经费创办“私立鹿原小学”，开设语文、算术、历史、地理、常识等新课程，传播进步思想，在白鹿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2年下半年，在西安东关景龙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

作。1933年到达红二十六军，任该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他扮作商人以“周泰昌毡房”为联络点，同杨虎城军中机枪连连长赵希仲秘密合作，为南梁政府购置、运送武器，为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1年，长安县人民政府追认徐国璉为革命烈士，各界人士捐助修建了“徐国璉烈士”纪念碑，立于狄寨小学后院，每年清明节，前来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成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1935年4月20日，习仲勋接西北工委指示：“暂时撤离南梁，向东转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撤离，南梁政府随之迁到洛河川，正在执行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条令被迫暂停，列宁小学随之停课。张景文跟随南梁政府来到洛河川，她强压失去爱人的巨大悲痛，仍然顽强地从事妇女工作。为了很快地把广大妇女发动起来，使她们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懂得妇女独立、自主，积极实施自己的民主权利，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安定县永坪镇召开。红军内部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派人在陕甘边区大搞肃反，陕甘边苏区和各县政府一个个党政高级干部和部队营以上的干部全部被捕。9月下旬，在前方指挥打仗的刘志丹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被捕，接着习仲勋等陕甘边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张景文被诬陷为敌人派来的奸细，于11月在洛河川惨遭活埋。

张景文牺牲时，年仅29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蓝田县委、县政府于1950年2月21日在县城召开大会，为她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专程赶到蓝田参加了张景文的追悼大会。王世泰回忆说：“是的，张景文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姐，是女中强人，革命队伍中的坚强战

士……她的爱人叫徐国链，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曾在陕西省委当交通，后在执行任务中被敌人杀害，张景文在 1935 年错误‘肃反’中，也蒙冤惨遭杀害。”

张景文烈士不是丹娘的化身，不是索菲娅的精灵。她就是她，一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无限热情的陕甘边区高级女干部，她驱戴的英勇举动曾惊动了蒋介石，但她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倒在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残酷肃反的血泊里。面对历史，我们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们敬重她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天地、可歌可泣的革命诗篇，捍卫了这片血染的土地。今天，她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她所致力妇女解放运动空前繁荣。陇东妇女与全世界的女同胞们一样，在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奋斗和牺牲之后，在革命大潮中获得了自身的解放和幸福，正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算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吧！

参考文献：

《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

《中国共产党蓝田历史》（1927—1949）第一卷 197 页——中共兰田县委党史研究室，2007.9。

《西安事变时期的蓝田》——“汪锋同志忆贯彻周恩来副主席对地方工作的指示”——中共兰田县委党史研究室，2007.9。

《西安党史资料丛书》——西安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西安市委组织部、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2006.6。

《蓝田地下革命活动二三事》“无私奉献的人. 陕西妇女运动（1919—1937）”293—295 页——赵伯平、张策等人的回忆，朱平、秦生贤撰写。《光辉的楷模》“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王世泰，2002,4。《陕西妇女运动》（1919—1937）——陕西省委党史研究

室、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部分资料张菊惠提供——张菊惠（张景文的侄女），2010.12。

陕甘边区首位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

——高敏珍



高敏珍（1914—1963），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组织部长，陕甘边区首位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国民经济部合作指导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妇联组织部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陕甘宁边区妇联执委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妇委委员，陕甘宁边区妇女合作社主任，西北妇联委员兼生产部部长，中央农业部植物保护局副局长，人民公社局副局长。她的丈夫蔡子伟历任中共信阳特委军委组织部长，陕甘边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秘书长、代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边区中学（今延安中学）第一任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等。高敏珍与蔡子伟是同甘苦共患难，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和模范伴侣。

高敏珍 1914 年 3 月 19 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在家乡只读过小学。父亲是私塾先生，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姐早世，二姐 1943 年到延安，一直在中央机关生产部门当工人，解放后随中央机关到达北京，在百货公司、北京文化用品公司为普通员工。弟弟是个小店员。1943 年，大哥随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儿到延安，解放后到北京。侄子高庆恩牺牲后，大嫂由于失去

儿子的打击，心脏病非常严重，大哥只得常年侍奉在家。

高敏珍的童年时代充满了美好的向往。物质生活极其贫困，精神生活却五彩缤纷。如果说“清涧起义”搅活了陕北，使备受封建礼教压制的老百姓群情激荡，那么“清涧起义”的故事，则是她听到最早、离自己最近、最震撼心灵的革命故事。如果说大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谈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的激动就是听故事、凑热闹，跟着大人跑前跑后，不用坐在炕上受罪缠小脚。不久，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在米脂兴起，声援济南惨案的爱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米脂轰轰烈烈展开；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在米脂人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接着米脂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妇女促进会”、“姐妹会”、“放足会”、“读书会”、“互济会”等。这些协会的成立，给米脂注入了新的血液，女孩子进入学堂读书，高敏珍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和影响者。在米脂县小学入学不久，高敏珍就加入了儿童队，她告诉老师：“想上学识字，反掉老封建，为的是穷人不再受压迫，不再受地主的气。”

这期间，中共地下党员、表哥王守义经常给高敏珍讲革命道理，熏陶着这颗年轻的心。正是这许许多多革命的道理，把她引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1930年初，她加入了“互济会”，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组织干事。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她激情高昂，组织青年、妇女、儿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好评。1932年被组织提拔为共青团特别支部成员。

1933年4月，经王守义介绍，高敏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她庄严地宣誓：“决心打倒老封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那一刻，她的身子很轻，仿佛直上云端；那一刻，她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位胸有百万兵的将军，拯救世界的重任从此担在了她的肩上。当时，党的各种会议和活动经常在她家进行，他大哥的儿子高庆恩是陕北早期的共产党员，特委书记赵伯平常去她家指导工作。那

这个时候，她的干劲十足，似乎无穷无尽，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无比荣耀的。后来她在子女跟前常常提起那段时光：“真叫人难以忘怀啊！”

革命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高潮更有低谷，有无比兴奋亦有痛不欲生。1933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决定让高敏珍和时任米脂共青团特别支部组织委员的尤祥斋等撤出米脂，去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她离开不久，高庆恩、王守义、崔明道、毕维舟等61位优秀共产党员惨遭敌人杀害，惨痛的消息使她悲痛欲绝！但革命的信念却更加坚定了，誓死忠于党。

高敏珍与尤祥斋艰难跋涉到北平，又转战到达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由于她工作作风干练、踏实、认真，得到冯将军的赏识，推举她担任了“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组织部长。她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与尤祥斋一起，奔波于张家口民众间，向妇女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号召全国妇女起来抵抗外侮。抗日救亡运动在张家口地区轰轰烈烈展开，妇女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由于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力，8月，冯玉祥被迫退出抗日同盟军，导致了抗日同盟军的最后失败。但经过高敏珍等艰苦的工作，用辛勤的汗水在张家口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不久，她受党的指示，离开张家口，到达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这里，她与地下党员蔡子伟相识，并结为伉俪。不久，蔡子伟离开北平去苏区工作，她继续留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蔡子伟（1908—1990），又名建堂、建勋，1908年6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城关镇蔡家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蔡子伟少年聪颖有大志，喜读书，常手不释卷。16岁即被聘为县立模范小学教员。1927年8月，蔡子伟在陕西省蓝田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道路。1928年他从陕西省立第

一师范毕业，与杨珊等人发起组织了“品学共进社”，在蓝田为革命点燃起了星星之火。1929年，蔡子伟受党的安排前往安徽宣城做党的地下兵运工作。1930年8月，被派遣担任中共信阳特委军委巡视员兼军委组织部长。1931年1月，他由河南信阳到了北平，被编入中共北平宣外地下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从事学运、兵运、农运及情报等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6月，从事特科和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4年6月，到达陕甘苏区南梁，与刘志丹、习仲勋等会合，在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工作。9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秘书长。

1934年9月，高敏珍带着刚刚出生40天的孩子蔡平民回到了陕西老家，设法把孩子托付给蔡子伟的亲戚。10月，与徐国璉一路抵甘肃庆阳华池的苏区南梁。高敏珍回忆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天高气爽的好天气，我与徐国璉一路奔波直抵旬邑县起界石，刚踏进村，红军游击队迎面而来。游击队总政委张邦英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说：“敏珍，你有文化，又见过世面，给同志们讲讲吧！”回到家乡，又遇到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军队，我喜不自禁，正憋了一腔话要倾诉，经张邦英这么一说，马上讲起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将来革命成功了，就没有了剥削和压迫，人们可以住上洋楼，家家使用上电灯、电话，还可以用飞机下雨，用拖拉机耕地。那时，我们的下一代，就再也不会受苦受难了。因此，我们今天东杀西拼、流血牺牲完全是值得的。同志们，为了迎接无限美好的将来，让我们共同奋斗吧！”

在以没有文化和知识的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许多人尽管参加了革命，但革命成功后究竟是什么景象，他们并不知道。高敏珍这一番话为大家展示了一幅革命远景图画，游击队员听了个个欢呼起来，他们对高敏珍崇敬有加，张邦英派出两名队员，护送她直达陕甘苏区

机关所在地南梁堡。

高敏珍的到来，给苏区增添了新的活力，带动了边区干部战士和当地老百姓学文化的热潮，又帮助筹备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事宜。她的身影飞似的一会儿忙这、一会儿忙那，累是累得很，但在人们的视线里她总是满面春风，整天乐呵呵的。

经过两个月繁忙的筹备工作，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主席为习仲勋，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并负责《红色西北报》编辑部（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的工作。高敏珍任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

把妇女从封建旧礼教、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是新中国妇女干部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的夹缝中成立，举步维艰。妇女委员长能否撑起半边天？高敏珍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她走乡串户，刷标语、作演讲、拉家常……为边区妇女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培养军政干部，陕甘边区创办了西北我党第一所红军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这是陕甘红军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大事，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和张文舟等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

同时，为了发展陕甘边的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使贫苦百姓及早明白革命道理，1934年底，边区政府决定，在文化委员长蔡子伟直接领导下，在河家沟门（不久迁往转咀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高敏珍是第一任校长，张景文与王俊（原名霍建德，陕西清涧人，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武威地区地委书记）担任该小学教师。当时学校没有课桌、凳子，高敏珍和张景文等带领学生拣来石块、土坯，挽起裤腿用脚踩和泥巴，亲手垒好土台当课桌、凳子，又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编写教材，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深受边

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

当时教材的编写，多采取诗歌和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孩子们学习兴致很高。加之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使这些山里的孩子们既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又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蔡子伟作为文化委员，还亲自编写教材。

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不久后，很多村庄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此外，一些村子还办起了成年人扫盲识字班。这些层次不同、年龄不等的学生渴望知识的热情非常高，他们不但采用列宁小学的教材，还经常请列宁小学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周围村子的孩子们以能在列宁小学读书为荣。

1935年春，高敏珍调到安塞县，担任团特委妇女干事，继续从事妇女工作。那些坎坷崎岖的小路上，印满了她的脚印。那一孔孔破旧而寒冷的土窑洞里，是她送去了缕缕春风，播洒下了片片爱心，她把自己完全融入于群众之中。

然而，令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厄运盖天蔽日地降了下来，顾不得你睁眼瞧，更不让你张口说话。一股“左”彳顷错误的强台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刮到了陕甘苏区，一场肃反使许多革命的精英成了牢笼之囚。从白区来的蔡子伟被怀疑为“反革命”而戴上了镣铐，高敏珍自然也无法幸免，她不但被捕了，而且还被判了死刑。一位对党忠贞不贰的革命干部一夜间就成了“特务”、“反革命”。由于当时高敏珍有孕在身，于是，有同志想出了迂回拯救的主意：“高敏珍正在怀孕，一刀不杀二命，她又跑不了，等生了，子再说吧！”这个建议，让高敏珍幸免于难。笔者在采访高敏珍的儿子高朋时，高伯伯激动地说：“妈妈在世时总说：‘是高朋救了我的命，。’”1935年10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左”（萌错误及时得到纠正，“立即停止错误的‘肃反，运动，释放被捕同志，恢复工作’”。毛主席的批示，

使高敏珍得以死里逃生。

1935年冬，高敏珍调往瓦窑堡，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是毛泽民）合作指导委员会委员。1936年1月，蔡子伟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秘书长，协助毛泽民工作。毛泽民赴新疆后，他任代理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6日，经中共中央提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原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亦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副厅长蔡子伟。

妇女工作是边区工作的重点之一，但边区的知识女性十分缺乏。由于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能力，高敏珍又被调到边区妇联工作。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敏珍工作起来像一台不停旋转的机器，废寝忘食。为了动员、组织边区妇女参加抗日工作，送儿送郎参军参战，交公粮，做军鞋，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高敏珍夜以继日地劳累。由于劳累过度，高敏珍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浑身乏力，吐血不止。组织上强行让她休息，可身体稍有恢复，她又投入了工作。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1937年赴延安访问，5个月后她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她在“红色共和国妇女”一节中这样形容解放区女性：“华南的妇女比北方各省的妇女强悍些，西北又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不过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当地的妇女已有进步，这是我没有料到的。”红色妇女干部让这位外国知识女性更是刮目相看。文中她这样描述高敏珍“陕北妇女运动的领导人高敏珍，她是陕北本地人，是当地妇女运动的一位创始人，早在1933年就参加共产党，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高敏珍长着一双乌黑的眸子，目光炯炯逼人，嘴巴抿紧，有一副刚毅的神气。她和李坚贞（陕甘边区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来看过我几次，谈到了陕北和西北苏区的妇女工作。我

的印象是她对当地的妇女情况了如指掌。”

1938年9月，高敏珍被任命为边区妇联组织部长。1939年1月，她被选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光荣地出席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1938年，为了培养有文化的新青年，边区政府决定创办陕甘宁边区中学。经过紧张筹备，于1938年9月10日举行了边区中学成立暨开学典礼，蔡子伟担任边区中学（今延安中学）第一任校长，为边区教育事业打下良好基础，为我党的中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解放区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有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党和国家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骨干。

1939年7月，一桩特务陷害案落到了蔡子伟的头上，他又一次不明不白地被捕入狱。刚生完女儿高萍十几天的高敏珍，因受牵连而



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代表招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女参议员留影，右一为高敏珍

被捕关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审查了5年。在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里，他们夫妇吃尽了苦头。1944年3月，冤案澄清，高敏珍与蔡子伟同时出狱。冤案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不久，在蔡畅陪同下，高敏珍受到毛泽东

的接见。在饭桌上，毛泽东对高敏珍进行了安慰和鼓励，说他们夫妇是好同志，让他们好好工作。高敏珍深受感动，热泪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得到母爱，她觉得一股股暖流从心中涌过，周身充满了力量

1945年秋，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数百名干部坐在台下。台上，高敏珍站在简易的木桌旁，那张略带病态的脸上挂着微笑，她受组



高敏珍与蔡子伟合影

织委托给大家讲话：“是党把我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培养成为一名革命者。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对党、对人民只能忠心耿耿，而不能时时考虑个人得失利害。我是两次坐过牢，特别是在1939年秋，因被国民党特务陷害，有五年的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委屈吗？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又在想，一个母亲有时候也会委屈儿子，但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难道儿子能去抱怨自己的母亲吗？……”台下的许多人是在审干中受过委屈的，他们有怨气，高敏珍的讲话使他们心海中击起层层波澜，他们感慨、疑虑、惊讶，想象不出高敏珍那颗受过委屈的心是如何舒展的。她的这番话，更使那些因受过委屈而心中耿耿于怀的人，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局贵品质。解放战争时期，蔡子伟担任延安大学高中部主任。他带领延大高中部师生百余人，转战陕甘晋，参加了边区军民的自卫反击战，师生经历了千里转战的严峻考验，在中共党史上，谱写了一页在战争中办学的教育史诗。高敏珍始终是蔡子伟的坚强后盾，出主意、想办法，确保了工作的顺利进行。全国解放后，蔡子伟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后又陆续担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6年到1964年间，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等。蔡子伟总是像一头勤奋耕耘的老黄牛，直到1990年1月7日因心脏病猝发，不幸病逝于北京。

解放战争时期，高敏珍负责边区妇女合作社工作，她巧妙地躲过胡宗南的飞机大炮，将七八百万元的物资从延安转运出去，“人在物资在”就是高敏珍对工作的态度。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党中央大后方的供给，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嘉奖。1949年3月，高敏珍作为西北区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1951年春，高敏珍任西北妇联委员兼生产部部长。她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常下基层，宣传新中国的妇女政策，为妇女奔走呼号：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女性、扶持女性，认真听取和采纳她们正确积极的意见，鼓励她们大胆开拓，勇于创新。她的时间表上没有星期日这一说，甚至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都是件奢侈的事；她的生活里却有无数位姐妹、无数个牵挂、无数种解决不完的问题，为妇女事业可谓呕心沥血。1954年11月，她调任中央农业部植物保护局副局长，始终以热情饱满的精神，接受新的挑战；以青年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为了全国农业生产健康稳固发展，保证获得丰产丰收，全身心投入到植保工作中去。她多方奔走调查、摸底，呼吁一代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开拓视野，大胆地去探索、去发现。在植物保护，特别是对农作物的病虫害监测、预报、预防和防治等方面搜集了珍贵的资料，为保护和完善植物物种建立了较完整的档案，为后来农业科研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6月，鉴于高敏珍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党中央决定调她任农业部人民公社局副局长。在人民公社局副局长的位置上，为了农业的发展，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她不顾体弱有病，亲自带队顶严寒，冒酷暑，数次深入偏僻乡村实地考察，选择试点。夜以继日地工作，使她积劳成疾，病情加重。

1963年2月25日，人生49个春秋，极其短暂。高敏珍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南梁红色圣地上的一颗亮丽的星辰，陕甘宁边区一位女杰。她十多岁就参加革命，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向前冲锋。哪怕是站在生死线上，她始终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进入人生之旅的最后阶段，躺在病床上，她仍关心着农业的发展，关心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对她的一生，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白区地下

工作，陕甘妇女解放，千辛万苦，为党奋斗三十年；艰苦朴素诚恳，深入团结群众，兢兢业业，堪为我们的榜样。”

参考文献：

《陕西府志》——凤凰出版社出版，2007.5。

《延安女性》——主编：寇雪楼，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1995.8。

《高敏珍的一生》——《天人古今》杂志（陕西省政协办公厅等主办），
1992.2期。

《蔡子伟生平要事纪年》——选自《蔡子伟纪念文集》，主编：李易方副主编：杨国华、汪继尧，农业出版社出版，1999.12。

《高敏珍简历》——高朋（高敏珍之子）、高萍（高敏珍之女）、汪继尧（高萍丈夫）。

《续西行漫记》第270页——海伦·斯诺。

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长

——邱一涵

邱一涵(1907—1956)，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三军团卫生部党总支书记。她是为数不多的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主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长，红二、四方面军教导师政治教员（驻防庆阳），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华中军政大学政治系主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共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南京市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监委书记，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执委。她是中共陇东特委第一任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的夫人。

邱一涵 1907 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芦洞乡丁家源，原名邱信贞。父亲邱紫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干部，曾任铜鼓县苏区政府财政部长。哥邱炳，也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湘鄂赣省经济部长，他对自己的信仰忠贞不渝，后被敌人杀害，是一位革命烈士。邱一涵出生在这样的革命之家，星火圣地陶冶了她的革命情操。1926 年，当革命斗争的烈火燃烧着平江时，19 岁的她，在父、兄的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投身革命，积极配合党组织的活动，做平江地区妇女和青年工作。1929 年，她与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结为夫妻，从此，他们夫妇并肩战斗，为求得天下劳苦大众解放，舍生忘死，以坚强革命信念，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血色脚印。

袁国平（1906—1941），原名袁幻成，又名袁裕，字醉涵。他出生于湖南邵东县袁家台村一个贫苦的手艺人家庭，少年时受尽磨难。1922 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

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亲历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城战役以及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冬任中共湘鄂赣特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1929年6月任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0年，邱一涵转为正式党员并参加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同年9月，担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鄂省委妇女部长等职，组织地方武装斗争，号召民众起来当家做主人，发动妇女求解放，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她调回中央苏区，先后在军委总政治部、卫生部和红军大学工作。

1934年10月，邱一涵随袁国平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教科书上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啊！我要说它是先烈们用血肉之躯写出的奇迹。邱一涵曾经裹过小脚，但没有人用担架抬着她走，也不曾骑过一回马，她是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精神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长征路。她和袁国平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一对情深意重的伴侣，他们是新四军中评选出的三对模范夫妻中最令人羡慕的一对。袁国平曾为她赋诗：“不是香的花，不是甜的蜜；好似茅台酒，醇芳与日佳。”袁国平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爱妻子、爱亲人，更爱自己的战友。长征途中，他坐骑上驮的是伤员（后来的共和国上将唐亮），邱一涵却是身背行装，拽着马尾巴三过雪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渡过天险大渡河，历尽艰辛，其悲壮经历写下了生命的赞歌。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陇东。邱一涵担任红四军教导师政

治教员，与红军教导师师长兼政委的袁国平住在环县木钵。不久，中央任命邱一涵为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长。环县属于陇东最偏僻、最贫穷的山区，老百姓祖祖辈辈的身心被封建势力牢牢地捆绑着，土匪出没不定，国民党马家军肆意猖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红军初来乍到，受袭击事件频频发生，部队命令战士出行必须有3个人以上结伴。在这样的地区创建革命政权困难非常大，妇女工作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山路总不会比长征路还难走吧？”“我们是一群披荆斩棘的寻路人！”邱一涵总这样鼓励同志们。环县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她不顾个人安危，经常翻山越岭，走乡串户讲解革命道理，动员妇女站起来走出家门，冲破封建枷锁，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但是，往往这里的工作刚有眉目，一夜间就被反动势力袭扰殆尽。她不气馁，接着再做，用自己坚忍不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动着身边的战友，启迪着父老乡亲。

她是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陇东革命根据地后，在陇东的第一任高级女干部，是第一位站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大声疾呼——“陇东女同胞们，起来，做自己的主人”的妇女领袖。她身穿整洁的灰布军装，腰间皮带上挂一支小小的勃朗宁手枪，活跃在军中，奔走在老百姓中间，甚至双手叉腰站在万人大会的讲台上。她就以这种既温文尔雅、又柔中带刚的气质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定格在陇东人民的心中。今天，木钵、耿湾等地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故事，陇东人已经把它归纳到“古今”里了，就是涅槃了的、永远传诵着的故事。当时袁国平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27日，国民党东北军一〇九师撤离庆阳，教导师进驻庆阳县城。邱一涵和蔡畅等在庆阳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开辟了陇东工作新局面。袁国平任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袁国平有一张骑马的照片，看上去十分威武，照片后面有他的亲笔题诗：“十年辛酸斗兵戎，

愧我吴下旧阿蒙。半壁山河沉血海，满地干戈斗沙虫。北伐长征人犹在，千伤万死鬼亦雄。弹丸挣扎鱼龙变，天翻地覆见大同。”这张 1937 年摄于庆阳县城街道的照片和题诗，是他从庆阳寄给湖南老家的一位堂兄袁占宏的，他用照片和诗作不但给远方的亲人报了平安，还表明了他矢志革命的决心。1937 年 10 月，袁国平奉命去延安治病。夫妇俩从此离开了庆阳奔赴抗日前线。

1938 年春，邱一涵调往新四军军部，先后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宣教科长，华中局后方政治部干部科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她是个工作热情极高的人，又对人谦虚，知人善任，待人诚恳，处事公平，各种类型的工作人员都能团结在她的周围，并发挥其所长。既赢得了同志们对她的尊敬，又使大家齐心协力做好了部队各项工作。

1939 年初，邱一涵任教导总队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当时组织工作，包含干部、党务等多方面的工作内容，是极其难做的一项工作，对精力、体力等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而且她又即将临产（儿子袁振威生于 1939 年 5 月）。特别重视调



查研究的邱一涵，利用一切机会掌握新老干部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的思想特点、生活动态，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培养、使用他们，大大提高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由于这种求真务实、待人热情、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邱大姐”。当时在教导总队担任干事的 ”唐炎深有体会地说：“邱大姐工作细心耐心，能及时解决问题。”

组织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党建工作是党的血液。“通过党课和

个别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端正入党动机，把发展党的工作立足于提高思想觉悟上。”这是邱一涵做党建工作的经验。她认为学习《社会发展史》是确立革命人生观最重要、关键的课程，只有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坚定革命的决心，坚持革命道路，明确革命目的。她不但这样告诫同志们，自己更是以身作则。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震惊中外、惨烈悲壮的院南事变。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指挥新四军战士浴血奋战七昼夜。1月12日，他在突围中不幸身体多处中弹。第二天，战士轮番背着他继续突围，他担心连累战士，毅然对着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这位我党我军的高级将领和卓越的政治工作者，牺牲时年仅35岁。实践了他“如果我有100发子弹，99发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决不剖补”的豪言壮语。邱一涵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亲人，受到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夫妻俩顾不上照顾年幼的子女，以致大女儿13岁被送去做童养媳，小女儿2岁死于贫病无医，儿子袁振威8个月被送回千里之外的湖南老家，战火相隔，杳无音讯。她强忍悲痛，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个人的不幸，把全部思想感情献给革命事业，把无限深情寄托给同志和战友。

袁国平牺牲后，邱一涵接受组织的安排，在彭雪枫支队担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华中军政大学政治系主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等职。1946年4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四师雪枫军政大学（原抗大四分校，为纪念彭雪枫将军更名为“雪大”）、苏中公学、华中随营学校，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大学，地点在江苏宝应高邮县之间的界首与汜水镇。粟裕兼任校长，邱一涵任政治部主任。三校干部来自淮北（豫皖苏地区）、苏中、苏南，6个大队30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有从江南北撤的地方干部，有来自蒋管区的知识青年，有前方下来的排连营

级干部，一部分团以上干部，还有起义军官。教职员工也来自四面八方。因此校领导班子必须首先从思想上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贯彻办校方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训练一标。对干部的配备使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邱一涵对政治教育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自己宽广博大的胸怀，温和刚毅的性格，冷静成熟的思想，热诚真挚的情感，感染温暖着每一个人，充分发挥每一位干部的积极性，使校领导班子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关系融洽，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邱一涵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军政大学中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在政治部主任岗位上工作的几年里，培养了一大批工作扎实、有才能的干部队伍，为部队输送了数以千计的政治思想素质高、军事水平过硬的学员，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且在界首时，林颖（彭雪枫的爱人）因工作无法带孩子，邱一涵就把彭雪枫烈士的遗子小枫接在身边，由自己照顾，那时的小枫只有2岁左右。

长期的艰苦生活条件，加上繁忙的工作，邱一涵积劳成疾。1946年底，由于病情不断加重，组织上安排她去上海治病并做党的秘密工作。她住在上海秘密工作者童紫的家里，党组织也派人从湖南老家找到了袁振威。那年袁振威7岁，帮奶奶拾柴、烧火、做些小家务活，后来奶奶双目失明了，他们就以讨饭度日。后来，袁振威将军回忆说：“母子见面时，我双眼怔怔地、疑惑地盯着她：她是我妈妈吗？我透过她眼中的泪花，看到了慈祥。这时，站在一边的陆楚梵舅舅（后来妈妈让我这样称呼他）告诉妈妈，他到湖南邵东县找到我时，我正搀着已经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妈妈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抱住我的双肩，将我搂在怀里，喃喃地说：‘院儿啊！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妈妈呀！我的亲儿子！’热泪顺着她的双颊，落在我的额头上，落在我的脸颊上，还带着她的体温，和着我的泪水。我第一次感受到母爱的

温暖，终于平生第一次喊出了人生最伟大的称谓‘妈妈！，周围的童紫阿姨、楚楚舅舅他们，全都流泪了。从此，我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自此，小小的袁振威就跟着妈妈经常换住处，不许把同学带回家，不能把住处告诉别人等。至于父亲，邱一涵告诉儿子：“他在前方打仗，他是炊事员。”为了让儿子记住父亲的遗愿：长大去当兵，振我军威，做一个继承先烈遗志的好后代。她给儿子取学名振威。

1948年，病情好转的邱一涵回到解放区工作。袁振威被安排在三八子弟小学读书。“有一天，同学们在一起谈论父亲的职务：司令员、军长、政治委员、教导员……名称很多。问我时，我很自豪地说：我爸爸是炊事员。结果，遭到同学们的讥笑。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说：‘司令员、军长、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样的光荣。’从此，妈妈再不让我上干部子弟小学了，要我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冬天，妈妈带我到了济南，这里是华东解放区，我被送进锻店小学读书，与农民孩子在一起。渡江战役胜利后，我跟着妈妈进了解放后的南京。直到有一天，有个同学说：‘你爸爸是叛徒。’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立即跑回家问妈妈。这一次，妈妈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你爸爸不是叛徒。你爸爸在院南事变中突围时负了重伤，为了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太阳穴，壮烈牺牲了，你爸爸是烈士。’这时我才知道，爸爸已去世将近10年了。妈妈为了我的健康成长，竟强忍着丧夫之痛，对我隐瞒着真相，可惜我对妈妈的伟大胸怀知道的太晚了，也成为我终生的遗憾。”这何尝不是袁振威一个人的遗憾呢！

渡江战役胜利后，邱一涵由部队转到地方，参加南京市的接管工作。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学区党委书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市人事局局长、华东妇联主任，中央妇委委员、上海妇委书记。南京这个六朝故都，国民党政府在此盘踞多年，明枪暗



1947年，邱一涵与儿子袁振威

特事件时有发生，1947年，邱一涵与儿子袁振威安置工作极其复杂，她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总能把繁杂的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深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自己则忙得吃不上饭、回不了家，更别说照顾她的宝贝儿子了。

1952年10月，按照中央政策，苏北和苏南两区合并成立了江苏省，邱一涵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已取得伟大胜利，但她严于律己，仍保持着

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生活仍然十分简朴清苦，平时粗茶淡饭，穿戴亦十分简单。她总说：“吃，只要营养够就行了；穿，只要不受冻。”儿子上初中时，学校离家较远，有些同学有自行车，儿子也闹着要买一辆，邱一涵却说：“全国解放还不久，国家还有困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你的同学买得起自行车的能有几个？不是还有许多穿补丁衣服，有的同学连学费都交不起吗？你的眼睛应该多看看他们。”然而，对于无论是由于工作关系或是同事、战友之间来往的同志，她却总是很热情地招待或慷慨救助。例如：对侄儿们的学费，警卫员的婚事，炊事员家里修房子，保姆家有困难，她都慷慨相助。她是平凡的更是崇高的，她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信仰，有她独特的忠信与坚贞。她从没有怀疑过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始终如一地怀着满腔激情憧憬未来，关心和教育后代。

1954年她罹患肠癌，手术时已临晚期，但她仍然以坚强的毅力默默顽强地生活、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956年11月2日，

邱一涵在南京逝世。“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这是她留给儿子的最后遗言，是她重病在上海手术时，给儿子袁振威的信中写道的。

袁振威将军回忆说：“妈妈的许多事情我并不了解。所以在母亲的追会上，许多父母亲的战友涕泪滂沱，甚至捶胸顿足，十分悲痛，呼唤着同一个称呼‘邱大姐，年轻的同志，呼唤着‘革命妈妈，我非常惊讶、感动。母亲身上凝聚着什么力量，受到这么多同志的爱戴。最让我感动的是，宋时轮、唐亮、钟期光三位上将，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等老将军，叔叔伯伯们，都来为母亲扶灵送别……”

邱一涵是在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政协江苏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执委等重任上谢世的。这是她生命最后阶段倾注全部心血的岗位。虽然她在人世间只有短短的48个春秋，但是，她却把青春年华和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生她养她的祖国、人民，献给了她所毕生追求的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她的名字和事迹随斯诺的《西行漫记》传遍世界，她是永生的。她的思想，她的品德，她的意志，她的作风，以及她为部队、学校、地方政治工作做出的贡献，永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抗大四分校校史资料选编》。

《纪念邱一涵同志》——编幕小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

《女红军邱一涵的传奇人生》——《大众文学》2008年第二期。

《永远的怀念：纪念邱一涵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11。

《袁振威忆父亲袁国平母亲邱一涵》——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研究会，2006.5.16。

《父亲袁国平母亲邱一涵》——袁振威，2010,4。

搭起中央红军与陕甘苏区桥梁的女信使

——罗培兰

罗培兰（1915—1995），陕西乾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曾任酈甘县妇女主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江西省宁都专署民政科长兼人事科长，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干部。



罗培兰

她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陇东地委委员兼庆阳县（现庆城县）县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朱开铨的夫人。罗培兰 1915 年 9 月出生于陕西省乾县注泔乡胡罗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慧、性格刚强的她，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不愿像父辈们一样守着贫穷落后和封建旧礼教旧观念生活一辈子，希望天下劳苦大众过上自由平等、富裕的日子。1934 年 5 月，她毅然离开了家庭，参加了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同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在南梁政府，军队里的女同志只有罗培兰和张景文两人，领导就安排她在陕甘边区委员会（南梁政府）做妇女工作。张景文在陕甘边区委员会（南梁政府）做文化教育工作。不久，凶残的 5 人想趁刘志丹出兵打仗之际灭绝刘家，习仲勋得知消息后派人将刘志丹父亲以及夫人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接到南梁，安排住在罗培兰的窑洞里，并派罗培兰照顾到南梁的同桂荣母女的工作和生活。由于工作的需要，胆大、细心的罗培兰调到了红二十六军经理处，在马锡五的领导下从事采购中药材，组织货源制作军服、军鞋等艰难繁重的后勤供给工作。她不但组织动员乡亲们制作军衣，自己也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烧得一手好菜，还是骑马射击的女中高手，与群众的关系很

密切。这样，南梁就有了三位女同志，她们亲如姐妹，和男同志一样，不辞辛劳地保护着这块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罗培兰回忆当时的南梁政府时说：“刘志丹同志率红二十六军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经常转战南梁、陕北和照金之间，但南梁是根据地的中心，习仲勋就带着我们南梁政府的十来个同志坚守，完全依靠群众，走到哪家就吃住在哪家。敌人一出动，群众就及时主动给我们报信，发现敌情转移时，南梁政府全部家当 10 分钟就可以装进马褡子，放在两个毛驴背上就走。”

妇女工作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扩大根据地急需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做好妇女工作的女同志。当时对这些女干部的要求是：能讲本地方言，能与群众一同干农活、做家务，遇敌能周旋，能观察了解各个方面的动态等。当时，罗培兰都符合这些条件。因此，1934 年 6 月，罗培兰奉命调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任陕甘边区（南梁）政府妇女代表，负责妇女工作。

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1934 年 11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罗培兰被推选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出席工农兵代表大会。她回忆说：“1934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那一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刘志丹同志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习仲勋同志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有土地、肃反、财政、经济和粮食委员会，政府工作人员约有 30 人，在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农会、工会、赤卫军、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从南梁政府两头毛驴驮全部家当的二个部械！]时期，进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扩大发展时期。”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培养一批有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年底，政府决定在南梁成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马文瑞等任教员。当时从各个部门选调了一批政治基础

的同志到干部学校轮训，罗培兰作为首批学员参加了培训。她说：“轮训班当时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党内同志的工作方法。仲勋同志讲课很结合实际，特别强调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他说：‘对根据地群众开展工作，最主要的是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一家一户做工作，一家都不能落下。调查土地改革分配的情况，分配要做到公平合理。通过土地革命，从宣传群众到组织群众，条件成熟时就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红军家属开展工作时，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支持红军和边区政府。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解决。帮助他们孝敬老人、抚养子女，动员他们做军服、军鞋、加工军粮。支持在红军中的亲人，不拉后腿。对可能被争取转化的人开展工作时，对他们的家属要经常宣传、争取和教育，详细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生活困难的要适当接济。经过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们的政治军事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陕甘边区根据地是不断扩大的游击区，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发生与敌人突然遭遇的情况，就用上了在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会的军事知识，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1935年初，罗培兰任酃甘县妇女主任。她急人民群众所急，想人民群众所想，时刻站在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方面。她走乡串户，采用拉家常等形式，鼓励妇女姐妹们站起来，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深受广大妇女的爱戴。

当年，刚建立起来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遭到了重创。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十几万兵力，分六路向苏区进攻，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二次“围剿”。2月，刘志丹、惠子俊带领红三团北上，红一团在南线牵制南路敌人，南梁只留下游击队和赤卫军由习仲勋统一指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撤离，南梁政府随之迁到洛河川。

1935年，红军内部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干扰，根据地开展

了错误肃反，有些革命同志遭到监禁，甚至被杀害，灾难也直奔罗培兰而来。幸亏在习仲勋的帮助下，她逃过了被抓捕杀害的劫难，安全转移到游击队（当时陕甘边区各县已经成立了地方武装独立营，区、乡成立了游击队武装组织）。当年10月底，游击队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下寺湾又到了一些红军部队，罗培兰装扮成农妇到下寺湾察明情况。不料，被原陕甘边区政府的通讯员指认出来，为防止出现意外，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派出的中央红军警卫队立时住她，行动下了枪。警卫队的干部问：你是不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叫什么名字？”罗培兰被警卫队战士架住无法脱身，就大声说：“我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罗培兰，你们要杀就杀。”这位同志马上告诉她，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下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陕甘晋省已经撤销，现在成立了陕甘省，中央红军派朱开铨同志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是他派省政府警卫队寻找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回来继续工作。罗培兰被带回陕甘省政府，朱开铨听了警卫队的汇报后，诚恳地说：“党中央毛主席授权我负责筹建陕甘省政府，接管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是中央红军找到的第一个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要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派王首道率中央红军去瓦窑堡解救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现在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4围剿，已构成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采取南进北堵、向北压缩的态势，企图将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一举消灭。中央命令陕甘省委、省政府组织支前工作团，全力以赴配合红一方面军进行反‘围剿’。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首先把马锡五和杨玉亭同志找回来，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成建制同中央红军调来的干部合编，组成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朱开铨的话打消了罗培兰的疑虑，便表示先联络马锡五等同志。根据工作需要，朱开铨询问了罗培兰的资历后，又任

命她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科长、支前工作团干事，负责联络、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人员到陕甘省来工作，同时命令中央红军警卫队派两名干部带一个班协助罗培兰工作。很快马锡五、杨玉亭等干部和一些游击队员陆续来到陕甘省政府，成立了独立营。这是罗培兰第一次和朱开铨见面。

1935年11月底，党内错误肃反得到遏止后，朱开绘代表陕甘省委、省政府提拔重用了一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任命马锡五为陕甘省国民经济部长、杨玉亭为陕甘省财政部长等，完善了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体系，及时稳定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的情绪，新筹建的陕甘省各级政权机构迅速投入直罗镇战役的战勤保障工作中去。关于那一段的历史，朱开检回忆道：“为了纠正左倾肃反扩大化。我在红二军团，部队正往直罗镇方向运动，王观澜同志守候在甘泉县下寺湾的路口，他大声叫：‘开铨同志停下来，不要走了，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区，毛主席提议你任中共陕甘省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辅助筹建省政府，主持省政府的工作。因为中央要培养当地干部，省政府主席由当地干部担任，要搞好团结，陕甘边苏区是全国唯一没有丢失的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我们中央红军人生地不熟，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做好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我立即赶往中共陕甘省委报到。当时筹建和主持陕甘省政府的第一个中心任务，就是组建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的干部里，从中央红军来的较少，大多是原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党政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与群众沟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运输队、向导队、担架队，开展筹款、征粮、运粮、收集敌情、肃清敌特、封锁消息、

隐蔽部队、转运护送伤员等后勤工作”。

罗培兰也及时认真地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归建，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陕甘省支前工作团，及时开赴郿县直罗镇战区参战支前，有力配合了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她回忆说：“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对西北话听不明白，他们讲的南方话，根据地的群众又听不懂，群众信任我们陕甘边区政府来的同志，我们就做翻译。我们告诉根据地的群众：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是为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打仗。支前工作团的工作很快就顺利展开，组织了数百人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完成了及时运输军需给养、带路和转运伤员的任务。整个根据地对敌军封锁消息，我们陕甘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唱道：‘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生动地再现了陕甘苏区军民在直罗镇战役中支前拥军场面。群众帮助隐蔽红军部队，敌军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群众还帮助传递敌人动态情报，坚壁清野。陕甘边区根据地回家的青壮年不多，有的军烈属家中只有老人妇女儿童，仍然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宁愿自己受冻，也把仅有的被褥给伤员盖上，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都献给红军。”



朱开铨

朱开铨（1901—1993），江西省瑞金县人。1926年秋参加瑞金县合龙乡车断隘农民协会，任农协宣传委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民协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当选为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兼任中共云集区委书记。1933年5月，

被任命为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8月至10月任长胜县(今宁都县南和瑞金县北部部分区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4月至9月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9月调任中央军委第五局特派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地方工作组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科长。同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中共陕甘省委执行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委委员、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

长征途中负过伤的朱开铨，在直罗镇支前工作中连续几天没休息，战役一结束就病倒了，陕甘省委派罗培兰护理。其间，中央红军干部罗梓铭从中当“红娘”，罗培兰正在举棋不定时，偶遇来省政府办事的老上级习仲勋，她征询他的意见时，习仲勋说：“朱开铨同志在工作方面信任和使用陕甘边区的干部，我看他坚持原则、为人正派，你同意与他结婚就向省委汇报。”当时陕甘宁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省政府主席是马锡五。得到习仲勋的鼓励，罗培兰向李富春汇报，同意与朱开铨结婚。很快，李富春代表省委批准他们结婚，并请马锡五、罗梓铭、肖劲光、李一眠、蔡畅一同商量，办好喜事。他们是陕甘宁省成立后第一对革命伴侣。他们没有金银玉佩，没有山盟海誓，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勉励、相互促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刻。

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罗培兰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1936年9月，由于对工作严肃认真负责，她由共青团员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任主席。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巡视团，由朱开铨任巡视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到：基层检查、督促边区政府政策法规的

执行，了解基层情况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干事，协助朱开铨工作。

1938年6月至12月，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12月，边区政府任命朱开铨为建设厅副厅长，主管农业。陕甘宁边区沟壑纵横，人均耕地面积不多，耕种方式落后，老百姓除了自给自足外，余粮不多，部队粮食和物资供应严重短缺，罗培兰和朱开铨深入田间地头，经过多方调查，仔细研究，向边区政府递上了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请求在延安附近成立一所农业学校，以便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提高农产品产量，满足供给需求。边区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并任命朱开铨为延安农业学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学校是当时在延安的鲁艺等八所名校之一，罗培兰为总务科长。校址设在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铺。朱开铨把建设厅内具有农林专业知识的20多名知识分子和一批等待分配工作的工农干部调到农校，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开学后，朱开铨带领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开垦：荒山，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培植果树，养猪喂牛等。没有多少农业生产知识的罗培兰，既全盘抓学校的教学工作，又抽空向知识分子学习农业技术，忙得经常忘记了给孩子做饭吃。那几年里，她的两个女儿经常把同桂荣大姨的家当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带领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农校当年除自给自足以外，还有不少富余的粮食和副食品。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解决机关生活困难的一种很好的办法。给后来的大凤川、南泥湾垦荒做了示范。1940年2月，朱开铨调任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第一任县长），马锡五调离后，他任陇东分区行署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做地方工作，守护延安西大门。这期间陇东磨擦事件频繁发生，国民党多次组织兵力进攻陇东，他与马锡五等配合三八五旅，为庆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培兰从1939年1月，到1945年9月间任陕甘宁边区

农业学校总务科长，为边区农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队伍。

1945年9月，罗培兰任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革命时期的干部是边学习边工作，按现在的说法是及时充电或总结经验，于是犯错误的情况比较少，就是个别干部有问题，也不是大错误。罗培兰曾说：“我的经历中没有过失。否则，早已为党捐躯了，见不到革命胜利。”充分说明了不同时期干部培养的重要性。1947年11月，罗培兰到中央土改训练班学习，及时掌握当则的形势和工作任务。1948年4月，她在中央组织部待命南下工作组工作。

1949年1月，罗培兰在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工作。2月，朱开铨调任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任处长。1949年5月至1952年底，她在江西省宁都专署任民政科长兼人事科长。这期间，朱开铨先后任江西省瑞金专员公署专员，中共赣南、赣西南地委委员，中共瑞金（宁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法院院长、中共宁都地委委员，中共赣西南区委委员，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江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等。1953年初，罗培兰调往江西省民政厅工作。全国解放不久，蒋家特务和美帝国主义暗中破坏祖国建设，残害国家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极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罗培兰，惨遭潜伏特务医生暗算，致使生活无法自理，评为“三等乙级”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此她只能默默地用心支持着丈夫的工作，祝愿祖国繁荣昌盛。1971年11月，她办理了退休手续，1981年光荣地从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职位上离休。

1955年4月至1983年5月，朱开铨先后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江西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江西省第四届政协政法工作组组长等职务。1993年1月16日，被毛泽东称赞的这位好后勤因病在南昌逝世。革命伴侣的离去，对罗培兰的打击很大。1995年12月，伤残了半生的罗培兰走完了人生的

最后一程路，在南昌病逝。

罗培兰的一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算不得轰轰烈烈，但堪称戎马一生。她做事情既泼辣大胆又心细如丝，要不 1935 年 12 月初，毛泽东连夜从陕甘省赶到瓦窑堡去，组织怎么就信任她，让其当向导！虽然她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努力配合朱开铨的工作，那是革命的需要，但也印证了“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她始终默默地奉献，哪怕自己的身体残废。她的心胸是宽阔的，比宇宙更敞亮更美好。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如若宝石，放存哪里都发光。她的几个孩子也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个个都成了祖国的有用之才。

人生这样应该就够伟大的了！

参考文献：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第一卷，第 364—365 页。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 12。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七卷，第 305—329 页。

《江西日报》——“朱开铨同志生平”，1993 义 20 第三版。

《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 年 5 月，第 122—135 页。

《江西省党史资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第十一辑（中央苏区粤赣省赣南省专辑），第 24、197 页，1989. 10。

《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 11。

《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5。

《浅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衔接问题》——朱春宁、杨斌、朱瑞华。

《罗培兰简历》——朱新宁、朱春宁、朱红（罗培兰之子、之女）。

被谢子长称为“知己难遇”的女革命家

——尤祥斋

尤祥斋（1912—2006），乳名尤芝兰，原名尤香斋，又名刘芝兰。人称塞上女杰。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庆阳环县妇女部长，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主席，安定县第一所女校创办者，晋南工委妇委书记，临汾人民医院院长，北京妇幼保健所所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人事科长，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中国中医研究院顾问（副部级待遇），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曾经是原西北革命领袖、反帝同盟军领导人、南梁革命烽火的播种者谢子长的夫人。

尤祥斋 1912 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县。尤家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大户人家，她原名为香斋，是尤氏家族中长辈给她命的学名，希望她成为家人理想中的大家闺秀。不料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到米脂县，她随改嫁的母亲到刘家，改名刘芝兰。尤祥斋少时就读私塾，1924 年在米脂女校读书。1927 年考入米脂县“三民”二中学习，期间加入“学生联合会”、“妇女促进会”、“读书会”等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后来考入榆林女子师范，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尤祥斋不但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反而以更加坚定的革命信念投身于党的事业。从榆林女子师范毕业后，她开始在榆林县镇川堡教书，不久又到安定县（今子长县）创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女校。在此期间，她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努力传播进步思想，为党的事业培育人才、储备力量。同时，还以自己微薄的收入作为经费资助党组织开展工作。

1926 年，在女校创办人王璧的介绍下，年仅“岁的尤祥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早期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不久，她接到当时在安定县革命武装中任连长的谢子长的信，信中给予她很大鼓励（此后一直通信往来长达七年之久），使她真正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之中，这时期她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尤祥斋。更名后的她从此以薪

新的姿态开始新的人生。

尤祥斋参加革命后，经常来往于米脂、镇川和榆林之间，开办平民夜校，建立妇女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带领妇女姐妹们同封建礼教抗争，在米脂县的名气很大。当时的米脂县，封建势力极其强大，歧视、虐待妇女如同家常便饭。尤祥斋担任米脂妇女促进会会长后，配合党组织在米脂开展轰轰烈烈的声援五州’惨案的爱国运动；积极组织广大妇女开展废除童养媳、废除缠足、反对利用各种手段迫害妇女的斗争，在周边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米脂县城有一高姓家的地主婆，经常虐待亲生女儿，民愤很大。尤祥斋了解情况后，带领学生将高家地主婆推出去游街示众，之后交由国民党县政府处理。这次斗争有力打击了顽固的封建势力，教育了民众，使身处最底层的妇女开始觉醒。这一举动也有力地推动了米脂乃至陕甘各地的妇女解放运动。

封建礼教在尤家根深蒂固，尤祥斋惊世骇俗的举动，震痛了她伯父的封建守旧思想，当伯父觉得对她进行的封建纲常礼教规劝和恫吓纯属徒然之后，便恼羞成怒，炮制了一篇反动文章，花钱刊登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大公报》上，对尤祥斋和其堂兄进行大肆诽谤，企图以舆论的手段征服他们。尤祥斋得知此事后，便与大嫂联名在该报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其时她不过十六七岁。

革命果实是用血汗换来的。尤祥斋同高敏珍等人不顾个人生死，积极配合党组织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打开了米脂妇女运动的新局面。这时组织安排她去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初，谢子长与刘志丹受陕西省委委派到达甘肃庆阳县开展“兵运”工作。是年冬，谢子长奉命调赴上海特科受训，临走时，他托人带信给尤祥斋，他在信中写道：“万两黄金易得，一位知己难遇”，表达了对尤祥斋的爱慕之情。1931年春，谢子长结业回陕北，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1932年至1933年间，尤祥斋任米脂共青团特别支部组织委员。



谢子长

1933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米脂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决定让尤祥斋和高敏珍等撤出米脂，去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她与高敏珍艰难跋涉到达北平，又辗转到达张家口，参加了由冯玉祥将军组织的抗日同盟军。1933年5月，到达张家口参加“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成立大会，并受到了冯玉祥将军的接见。随后，尤祥斋被任命为“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主

席等。此时谢子长也正在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他们两人书信往来7年，在张家口驻地却是第一次见面，感到格外亲切。不久谢子长和尤祥斋就结婚了。

尤祥斋是个极其认真的人，对于革命工作一丝不苟，在冯玉祥军中，她与担任“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组织部长的高敏珍一起，领导了张家口的妇女运动。经过她们艰苦的工作，在张家口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但是，由于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力，8月，冯玉祥被迫退出抗日同盟军，导致抗日同盟军的最后失败。不久，她们受党的指示，离开张家口，到达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11月中旬，中共北方局指派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谢子长回到了庆阳南梁。

1934年，尤祥斋在河北省担任党内交通职务。10月，一次在天津执行任务时，因叛徒告密，她身陷囹圄。在敌人的审讯逼供中，她始终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被判监禁两年半。当时她已身怀六甲，入狱后不久，她便早产生下一子。当时北平监狱环境恶劣，饮食极差，使母子俩的身体非常虚弱。为了孩子的健康，她不得不以

绝食等方式向狱方索要奶粉。在难友们的积极配合下，终于使敌人作出让步，孩子才得以活下来。为了表达抗日爱国之志，她在狱中和其他难友一起禁食七天，要求用省下的伙食费用支持绥远抗日斗争。

入狱后的第二年，敌人打算将尤祥斋等“政治犯”转送到张家口，进行更残酷的迫害。尤祥斋一行 60 多人，被用囚车送到北平的西直门火车站，准备押送上火车时，她与难友们乘转车之机，一边高呼“反对政治迫害！”“我们哪里也不去！”等口号，一边齐刷刷卧在铁轨上，要求会见北平高等法院院长，拒绝去张家口。反动军警疯狂殴打他们，甚至开枪恫吓，但是同志们团结一致，顽强坚持斗争，迫使火车无法开动。由于当时车站旅客多、“政治犯”也多，反动当局怕引起逃跑等更大的事端，最后被迫收回成命，把他们押送回北平监狱。当时尤祥斋是唯一的女同志，而且孩子还不满一周岁。就这样，尤祥斋在斗争中度过了两年半的牢狱生活。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这批“政治犯”才得以释放。20 多年后，同时参加狱中斗争的难友韩庄、王洁清每每回忆起这一幕，仍对尤祥斋充满敬佩之情。

1934 年 8 月 26 日，在攻打青涧河口的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但他仍带伤北上指挥战斗，致使伤势加重，才不得不到枣树坪附近杨道峁秘密养伤。但已经不能下床的他，仍然与刘志丹共同商议彻底粉碎敌人对边区“围剿”的重大问题。1935 年 2 月 21 日，作为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的谢子长，在他的家乡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年仅 38 岁。

1937 年 7 月尤祥斋出狱。她化悲痛为力量，怀着坚定的信念，带着孩子历经艰辛，终于于 12 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她开始被安排在边区妇联工作，后来调任陇东分区环县任妇联主任（县委对外称抗日民众指导委员会）。环县地处黄土高原偏僻山区，当时曲子以南属

于红区，以北则被马家军占领。不但生活条件极差，而且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土匪活动猖獗，政治环境险恶。当时蔡畅在庆阳县打开了工作局面，当地涌现出了一批妇女领军人物。庆阳县有王维舟为旅长的三八五旅驻守，反动派和土匪等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宁马”也不敢轻易冒犯庆阳县。环县则不同，它属于国共两党拉锯争夺重地，磨擦事件接连不断，今天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明天可能就被乌云压垮，打黑枪事件时有发生，工作极其艰难，尤其是妇女工作更加困难重重。尤祥斋不顾个人安危，发动妇女：开展反封建、求解放、争自由的革命斗争。她鼓励引导妇女冲破封建枷锁，摒除封建家庭旧习，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她还肩负着我党在此地的情报和交通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被捕牺牲随时可能发生。她的同事苏玉梅（妇联干事），经常深入敌匪集结之地，是位非常有经验的敌情侦察员，一次去耿湾做妇女工作时，被匪徒绑架，敌人软硬兼施，想从她的口里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苏玉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对敌人有利的字。后来她乔装打扮成讨饭的，深入敌匪区，侦察敌情。1938年4月的一天夜里，盘踞在甜水堡的土匪头子赵老五偷袭环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县保安队寡不敌众，被土匪层层包围，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张月英为救战友，不幸身亡。这一桩桩、一幕幕，尤祥斋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不让战友的血白流，尤祥斋不畏艰险，走乡串户说服广大妇女走上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在尤祥斋的坚持努力下，全县妇女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她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表扬，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4年，党中央为了给新中国培养后备干部，派尤祥斋到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期间，为了保证大后方医疗工作，中央先后任命尤祥斋为晋绥边区行署门诊副主任、晋南工委妇委书记、临汾人民医



尤祥斋和孩子们在一起

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尤祥斋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任北京妇幼保健所所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人事科长等职。1954年她参与筹建北京西苑医院。医一建成后，她被委任为副院长。新中国的医疗部门，不再是解放前的“先生”，它的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树立威信

的窗口部门，管理者的理念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党的形象。尤祥斋非常重视培养员工文化素养、道德素养和服务素质，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志到职工业余学校学习，这些学员毕业后又利用业余时间培训其他同志，使医院内部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习惯。她提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理念，要求行政部门全力以赴为医疗一线服务，并且要求以科学合理的膳食协助医疗。为了改进医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她不定期抽查医疗服务状况，召集患者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不断提高医院的管理服务水平。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

西苑医院归属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领导后，作为研究院的临床医院，医院的任务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好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团结、研究与医疗的关系等问题，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尤祥斋不辞辛劳，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后，认为：西苑医院应以中医药治疗为主，强调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因人而异，科研以临床研究为主。为了继承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卫生部从全国各地调进一些著名老中医，如黄竹斋、王文鼎、岳美中、郑守谦等，充实了医院医疗队伍。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专家们

的作用，把他们丰富的临床经验保存下来，发扬光大，给新中国医学事业积累宝贵的财富，医院因材施教，根据个人情况，让他们担任科室一把手，同时配备能力较强的西医为副职，年轻有为者作科室秘书，协助他们总结整理多年来的临床经验，著书立说。尤祥斋对这些老专家十分尊重，不但在政治上关心他们（帮助著名老中医岳美中、赵锡武、郭士魁等先后加入党组织），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成为他们信赖的朋友。

尤祥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遭到不公正待遇，但她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要求自己，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她复出工作后，对老同志倍加关心，只要有人寻求帮助，她总是不计个人得失，千方百计去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祥斋主管西苑医院的业务工作。她一手抓临床，一手抓科研。为了攻克危及人类健康的大敌——心血管病，她精心组织了一批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医师与著名专家郭士魁一同攻关，西苑医院第一项科研成果冠心 II 号的研制成功，开创了医院科研工作新局面。

1982 年，尤祥斋离开一线工作岗位，任中医研究院顾问。她仍然心系医学事业，不顾年老体衰，四处奔走，为中医研究院争取修建了教学、实验大楼。在担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期间，她虽然已年逾古稀，但无论开会期间还是到全国各地去视察，都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特别注重妇女工作，以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为己任，时时关注祖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和教育问题。她教育自己的儿孙不搞特殊化，要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她还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烈士后代，教育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做新中国合格的接班人。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祖国、家乡的教育事业。革命老区陕北不

但是她的故乡，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所致，直到本世纪初，依然贫穷落后，山高路远学校少，有些地方小学生上学要翻几个山头。尤祥斋急家乡父老之所急，拿出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工资捐助延安希望小学、谢子长希望小学和红彦希望小学。90 高龄时还动员、支持她的子孙捐资在老区办学，把中国共产党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传统、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质，播洒在了生她养她的黄土地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留下遗嘱：把骨灰撒在“无定河畔”（米脂县十里铺乡“六烈士”牺牲地），把她生前所积蓄的 20 万元全部捐给米脂中学，设立“尤祥斋女生助学基金”，以帮助在米脂中学就读的品学兼优且家庭困难的女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鼓励她们自强不息，早日成材，为祖国和社会多做贡献。

2006 年 9 月 18 日 12 时，陕北人民的优秀女儿，中国杰出女性的代表尤祥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 94 岁。10 月 13 日，尤祥斋同志的亲属完成了老人生前遗愿，将骨灰撒在了她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无定河畔。

革命生涯 80 年，热血奋斗数十载。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蒸蒸日上的祖国建设中，尤祥斋对党的事业都忠心耿耿，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始终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实践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贝多芬说：“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尤祥斋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2006.11.9。

《陕西日报》——“谢子长夫人尤祥斋捐资 20 万元设立助学基金”，记者：李燕萍，通

讯员：姬晓东，2006.11.14。

《党史文汇》——“开国上将与夫人”，2007年9期。

《红都童话：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延安往事回忆》。

革命“红娘

——马奎宣

马奎宣（1912—1998），四川优秀知识女性之一，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红军、文化工作者，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四届执委委员。她是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局局长，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王维舟的夫人。

马奎宣，1912年生于四川宣汉县。少年时聪慧好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学习。她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特别厌恶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具有新思想、新观念。1931年春，考入四川省开江县广福学校读书。同年7月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正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的川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由两路组成）总指挥王维舟喜结连理。当时敌人疯狂“围剿”，第一路、第二路红军游击队失败后，王维舟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朱德曾在1943年6月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撰文说：这一切努力，“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并迅速扩大，做出重大贡献”。此时，马奎宣也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剿”斗争，她积极发动群众，宣讲革命道理，活跃在革命宣传第一线。

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队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二王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这时马奎宣正式参加红军，成为红三十三军的一员。

当时军中女同志极少，她与战士同吃同住，从不以干部家属身份搞特殊化。而且与王维舟并肩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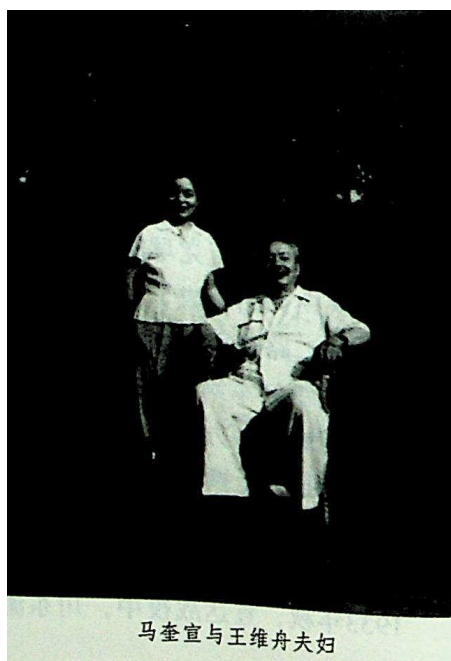
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方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

随后，王维舟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并随左路军行动。马奎宣随丈夫调入红四军军部，在医院做文书工作。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当时川陕苏区的很多红军家属都跟着红军队伍行进。马奎宣、王维舟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王维舟的侄女王新兰，出发时才10岁，最大的是马奎宣的母亲，已经年过50岁，她是长征史上唯一一位用三寸金莲踏过草地、三过雪山、历经艰难险阻而又不是红军战士的人。他们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跟着红四方面军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来，由于马奎宣的母亲年龄大，没有文化，老人家不愿拖累组织，便要求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

1937年，马奎宣在陕甘宁边区会计训练班学习，王维舟调往红军大学学习。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王维舟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部驻庆阳。马奎宣随之前往，在三八五旅医务训练班学习工作，任药剂科科长。1938年10月，马奎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

三八五旅初到庆阳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困难重重，首先是住房问题，接着便是军铜和物资问题以及部队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样

样都是大问题，件件都是要紧事。年过半百的王维舟为了使边区西大



马奎宣与王维舟夫妇

门的边防守卫和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受影响，身体力行，带领部队开展生产自救。马奎宣积极参与集体劳动，发动群众，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配合波涛（张千才的夫人）等人在地方宣传推广新接方法，培养地方接生员。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蚕食，陇东磨擦事件不断，反动分子时刻磨刀霍霍，我军伤亡事件时有发生，对于缺医少药的边区医务工作者来说，马奎宣等肩上的担子并不比作战人员轻。他们响应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自己采集、配制草药，并且广泛搜集民间单方，力图做到发展生产，治病救人。从1939年到1941年间，三八五旅在庆阳办的20多个工商企业中，就有新华、光华两个制药厂。

马奎宣家的孩子多，家庭负担重，但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王维舟在家时，担水、劈柴的活有丈夫干，但绝大多数时间王维舟不在身边，她也绝不麻烦工作人员。

马奎宣还非常关心三八五旅干部战士的个人生活问题。翻阅历史，三八五旅有几十位干部战士成了庆阳的女婿，走访耄耋老人便知，除了三对夫妇的媒人不是他们夫妻外，其他的都因有她这么一位“红娘”，才结成良缘。已故老红军樊乃卿曾回忆说：“三八五旅在庆阳时我参的军。由于我是当地人，王旅长夫人就常找我了解情况，有一次，她对我说‘小樊啊，你看咱们旅的许多干部战士，为革命出生入死，有些同志年龄也不小了还没有个媳妇，我看庆阳人好，进步女性又多，你看有愿意跟咱们旅同志交朋友的，就尽量帮忙，成人之美是好事嘛！只要你做得好，咱们请示领导给你记功。”我当时很高兴，更觉得是领导信任咱这新兵蛋子，就将自己熟悉的、思想好的、知书答礼的、或者是受封建礼教残害深重的女青年，介绍了十多位。例如蔡家庙乡史家店村的刘针民，就与后勤部科长夏继平结成伉俪……”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分区群众的生活也十分困难。1939年6月

的一天，王维舟帮炊事班挑水，见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庆阳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马奎宣见家中饭食少，立即去食堂买了馒头让她们母子吃饱，临走时不仅给带了10个馒头，还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儿俩。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是王维舟的一贯作风。一位患有“瘦瓜瓜”的老大娘请他给治病，但三八五旅没有条件给治疗，王维舟专门请示党中央，请求派外科大夫来庆阳帮助治疗好老大娘的“瘦瓜瓜”病。马奎宣作为医护人员，熬粥喂饭，侍候在手术前后。丈夫的使命、老百姓的安危就是她的责任。这个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到处传诵“马青天”和“王善人”的故事。“王善人”就是指的王维舟，“王善人”美誉的背后，自然少不了马奎宣的默默支持与帮助。

作为陇东党政军领导的王维舟、马锡五，坚持秉公办事，对地方上出现的违法违纪事件，不论大小，一抓到底。他们认为，当官就要管违法的人和管违法的事，要替民作主、惩恶扬善，让百姓真正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好作风。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王维舟在庆阳的逸事很多，他犹如阳光，明亮、识热，某种程度上淹没了马奎宣这颗明珠。其实太阳和明珠各有其光灿，他们给庆阳人民的热和光，永远留在庆阳人民心中。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舟，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马奎宣带着孩子随王维舟赴任，当他们离开庆阳时，居民们家家户户门上插着小红旗，门前摆桌设案，呈放各种食品隆重欢送，全城约2公里的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递茶、敬酒、奉糕点，倾诉别离之情，许多妇女围住马奎宣，硬要替她带孩子：

“你们行军打仗，孩子跟着不安全，我替您带着，等到全国解放了，我会把他们好好地交给您；您放心，我会用我的命保护他们的……马同志，您就给我们留个念想吧！”他们一行 300 人从上午 9 点入庆城北门，直到下午 3 点钟才出南门，已经赶不到宿营地了，只得重返原地。第二天，县里组织专人维持秩序，在鞭炮和数千人的掌声中他们才离开庆阳城。

1946 年 3 月，马奎宣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1948 年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工作。参加了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和延安收复后接收敌伪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工作。由于积劳成疾，1951 年 4 月，她不得不停止工作治疗疾病。

1952 年，马奎宣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加之当时刚刚解放，各种关系非常复杂，接收工作难度很大，她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先，不提享受。1954 年秋，根据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马奎宣在中共西南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人事科工作。

1955 年春至 1969 年，马奎宣在中共中央酿委员会作。她吃苦耐劳，工作兢兢业业，一贯信奉“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原则，出入办事从不用王维舟的车，认为自己的贡献不够，没有资格享用。对家人、孩子要求更是非常严厉，孩子们也都养成了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早在庆阳时，一次马奎宣发现孩子吃饭时只喝稀饭不吃馒头，问其原因，孩子说：“我们学校里有不少同学没饭吃，我把馒头节省下给同学吃。”她听后非常感动，并给予孩子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奎宣由于职务不高而得福，不仅自己免受了皮肉之苦，还保护了不少革命同志。已年近 80 岁的王维舟，却未能幸免，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不许他自由活动，但他们不顾个人



马奎宣夫妇与孩子们在一起

安危，仍尽力保护一些老同志。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被造反派揪斗追逐，王维舟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中，马奎宣和儿子给肖华擦拭血迹、敷伤口。总政治部副主任傅崇碧为摆脱造反派的纠缠，带着警卫员在王维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个月。李中权受到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长街王维舟家，向老领导诉说自己的不幸。

王维舟一方面鼓励李中权接受考验、注意

保护自己；一方面让夫人马奎宣详细记下李中权的履历，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澄清事实。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大批干部开始逐渐获得“解放”，李中权在北京军区空军被挂起来，没有安排工作。此时王维舟已经去世5年了，马奎宣铭记他的嘱托，四处寻找当年四川达县、宣汉县籍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为李中权证明。在马奎宣的积极努力下，空军政治部先后派人调查访问了张爱萍、王直哲、李开等同志，为李中权做了证明，澄清了事实，使李中权很快恢复了党籍，获得了清白。马奎宣的作为，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优秀品格。

1978年至1983年，马奎宣被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四届执委委员。从旧军阀时期力争自由的女性，到新中国女界的领袖人物她历经坎坷、风风雨雨的一生，锻造出她对党赤胆忠心，坚忍不拔，讲真话，干实事，廉洁自律，淡漠功名的品格。1982年9月离休后，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依然关注国家大事，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问题，关心着妇女的健康和发展。

马奎宣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其职务和级别比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要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议她向有关部门提出，但她却说：“不

能向组织伸手，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已经很知足了。”王维舟 1970 年去世后，马奎宣认为自己的级别不够，申请经组织同意，全家从原来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间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她病逝。其间，由于她的工资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很拮据，但她带着孩子们始终“不向组织伸手，不求特殊照顾，艰苦奋斗，甘于清贫”。

1998 年，马奎宣撒手人寰，追随她的革命伴侣王维舟而去，她的子女们依然遵循着父母亲生前的教诲，勤恳工作，认真干事，清白做人。

马奎宣一生为人低调，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今天找不到一张她的单人照片。她的孙女王陵对我说“很抱歉，奶奶生活很低调……时，我顿觉愧疚难安，试想我们这些小百姓动辄影集几大本，而为中国劳苦大众寻求光明的她，却忽略了自己，连单人照都找不出一张。

在那个烽火燃烧的岁月，只要能够走出家庭，参加革命，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女性，已经是佼佼者。她们抛头颅、洒热血，拿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换共和国的明天。她们用博大的胸怀，关心他又胜过自己甘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得劳苦大众的幸福，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仰的行为，她们的高尚品格，她们的人格魅力可与厓拓/日朙辉，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

参考文献：

《王维舟简历》、《七大党代表名录》—中央党史研究室。

《我的回忆》——王维舟，

《王维舟》—李中权、王定烈、李有义、王荒原等人的文章，宣汉县党史委员会编印。

《王维舟传》—宣汉县党史委员会编印。

《马奎宣简历》等—王庆生（马奎宣之子）、王陵（王庆生之女）提供，2010.12。

《庆阳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11。

永远贴心的刘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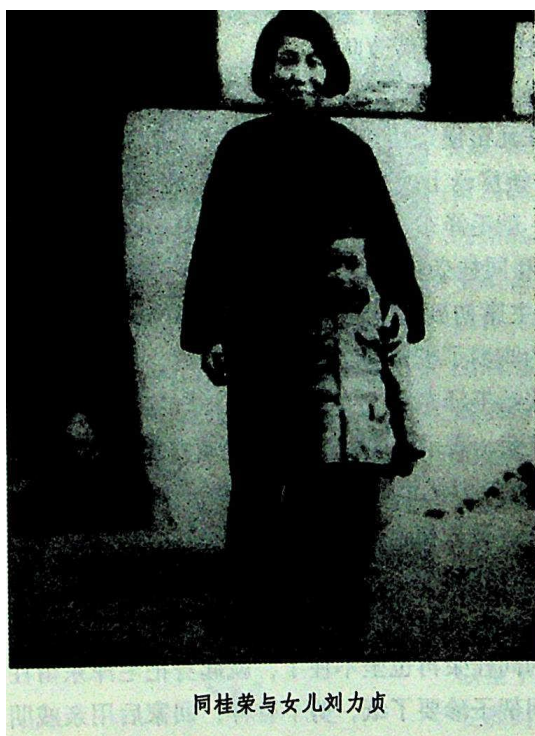
——同桂荣

同桂荣（1905—1999），陕西省保安县（现志丹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长期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她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刘志丹的夫人。

20世纪30年代初，革命烽火燃遍陕甘大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陇东的势力，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开始疯狂反扑，除了对根据地大肆烧杀之外，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及其亲属更成了他们捕杀的对象。1934年2月，庆阳军阀头子谭世麟“围剿”南梁根据地期间，派股匪到陕北保安县抄了刘志丹的家。幸亏群众报信，刘志丹家人亲属得知消息稍早一些，及时逃到深山梢林躲避。凶残的敌人只抓到了刘志丹的族弟和妹夫，将其杀害。穷凶极恶的敌人对刘家肆虐抢劫之后，又放火烧毁了房屋，挖了刘家祖坟。起初，同桂荣和婆婆藏在一处地窖子。地窖子里没有水，同桂荣和婆婆去沟里找水，被敌人发现，逼着她们带路找刘家人的藏身之地（敌人不知道她们就是刘家人），婆婆怕无法摆脱害了一家人，走到陡坡路窄处时，突然抱住媳妇滚下崖去，被灌木丛架住，幸免于难。为了逃避敌人追杀，不给亲戚邻居带来了灭顶之灾（曾在刘志丹的二妹夫家躲藏过，敌人知道后杀害了其二妹夫），同桂荣与两个弟媳妇带着8个孩子翻沟岔、钻梢林，躲藏在野外。为了缩小目标，她们一家人只好分散行动，同桂荣带着幼小的刘力贞8天未见烟火，靠随身带的一点少得可怜的炒面维持女儿的生命，渴了只能喝山泉水。同桂荣的二妹得知姐姐逃难在外，让丈夫费尽周折在山里找着她们母女，但同桂荣怕给妹夫家带来灾祸，依然坚持住在山洞里。后来妹夫送饭时撞上狼群，差点儿丢了性命，她才勉强住进了妹夫家的草窑。刘力贞回忆这段艰难的时日

时说：“那时候我们一家躲进了深山梢林之中，我奶奶、二婶刚生孩子，怕孩子哭，暴露全家，就忍痛把他们丢在山洞中（两天后乡亲们偷着把孩子送回给我们）。为了减小目标，全家人不得不分开躲藏着。我和妈妈藏在大渠沟的山水洞中，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饿了妈妈喂我一点炒面糊糊，她自己八天八夜不见五谷，只靠喝点雨水度日。母亲那时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带着一个尚在吃奶的我，在深山里又惊又怕，不知要躲到何日。”

可是，那时候刘志丹正在前线指挥打仗，顾不得回去寻找他的家人。幸而，习仲勋闻讯立即派人把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和同桂荣母女接到了南梁。同桂荣带着小女儿刘力贞从此参加了革命，成了南梁根据地最早的三位女革命者之一。



同桂荣为人干练，做事勤快，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识得大体。到南梁后，她眼看着同志们革命工作干得热火朝天，自己闲着算什么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她办起了“红军洗衣站”，组织妇女为战士们洗涮、缝补，干得有滋有味，同志们亲切地称她“同大姐”。后来南梁政府办了“红军被服厂”，她调到被服厂为红军做军服，由于工作忙，顾不

上照顾女儿，加之生活艰苦，致使同桂荣与女儿刘力贞 小力贞身体不好，常常患病，曾经患过伤寒病。她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为了保证前方的将士能够有衣穿”，一门心思地张罗单位的物资和战友们的事情，爱护士兵胜于爱自己唯一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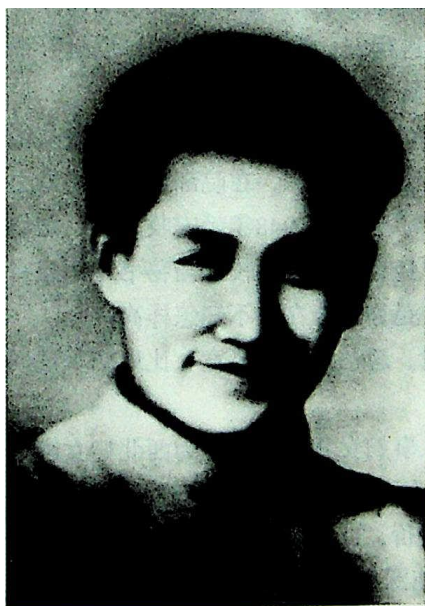
1935年9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区，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并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个时期敌人为了阻止中央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红十五军团战事频繁，刘志丹无暇顾及家事。一天，女儿刘力贞和小儿子高烧不止，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同桂荣只好让一个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医给儿子打了一针，给女儿吃了药丸，用药之后医生逃跑了。当天下午小儿子就死了，刘力贞命大，硬是从死神手里挣脱了过来。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她心灵的创伤和精神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1935年10月，崂山战役胜利，同桂荣心里的喜悦不亚于参战的将士们，她满怀希望地盼丈夫回一趟家，可得到的消息是刘志丹被抓了起来。肃反开始了，原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全部被抓了起来，她带着女儿在恐惧中煎熬日子。不久，她也被编入到了劳改队。

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肃反被立即纠正，周恩来亲自到监狱为刘志丹打开镣铐，毛泽东在瓦窑堡亲切接见了刚被释放的刘志丹。1935年11月，天气非常冷。瓦窑堡房子上的冰溜子有几尺长。红军战士棉衣很不充足，更谈不上棉鞋了，就毛泽东也不穿棉鞋。刘志丹看到毛主席天寒地冻还穿着单鞋，就回家和同桂荣商量，让她马上给毛泽东做一双棉鞋，并说：“你要快点做，毛主席初到北方，不耐寒。”同桂荣听了以后，就连夜赶做。她按照毛泽东的脚剪了鞋样子，找来黑布裁好，两夜之间就做成，并交给贺子珍，请她快给毛泽东穿上。毛泽东把棉鞋穿到脚上，非常高兴。后来毛泽东见到同桂荣，表示感谢，说：“陕北地方好，人更好。”同桂荣89岁高龄时，饱含深情地回忆道：主席连忙把我们娘儿俩领进他住的窑洞里，吩咐贺子珍接待，又去和志丹谈话了。贺子珍有病在床上躺着，见我来了，忙起

来端茶水。我问子珍，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她说，主席的脚长征时冻下病了，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听到这些，视革命同志亲如兄弟的同桂荣再也坐不住了，就起身把毛泽东留在地上的脚印量了一下，当即问贺子珍要了纸，剪下鞋样，回家后用亲戚朋友给女儿的零用钱买了用料，赶制了三天三夜。当毛泽东把棉鞋穿在脚上，连声说“合适，很合适”时，同桂荣的心里感到了莫大的慰藉。1936年底，历来有夜里工作习惯的毛泽东，不小心棉鞋被炭火烧坏，同桂荣又给他做了一双并衬上棉垫。后来她还给博古和国际代表李德等人也做了棉鞋，她细致的工作深受干部群众的好评。毛泽东工作那么忙，还经常关心她们母女的生活，一次，毛泽东问林伯渠：“刘嫂子住到哪里了？”全国解放后，1956年，毛泽东请同桂荣在怀仁堂看戏时，还对在坐的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说：“刘嫂子在瓦窑堡给我做的那双棉鞋，又棉又软又结实，穿上可暖和舒服了。”

1936年，日本人沿东三省一路向华北侵略，党中央决定东征，刘志丹奉命率刚刚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开赴前线。出发前，他对同桂荣说：“你要好好抚养孩子，让她将来好好念书，长大做个有用的人。



刘志丹

明天早上出发，你带上力贞来送送我！”这是他们一起生活多年来，刘志丹第一次希望妻子女儿为他送行。第二天因一位老同志来访，耽搁了送行的时间，同桂荣带着女儿赶到时，丈夫已经出发了，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成了诀别。

刘志丹率东征的二十八军，在清涧、米脂、绥德攻城略地大获全胜后，顺利进入神木苏区，从贺家川一带强渡黄河，拔掉了敌人在黄河东岸的据点。接着执

行毛泽东指示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策应红军主力。4月14日，在 frontline 指挥作战的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3岁。听闻刘志丹在东征前线阵亡，重病中的同桂荣立刻昏厥过去。组织上见她如此悲痛，没有让她看刘志丹的遗体。4月24日，中共中央为刘志丹在瓦窑堡召开了追悼大会，党痛失英才，当时正在住院的同桂荣更是悲痛欲绝，以至于刘志丹的遗体在瓦窑堡南门外安葬时，是中央派人用担架把她抬过去的。当同桂荣看到要下葬的棺木时，撕肝裂肺般恸哭，扑着身子要与刘志丹同去，在场的人无不泪如泉涌。同桂荣说：“我两个儿子，一个为逃避军阀抄家活活饿死了，一个被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医给的药害死了，接着志丹又阵亡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我怎么活呀！”当时刘力贞才6岁。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同桂荣的生活，贺子珍对她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1936年6月初，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贺子珍请同桂荣吃饭。毛泽东关切地问：“刘嫂子，病好些了吗？”并待同桂荣落座后他才坐。

下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搬到保安（今志丹）县城炮楼山下居住，同桂荣与女儿随之被安排在不远处的北山坡居住。7月，李敏出生，同桂荣早早地就为孩子缝制好了小衣服和小被子，还亲手接生了小娇娇。其实，她不只对子珍一个人这样，她始终以一位大姐、大嫂的身份和责任，对周围的同志关心备至。

同桂荣的心胸是宽阔的。作为刘志丹烈士的遗孀，她努力继承着丈夫坦诚热忱、团结同志、爱护士兵、意志坚强、顾全大局、不计较名利地位、对革命赤胆忠心、在挫折面前从不气馁等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和高尚品质。1937年1月，她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除了仍然给同志们缝补洗涮、帮助姐妹们照顾孩子外，还致力于解放区的妇女儿童事业。

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刘力贞在延安中学读书，同桂荣服从组织的决定，让女儿到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工作，在院部当文书。刘力贞从此成了军人，她们母女也一度中断了联系，1948年延安收复后，她们母女才得以团聚。两年没见面，女儿已经在延安大学校部当秘书，而且有了两年的党龄，她非常高兴地说：“要是你父亲在，不知怎样高兴哩。”一个女人的胸怀到底有多大？无法丈量，恐怕用“比天宽、比地阔”这词形容一点儿都不夸张。

全国解放后，同桂荣在西安长期从事妇女儿童工作，为西北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9年5月4日，同桂荣在西安逝世，享年94岁。她去世后，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人民日报》报道她去世的消息时评价道：“她长期跟随刘志丹同志，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英勇奋斗，不屈不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全国解放后，她长期从事幼儿教育，为幼儿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在十年/动乱中，她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同言桂荣虽然逝世了，但她的名字和她的事迹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里。

参考文献：

《西安党史资料丛书》—西安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西安市委组织部、西安市委
宣传部、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延安女性》——主编：寇雪楼，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1995年。

从苦难中走出的西北妇女领袖

——张子芳

张子芳（1914——），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曾任瓦窑堡女子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儿童团总队长，西安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妇女儿童部部长，抗大四大队女生队副队长，陕甘宁边区妇联执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湘南特委代理秘书长，闽西特委机关总部书记，陕甘宁边区妇女合作社主任，边区妇联主任，中共西北局妇委会副书记，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西北妇联主任兼西北总工会女工部长，全国妇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执委，劳动部人事司副司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云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云南省农村办公室副主任，云南省水利厅厅长。现任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张子芳祖籍陕西省安塞县，出生于安定县（现子长县）瓦窑堡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受大革命思潮的影响，1925年就读于瓦窑堡女校。这里不但是她采撷知识的源泉之地，也是她革命思想的启蒙地。在女校6年的学习过程中，她从一个父母的乖乖女成长为女校学生中的先锋骨干，担任女子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配合老师下乡开展革命宣传，反对虐待妇女、买卖婚姻、童养媳、女童裹足等；要求男女平等，帮助女性从围着“锅台、丈夫、孩子”转中解放出来，走出家门，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从此踏上了拯救中国劳苦大众的征程。1929年，由于工作出色，党组织批准张子芳加入共青团组织，并推选她为儿童团总队长。1931年，张子芳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为了筹集学费，她不得不暂时到延川县永坪镇县立女校当教师。1932年初，考入榆林女子师范学校，但她的学费只支撑了一个学期。俗话说：“家贫又逢锅底漏。”暑假后，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瘟疫双双侵袭瓦窑堡，辍学的张子芳随全家迁至安塞县平桥区桃堡湾村居住。为了能

继续上学读书，1933年她在安塞县立女子小学当教师。

1934年初，她再次考入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这个时期的大西北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蒋介石集中大批兵力在陕甘边区对红军大肆“围剿”。1935年陕北地区遭敌重创，榆林女师党团组织遭破坏，有志之士为寻求革命真理，纷纷设法投奔革命。1936年暑假后，张子芳考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立即参加了援绥募捐、宣传女性解放和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参加了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的示威游行等大型活动，积极投身到西安学联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同年12月中旬，张子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西安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妇女儿童部部长。她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宣传队到陇海铁路以西各县，沿凤翔、扶风、岐山、武功一线，宣传西安事变促进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及“张杨八大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群众中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年轻的张子芳来说，这一段求学之路乃至人生的路程是艰辛的，也是积极、奋发向上的，如果没有那一段的奋斗经历，她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



青年时期的张子芳

1937年初，党为了培养高层干部，从基层选拔了一批工作能力强，又具有极强党性原则的同志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张子芳就是其中之一。其间，她任抗大四大队女生区队副队长，毕业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分管组织工作。

1938年3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上，张子芳被选为边区妇联执行委员、常委、组织部长。从组织角度上讲，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担负起了更重大的责任。从个人生活

角度来说她开始了悲壮的人生历程。

到妇女部作不久，在边区妇女部部长李坚贞等姐妹的热心关怀下，她与从南方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军干部、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涛同志结了婚。王涛是在南方艰苦的革命时期，经受过大风大浪锻炼的革命干部，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工作能力极强，为人忠厚，性格开朗，深受干部群众爱戴。那个时期的条件不允许你查人豕几代人的底细，甚至工作关系和工作性质不同，夫妻双方之间都不甚了解，只凭着一种对革命的信念和执著，走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出生入死，然而感情却是笃深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之际，日寇大肆侵略中国，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关头。根据需要，党中央决定把部分有较强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分批派往抗日前线和国统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底，王涛被派到他曾工作过的湘南地区，担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对外称“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主任”。一面坚持游击战、运动战，保卫和扩大根据地，迅速恢复和发展湘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一面集结、整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对敌作战。

1938年8月，根据组织安排，张子芳调入湘南特委负责妇女工作兼特委训练班主任，不久，任特委代理秘书长，协助王涛工作。从此，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他们既是相依为命的人生伴侣又是革命战友，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见证了他们的意志和情谊。

1939年，在全国各族人民艰苦抗战，抵抗日军侵略的紧要关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全国磨擦事件频繁发生，反共大潮一浪高似一浪。6月，反动派枪杀了新四军驻湘鄂赣边区通讯处几乎所有的主要负责人，制造了

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8月中旬，反动派的魔爪伸向了湘南。张子芳回忆道：“早晨，我们从内线得到敌人巧于当天上午来偷袭翻南通讯处（特委），王涛同志马上安排我和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彭大保同志转移文件、枪支等重要物品，并要我们帛下雜备应付敌人。随后，他到特委分散在城内外的其他各个点布置整个机关的转移工作。他走后不久，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就包卫了通讯处，十多个人气势汹汹地直奔楼上办公室，恶狠狠地抓住我们，逼我们交出王涛等主要负责人和枪支、文件等，我们说：“我们既没有持了一段时间后，他2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就开始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地搜起来，足足了两三个小时后，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恼羞成怒，连推带拉地把我和彭大保及我刚出世巧天的第一个儿子赶出大门，查封了通讯处，由于特委对突然发生的事变早已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因此，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为了其他干部群众的安全，他们在大街上直等到天黑，趁夜幕才来到一位熟悉的老乡家中，将孩子交给他们，请他们暂时收养（孩子不久就夭折了）。第二天，在铁路党支部同志的掩护下，张子芳去长沙找省委。到长沙后，根据省委的安排，她除了做部分机要工作外，主要转入了地下秘密交通工作。中共长江局任命王涛为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

1940年6月，张子芳准备随参加党的七大的王涛回延安，结果被国民党政府扣到桂林长达半年之久（刚到桂林不久生下了儿子）。这期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疯狂地掀起了反共高潮，全国形势更加紧张。12月接中央指示，王涛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他们立即带着半岁的儿子，经湖南、广东，翻山越岭，躲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直奔福建闽西，年底抵达特委所在地龙岩。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又将孩子送给山下的老乡抚养。张子

芳回忆说：“当时这位农民也有一个和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小的男孩，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和一心一意地照顾我们的孩子，他竟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后来，当我们听说这件事后，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并深深体会到了闽西人民对革命的一片深情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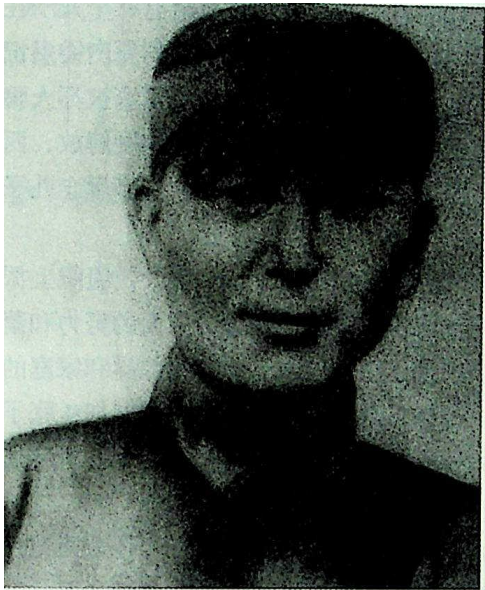
1940年到1942年，是我党在闽西一带工作十分艰难的年月，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皖南事变之后，敌人对我党实行了包围和封锁，企图用血腥手段切断党和人民的关系。党组织在生产自救中，有时为了解决一些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山与群众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大多数人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但也有极少数革命败类充当了叛徒，对革命同志带来生命危险。1941年9月21日，在叛徒的带领下，国民党军警突然偷袭了闽西特委（史称闽西事件），王涛在一面向敌人还击，一面指挥同志们撤退的过程中，中弹牺牲，怀里还紧紧地抱着文件包。为了不使文件落入敌人手中，长子芳毅然从丈夫身上取下文件包和驳壳枪，返身钻进了身后的树林。丧心病狂的敌人在撤退时竟然残暴地将王涛的头割去装在木笼子里，挂在龙岩城墙上示众数日。王涛的牺牲不但是我党的重大损失，更给亲眼目睹心爱的人牺牲全过程的张子芳心灵上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王涛牺牲一个星期后，他们的第三个儿子降生在闽西山区的茅草屋里。当时任何生活用品都没有，而且战友中只有张子芳一个女同志，她回忆道：“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剪刀，我只好自己动手，用一把小刀割断了脐带，然后用一块包袱皮把他裹起来，放在草地上晒太阳；当时天气很冷，我又没有奶，孩子直哭，我就把他抱起来放在我的腿上，看着他又冷又饿的样子，不勉感到一阵心酸。心想，照这样下去，他是活不了的，而且哭闹可能招引来敌人，给机关带来危险。于是，我盘算着，等天黑以后就让人把他抱下山去送给老乡。想着想着，我就疲倦地睡着了，等醒来后，发现孩子已经死在我的腿上。”接踵而

来的打击，使这位闽西特委机关支部书记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

张子芳不但胃病比较严重，还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又患上了夜盲症。组织上为了照顾她，年底，将她调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妇女工作(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考虑到王涛同志已经牺牲，为了照顾好烈士的遗孤，在特委组织部长魏金水的帮助和支持下，张子芳带着寄养在龙岩的儿子，一路白天躲在山里，夜间抓紧时间赶路，终于到达南委机关。在南委的半年里，她一边疗养一边做妇女工作，过了半年平静的日子。

1942年夏，行将调任南委的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叛变，南委机关遭到国民党中央宪兵队的突袭，史称“南委事变”。虽然在敌人到来之前有群众通报了消息，机关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也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们销毁文件的同时，张子芳果断决定，将孩子暂时托给姓萧的房东老大爷照看。张子芳回忆：“我对老大爷说：‘土匪要来敲诈勒索我们，我们要暂时出去躲避一下，过几天等情况好转了，我再回来接孩子。’”在孩子的哭声中，她随南委部分工作人员迅速地爬上屋后的山坡，当时孩子还不到两岁。他们前脚撤离，敌人后脚就跟进



穿军装的张子芳

了村子。没有抓到特委领导，但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特委人员留了一个孩子，就疯狂地吊打群众，逼迫交出孩子。此时，聪明的萧大爷，早已让自己17岁的女儿将孩子抱到外村亲戚家躲了起来，直到几个月后敌人撤走，孩子才回到村里。后来在村地下党组织和开明士绅的各种警告下，叛徒除了不时向萧家敲诈勒索外，也没再伤害孩子。萧家拿孩子当自己的

亲骨肉，精心呵护，供孩子上学读书。每每回忆起这些，张子芳总是非常激动。

南委被破坏后，张子芳于1943年3月回到延安，先在中央招待所参加整风学习，11月调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5月，她调任陕甘宁边区妇联任副主任兼边区妇女合作社主任，又投入到了边区的建设和大生产运动中。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和人民都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1947年2月，盘踞在宁夏的国民党军队在马步芳的率领下，大举进攻边区，陇东分区大部分地方失陷。6月西北野战军出击陇东，失地曾一度收复，随着野战军转移，胡宗南与青、宁二马即卷土重来。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烧、杀、抢、奸政策，解放区面积大大缩小。在物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地方部队和人民群众展开了游击战争。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着前线”的口号下，一方面组织灵活机动的游击队、武工队，以地方独立部队为骨干，保卫和收复解放区；一方面在竭尽全力支援前线的同时积极配合各级干部执行中央政策，抓好解放区的各项工作。

1946年底，张子芳受组织委派，带队到庆阳地区参加、指导庆阳的土改工作。他们一行四人，先后在庆阳县（现庆城县）的赤诚、白马、莲池、玄马等乡村和华池县部分乡村，深入农户，宣传动员群众，调节矛盾纠纷，盘查成分划分情况，使党的土改政策尽快落到实处。庆阳县大部分乡村处于马岭川道一线，马岭川直通宁夏，是陇东受国民党军队创伤最严重的地区，党的组织机构经常遭到破坏，百姓无安宁的生活，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保住革命果实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张子芳，不负众望，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在庆阳县的土改工作有序进行。

1949年9月，张子芳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代表大式，荣幸地参

加了开国大典。会议期间，她在与广东的代表交谈时，提到了自己有一个儿子在广东的事，并请他们带了一封信给当时担任中共华南局书记的原南委书记方方同志。幸运的是，寄养在萧家的儿子很快找到了，只是萧家被坏人骗怕了，不放心孩子的安全，一定要让孩子的亲人去领。全国刚刚解放，西北妇联的工作特别忙，为了工作，张子芳只能暂且压制一个母亲思念儿子的心情。

1950年1月，张子芳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这年夏天，组织上派西北妇联的总务科长高峰山以舅舅的身份去广州，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萧家人的帮助，孩子接回了西安。当时孩子已经10岁，地域的差异和家庭的变故，使他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但为了继承烈士的遗志，李握如（张子芳后来的丈夫）视如己出，他们给孩子取名王继涛，希望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1月，由于妇女工作的需要，张子芳又调回西北妇联任主任兼西北总工会女工部长。1952年2月，她的次女在甘肃兰州降生，为了纪念西北这块根据地，感谢西北人民对党的支持和帮助，她给孩子取名李兰民。年底，她调任全国妇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此后她任中国妇联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从民主主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张子芳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4年，张子芳调任劳动部人事司副司长兼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她待人诚恳，工作认真负责。在解放初期一切工作都靠摸索和创新的情况下，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年1月，她的小儿子李热辉在北京出生。

为了充实基层工作，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建设，1959年初，张子芳调往云南省，先后任农业厅副厅长、农业机械厅厅长、省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省水利厅厅长。不幸的是，正在为祖国建设发愤图强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从战争烽火中踏过来的革命干部遭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张子芳亦没有躲过这一浩劫，她被

“靠边站”了。这一“靠边站”就是10年，岁月不饶人啊！1978年，张子芳恢复工作，任云南省农林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调公安部工作到1982年离休。她非常惋惜那白白荒废的10年光阴。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张子芳不能忘记党的关怀和人民的养育，仍然心存歉疚的是觉得自己对党和人民做的贡献不够。1983年至今，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张子芳，总是尽力为社会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尽最大的努力提供、整理资料，编纂中国妇女运动史等。我们在敬仰之余，只有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

参考文献：

《历史瞬间》(1)——群众出版社出版，1999年。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华池县委员会，1996，3。

《张子芳简历》——张子芳、李延民（张子芳之女）。

《张子芳在陇东工作情况》——张子芳、李延民（张子芳之女）。

情系陇东的党的好干部

——齐心

齐心（1923—），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曾担任绥德义合区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研究员，后在中央党校、中纪委、广东省委、国家劳动部、人事部等单位工作。她是已故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夫人。

齐心出生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厚之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先后在北平当过中学语文教员，在孙岳将军部任过军法处长，后任河北省大成县、阜平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科长，黎城、长治县县长，解放前夕任傅作义将军的参议。北平和平解放后，任西北高等法院研



齐心与习仲勋

究室研究员。随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母亲邓耀珍是位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二个孩子相继参加革命，她也于1940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妈妈。齐心从小生活在这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家庭，又受父母优良品质的熏陶，对于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真正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是姐姐齐云。

齐云参加革命比较早。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她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就担任学生会主席，还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看着忙碌的姐姐，齐心幼小的心里时常激荡着对革命的遐想和向往。卢沟桥事变后，刚刚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的齐心，亲

眼目睹了日军铁蹄践踏北平的情形，激起了她坚决参加抗日斗争的决心。1937年8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她随姐姐编入第十二批平津流亡学生疏散队撤离北平，一路颠簸到太原平民中学继续读书。不久，她被赋闲在晋东南的父亲接回山西阳城县家中。其时的阳城已经建立了八路军抗日政权，齐心受进步刊物影响，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十分迫切，甚至曾盲目地偷偷从家里跑出来，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

1939年3月18日，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齐云，带着15岁的齐心，到山西屯留县岗上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她从此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7月参加了反击日寇“大扫荡”战斗，由于表现积极、勇敢，党组织于8月14日批准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年底，她从抗大十五期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军“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1940年春调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她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1940年秋她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被编入以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队伍。他们在作战部队的掩护下，历经40余日的艰难行军，到达延安。1941年2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作为中央党校征粮工作总团团员被派往陇东曲子县（住环县曲子镇东沟村）征粮，接着参加了合水县征粮扫尾工作。1942年春回到延安，因她对学习文化要求高，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到绥德师范（简称绥师）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齐心作为带队人之一，在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看到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

领导工作”。习仲勋就是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齐心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绥德地区是 1940 年解放的，当时属于新区。杂区国民兄军阀何绍南统治时间较长，加之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明确的认识，政治思想盲目。为统一思想，学校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对我党的反对派占上风。齐心一行从延安到绥德，主要工作就是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使受国民党顽固思想蒙蔽的同学有所觉悟。当时，她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学习，并担任支部副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生班任党总支委员，书记何仁仲，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由于党总支抓工作扎实认真，学校很快就有了新气象。

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不久，绥师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和“打石头”案件，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习仲勋亲自到学校作动员报告，恰巧齐心担任会议记录，这是齐心第一次见到习仲勋。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致使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产生对党不满的情绪。为了加强党在绥师的领导地位，地委调绥德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蹲点，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一方面，召开了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 3000 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延安青年的作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习仲勋亲自过问案件的审理，找学生党员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当时谈过话的有齐心和姚学融、白树吉等数位学生代表，希望他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

地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面。谈话对齐心影响很大。1944年初，西北局从延安调来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布鲁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绥师问题很快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不良影响，教学秩序转入正常。齐心回忆说：“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经过工作中的接触，齐心和习仲勋相互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齐心回忆说：“我和仲勋的恋爱，主要是通过书信表达的。早在绥师开展防奸运动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写的信，他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的信中谈到他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来信还谈到今后他可能去延安学习等等。一开始我觉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未有人这样信任和关注我。我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了一般同志关系。于是我就回了一封信，问他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没想到他竟复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

在李华生、宋养初两位介绍人的积极撮合下，齐心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她回忆说：“仲勋同志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

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经组织批准，齐心和习仲勋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在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婚后，习仲勋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齐心是一个很自信、自立的人。这一年的夏天，她从绥师刚毕业，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短暂学习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起初，在绥德地委、县委重点乡当乡文书。她工作热情很高，而且扎实认真，常常以一个乡或一个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工作，因此又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使党中央了解群众动向。这个时期，习仲勋就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边区根据地时的工作经验指导齐心。他说：“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在习仲勋的不断鼓励和鞭策下，后来齐心先后担任绥德义合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齐心回忆说：“在我一生中有两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在劳动人民的哺育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从1946年到1948年，边区政府组织的历次土改等群众工作实践中，经受风雨，锻炼成长。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遥（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在我心里始

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

1945年，习仲勋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齐心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1949年3月1日，她们的第一个孩子桥桥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出生。



习仲勋夫妇与女儿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习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人城式。这一次，他才第一次见到齐心的父亲齐厚之和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

1952年底，齐心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为了提高进足人员的政治水平，齐心被安排在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又有两个男孩儿习近平、习远平降生在他们的家。

习仲勋一贯支持齐心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她牺牲个人的事业来专职照顾家庭。儿子近平、远平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习仲勋照顾。当有人称赞习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他还风趣地加一句：“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习仲勋对妻子十分关心，希望她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早在1947年春，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和习仲勋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基础。齐心回忆说：“在安塞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时，我正在绥德工作，进行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参加了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领导的慰问团去了安塞，同去的还有马明方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同志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战争这么严酷，环境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他接着又说：‘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他们哪能与家人团聚？如果战争还要进行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虽然他当众批评了我，但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为有这样一位严于律己的丈夫而暗暗地自豪。”

勤俭节约是习家的家风。20世纪50年代，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较远。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家里没有请保姆，有四个孩子之家的家务活，全都是自己抽空干。齐心回忆说：“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仲勋说了，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尽管这样以身作则，依然免不了阴谋家对习仲勋的打击迫害。1962年秋，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竟然就以此来诬陷习仲勋，说他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他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这事如晴天霹雳，齐心顿时就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康生迫害习仲勋，是因为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习

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当时，齐心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她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分子”，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习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她主动要求参力卅“四清”去了。

1963年，也就是受隔离审查不久，习仲勋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他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当时，齐心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从此一别就是7年。“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于是，他受迫害的时间加起来长达16年之久。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在这些日子里，齐心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她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被列入康生的黑名单，在“五七干校”劳动了7年之久。齐心3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小儿子远平在读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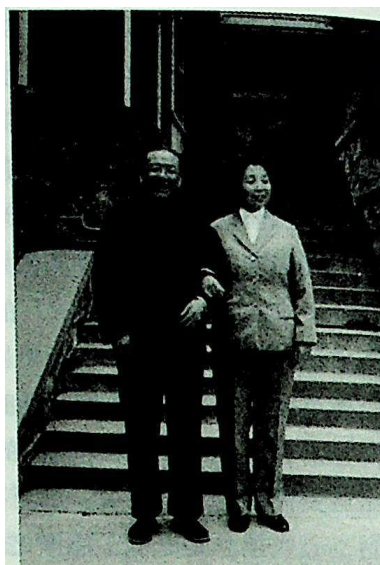
1972年冬，在齐心的努力之下，经周总理的批复后，他们全家人才可以每年团聚一次。1975年春，习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齐心同他去洛阳，他们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两间房子里，又历经了3年的光阴。这时间的习仲勋已经年过花甲。齐心说：“那段时间，习仲勋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其中有一位是附近农村大队支书李政的父亲，他过去以挑货郎担为生，与习仲勋同志

结下的友谊最深。他很爱和看水库的邓老头开玩笑，每次一见面，总像个淘气的孩子一般跟老人开玩笑：‘怎么我削舖村果园见到你啦！，那老人听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有些迷信，心里忌讳这么说，好像见鬼了。但是他又很矛盾，既想早见到习仲勋同志，又害怕他说那句话。可是习仲勋偏偏一见到他就说，像个顽皮的小老弟，让老人对他无可奈何。为此，我和女儿桥桥经常伴在一旁偷笑。有时候早上散步时，我们还到老货郎李老头家里去，如果赶上他家吃早饭，我们就吃上几碗红薯大米粥，那米粥的香甜至今令我难以忘却。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们也是深受感动的。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习仲勋下放该厂当过副厂长，在下车间劳动时拜的师傅）曾请我到 he 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了党籍），同年4月初恢复了工作。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1979年7月19日，中央批准了在珠海、深圳试办特区。由此，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期间，齐心一直陪在丈夫的身边，协助他的工作，为发展特区经济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文件指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11月底，习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直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五十五年了！”齐心回答。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勋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接着又说：“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

2000年6月19日，已是77岁高龄的齐心受习仲勋的委托，同儿女一道沿着习老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访搜集翔实资料，看望父老乡亲，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他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来到革命老区环县洪德乡原环县县委机关旧址，老人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光前裕后”，勉励当地干部群众继承革命先辈遗志，造福于后代子孙。6月21日上午9时，齐心来到当年她征粮时住过的曲子镇东沟村，当地父老乡亲奔走相告，蜂拥而至。同饮一泉水，朴实的齐心与乡亲们



齐心与习仲勋结婚40周年合影

有叙不完的手足情。在庆阳县城，陇东中学的师生们早早打出了“热烈欢迎齐心大姐回访老区庆阳”条幅。老人非常激动，为庆城县委、县政府留下了“弘扬革命传统，开创美好未来”的题词，真诚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庆阳人民的深切祝愿。

华池是习仲勋等人当年创建的我党在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齐心看望当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刘巧儿”时，写下“开启一代新风”：“巧儿”也连夜赶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送给她。

齐心又来到了列宁小学，在孩子们“热烈欢迎齐心妈妈回访南梁”

的欢呼声中，她勉励孩子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成才，报效祖国。”望着南梁那高耸入云的革命烈士纪念塔，齐心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那每一条碑文、每一座浮雕都浸着烈士的鲜血啊！她激动地写下了“南梁革命根据地永载史册”。林镇乡寨子湾的路不好走，但她坚持步行，她说：“当年革命先辈能走，今天我自己就能走。”多么淳朴、善良的老人，不忘记夕日同志情，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

齐心习仲勋的贤内助，与习仲勋风雨相伴 58 个春秋，她一直把习仲勋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她始终与他并肩战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党忠心耿耿，教育后代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优秀的品质。

参考文献：

《陇东报》——何步清，张新合，2000.7.15。

《习仲勋传》——贾巨川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4。

《大地》——1998.7。

“中国网”——2009.5.25。

《纵横》——“我和习仲勋相伴 55 个春秋”，1999 年第一期。

《人民日报》——“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1978，12,20。

抗大七分校的女指导员

——王克然

王克然（1918—2011），原名王洁芝，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成员，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七分校女生队二队指导员、后方留守处支部书记，热河军分区后方留守处党委委员，晋察热辽军大分校校部协理员、支部书记，二十军分区司令部后方留守处政委，铁道部武昌分局政治处机关总支书记，铁道部政治部办公厅行政管理司干部。她是曾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代理参谋长、一二〇师教导团团长，抗大七分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副主席，中共七大代表喻楚杰的夫人。

王克然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赊镇县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的父亲王德亮极其贫穷，生活无着落，不得不投奔到岳父家，在赊镇当学徒。后来慢慢做起小生意以谋全家生计。母亲也是贫农出身。童年时代，受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孩子不准走出家门。自幼喜爱读王克然，只能跟父亲和祖父学习简单的珠算、识字，并利用哥哥假期教她学习初小课本，14岁才在漯河郾城女校上高小。高小毕业后，她争取到了去开封考学机会，这是她在哥哥王润黎偷偷支持下，用绝食二个星期不吃饭的方式拼命争取来的。求学期间，家里不予供给（父亲虽然支持但家济权），只能靠大哥的资助，但总算坚持完成了学业。

1934年至1938年间，王克然分别在开封女中和开封女师读书。学是看新世界的大窗口。大革命的失败和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对青年王克然的内心震动很大，每有集会必能看见她灵活的身影。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在北京爆发。开封女中和其他学校一样积极响应，他们联合各学校相互声援，高呼“反对华北伪组织，组织援助平津学生爱国运动，惩办摧残爱国运动的凶手”等口号，举行声势

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撤换反动教员、释放被捕的（地下党员）老师回校任教。组织了学生纠察队，站岗放哨，派代表去教育厅谈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冰天雪地里，冒着刺骨的寒风，学生们前往开封火车站，卧轨请愿，坚持长达4天之久。对这段经历，王克然说：“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感慨万千，特别是青年时期的革命岁月，使我终生难忘。1936年，我们组织了‘课外读书会’，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继续闹学潮，坚决和国民党校方斗争。卢沟桥事变后，我积极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在学校的几年学习和成长经历，奠定了王克然以后的生活道路。1937年3月，经同班同学张浏英（地下党员）介绍，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组织）。作为一名进步青年，她的行为被校方保守派视为“不纯分子”，责备她说：“要革命就去延安。”王克然说：“早就听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那里是革命的圣地，那里有一批走过万里长征的革命火种，那里有真正抗日的军队，那里有知识青年向往的大学——抗大，那里条件虽然艰苦，却是中国的希望。要革命，去延安！”性格倔强的王克然，产生了奔赴延安的强烈企盼。1938年11月毕业前夕，她改名为王克然，在哥哥王润黎和他的同志王晓舟的帮助下，瞒着父母告别家乡，从开封出发，乘坐平板车、汽车、火车、徒步行走，历尽辛苦，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军旅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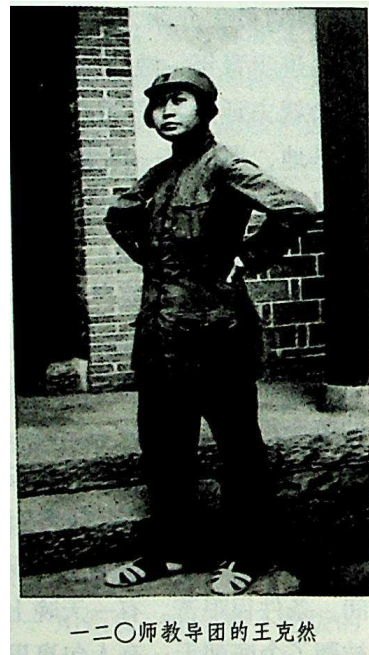
王克然起初被安排在延安陕北公学院和抗大学习与工作。她回忆说：“1939年2月底我们达到延安清凉山，临时编班。3月底正式成立女生队。开始住在一些旧土窑洞里，没有屋门，只能挂块破布当门帘，一个班住一间，条件很艰苦。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进来了小偷，有人的书包被翻了个底朝天；有人包裹里的照片、信件、钢笔和钱财都被偷光了；还有人连身上盖的被子外面的衣服也被偷走了；我和我们副班长（一个四川人）的东西在窑洞外面，万幸没有丢；但

是一会儿另外两个窑洞也喊叫着有人偷窃啦！

那时间，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小鬼（把新来到的年轻娃娃称呼小鬼）们吓得直哭。三月底我们正式编队后，就开始组织栽种蔬菜，挑水做饭，学习军事，学习文化。延安开始组织大生产时，领导想派我去配合文化队搞文化娱乐工作。我没有同意，宁可去开荒种地，种土豆。我们连队有130人，除了管理员、小通讯员和司务长三人外都是女同志。中学生成分为多，家庭妇女、大学生为少数。我们自己做六个人的饭，生活很不错，也很快乐，经常有米面吃；每个星期到十多里外的地方去背粮食和柴火；星期日可以到延河里洗脸洗头洗衣服。我们歌唱延安，歌唱延河水，歌唱清凉山！

6月份开始野外军事训练，搞演习。我心里疑惑，估计是要打仗了吧？连长和指导员作动员，要有准备，学习，攻山头，学习冲锋，听号音，等等；还要学习打草鞋，不会打草鞋的人不能毕业。七月份开始精简东西；尽量多打草鞋。

革命热情高涨的王克然每到一处，顾不了长途跋涉的辛劳，就积极投入到工作或学习中，深受领导干部和同志们的欢迎。1939年5月，经李行（指导员）、李诺（文书）介绍，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仰慕已久的党组织终于接收了她，她兴奋不已，行军、睡觉都会时不时地笑出声来。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前辈们用一双双铁脚板走出来的，王克然认为：“边走边打边学习，才是革命成功的硬道理。”为了保存实力，扩大革命根据地，1939年7月10日，抗大从延安出发开赴到晋察冀边区。王克然1940年1月初从抗大毕业，由于理论水



一二〇师教导团的王克然

平高，与群众的关系处理得好，又重视培养新党员，组织分配她到一二〇师教导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技术书记、统计干事、供给处指导员等职务。3月，经组织介绍，她与团长喻楚杰结婚都加入了共产党。

喻楚杰（1898—1984），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邵阳乡蔡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喻先顺、母亲方赏莲，都是勤劳俭朴的农民。他们生有7个子女，全家9口人，靠四田薄地、三间草房度日。1905年喻楚杰7岁时，父亲想方设法送他进了当地一所私塾读书。两年后由于生活十分困难，他只好去给别人放牛，这一放就是6年。15岁时喻楚杰就与父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由于干农活身体太弱，1917年父亲通过关系，送他到长沙顺昌木厂当学徒。6年的学徒生涯，他看到了军阀连年混战和劳苦大众生活的窘迫，立志从戎，“要把广大民众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1923年4月，入程潜部。1925年调人唐生智的第八军十八团。1926年5月参加了北伐军，并担任排长，参加了攻打长沙、平江、岳州、汀泗桥等战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0月喻楚杰考入湖南国民革命军独立五师一团一营一连当班长（团长彭德怀）。1928年4月，彭德怀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喻楚杰也参加了“闹饷斗争”。闹饷的初步胜利，使喻楚杰一方面认清了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的巨大力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另一方面更增加了对军阀部队去“清乡”、“剿匪”的不满，不愿再为军阀卖命。7月，跟随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参加了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1月9日，喻楚杰在江西万载经熊范安、方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喻楚杰积极动员亲人、同乡参加革命，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赞扬。喻楚杰家早年有6位亲人参加革命，其中有4位亲人在革命战争中先后牺牲。其胞弟喻缙云，1930年参加红军，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长、总后勤部顾问等职，少将军衔，1994年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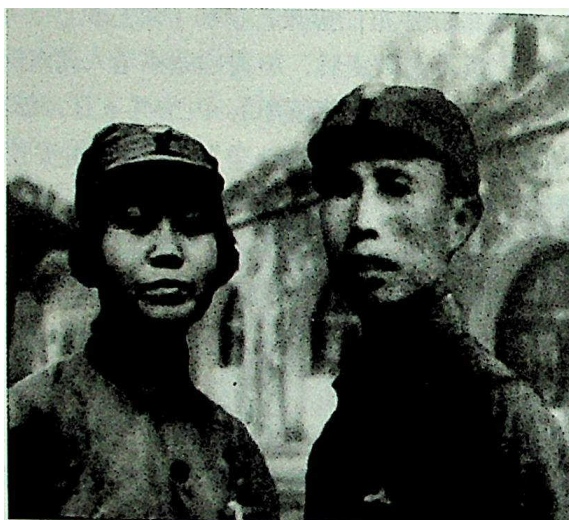
四次反“围剿”中，喻楚杰任红五军三师九团一连连长。他率部东渡赣江，参加了龙冈、东韶战斗，突袭建宁城、攻克泰宁、黎川，绕道千里，回师兴国。高兴好激战、方石岭大捷、攻打赣州、激战文英、攻战汝城及黄陂、大龙坪歼敌二个师的战斗，处处都有他的身影。

1933年7月，喻楚杰被选送到“红大”学习，校长是刘伯承。6月后毕业，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师当营长。1934年4月，任红八军团二十二师六十九团团长（原中央警卫师三团）。其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激战，他经历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头部、胸部、腿部等五次负伤，解放后被确认为二等甲级残废。

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率六十九团随红一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道道封锁线，渡过章、贡两河，到达湖南边界，围攻汝城，掩护红军主力通过。攻占宜章，进入广西边界。1935年3月，喻楚杰任红一方面军四师十二团参谋长。1935年3月，率部四渡赤水，直逼贵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越过夹金山，翻越打鼓山（雪山），涉过草地，于10月19日到达甘肃省华池县吴旗镇（吴起镇），11月直罗镇战役传喜讯。1936年5月，进入抗大学习（第一期），年底结业后调任红二方面军四师参谋长、代师长。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喻楚杰先后任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参谋长，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代理参谋长，一二〇师教导团团长三五八旅旅长。

1941年，根据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的精神及北方局与华北军分区关于增设抗大分校的批示，以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



王克然与喻楚杰夫妇

创办抗大分校。7月26日，抗大七分校在山西兴县李家湾举行成立大会，原一二〇师教导团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由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兼任，喻楚杰为副校长，政委徐文烈，政治部主任杨尚高。分校下设营长队、教导员队、连排干部队、参谋训练队、骑兵队、工兵队和地方干部队等八个学员队外，还附属一所陆军中学（喻楚杰兼任校长），共有学员2000多人，学校的日常工作由喻楚杰主持。由于日、伪军的袭击、“扫荡”，校址经常转移。喻楚杰带领七分校的同志积极投入反“扫荡”斗争。1943年1月，中央决定七分校及附属陆军中学从晋西北敌后迁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合水县，并令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从晋察冀边区迁到合水县，与七分校合并，组建新的第七分校，直属总校领导。1943年4月9日，第七分校及附属陆军中学1000多名学员在喻楚杰率领下，从晋西北兴县出发，在临县第八堡渡口西渡黄河，经葭县大会坪、米脂，到达绥德，经清涧，于4月13日到达延安。4月15日，全校师生在喻楚杰的带领下，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门前集合，在叶剑英总参谋长的主持下，朱德总司令、贺龙师长亲切接见了大家。4月17日离开延安，再往西行，经甘泉、富县，于4月26日到达陇东的合水县城。喻楚杰亲自主持建校，组建新的抗大七分校。喻楚杰任副校长（代校长），张启龙为政委。以开辟一个新营地，一边生产，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为办学方针。9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抗大总校副校长彭绍辉任七分校校长，张启龙为政委，喻楚杰为副校长。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七分校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学员分散于合水县豹子川、东华池、平定川、大风川一带，开挖窑洞，‘建筑校舍，建立“革命家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4年冬，抗大七分校已有师生6000余人，人烟稀少的东华池改变了面貌，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新气象，各种

文化娱乐、练兵竞赛等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劳动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此时。劳动生产改善了生活，又锻炼了军人的思想和革命意志。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大七分校竭尽全力为我党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后，抗大七分校解散改编。

1941年王克然和喻楚杰的第一个孩子烽星降生。为了支持喻楚杰的工作，在后方贺家川手术医院任教员的王克然，自己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1942年2月，王克然调一二〇师直属托儿所任支部书记，在晋西北后勤部勤勤恳恳工作，是留守后方的模范干部。1943年7月调任七分校女生队二队任副指导员，她以身作则，与学员一起参加劳动。庆阳的山川说不上多么秀美，崂梁沟壑为主体构成的地理环境，让人行动艰难，但庆阳人民用百分之百的热忱接纳了这些对革命满怀一腔热血的忠勇将士，厚厚的黄土层也养育了他们。这块热土上流过血汗的革命前辈深深地印在憨厚朴实的庆阳人民的心灵深处。王克然对她的子女们说：“我始终爱着庆阳这块土地。”

1945年4月23日，喻楚杰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11月，王克然随喻楚杰率领的“东北干部4月在二十军分区的基础上成立了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司令部，喻楚杰任司令员兼政委，王克然任后方留守处（乌兰巴托）党委委员，负责宣教工作，兼家属队工作。为搞好民族统一战线，她努力培养民族干部，扩大党在民区的影响。当时情况十分复杂，战乱时起，天寒地冻，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喻楚杰在二十军分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打开了统战新局面，壮大了党的力量，扩充了地盘，为辽沈战役的组织准备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负责宣教工作的王克然也是功不可没。

1947年10月，为给全国解放区培养、训练干部，中共中央东北

局决定在冀察热辽创办“抗大”式的军政干校。东北局李富春向喻楚杰交代了去河北省承德办学的决定。喻楚杰从哈尔滨带领十几名干部到承德平庄。

1948年春，冀察热辽军大分校成立，军大分校下设参谋部、测绘队、政治队、地方干部队等五个队，学员主要来自华北、东北军区的营、连干部，还从地方调了一批干部送到学校培训。喻楚杰任校长兼政委，赵复兴任教育长，孔亮任政治部主任，王克然任校部协理。到1948年10月，军大分校共培训干部5期，培训学员3000多人，为华北、东北军区和地方政府培训了大批干部。1948年12月学校移防到天津宝坻。1949年4月，喻楚杰奉命调到北京任护路运输司令部参谋长（后改为铁道兵团），从此走上了人民铁道的管理工作。

1948年年底，王克然调铁道兵团，随后转业到铁道部。在铁道部先后任武昌分局政治处宣传科总支书记，先后在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铁道部视察室工作，直到1982年12月离休。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克然自幼受大哥王润黎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反对封建势力，追求妇女解放。在校读书期间她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抗日救亡运动，投身革命工作，始终如一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喻楚杰结为伉俪后，从此在革命工作中相伴相随，留足迹于庆阳，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转战南北，直到全国解放，调入铁道部后从事宣传、组织、政工与党务工作等。作为喻楚杰同志的革命伴侣和坚强后盾，她平生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教育



王克然老骥伏枥，活到老，学到老

子女后代，忠于党，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使命。离休后仍发挥余热，上老年大学、帮助社区工作，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精神风范。

参考文献：

《我的抗大——抗大七分校学员专访纪》——CCTV“见证”栏目。

《青春在这里闪光》——甘肃省军区党史办。

《我的求学经历》——王克然。

《王克然简历》——王克然。

《难忘的岁月》——王克然。

《我的妈妈 与群星谈话记录稿》——喻群星（王克然之子）。

王克然同志资料——喻平（王克然之女）。

《碧血乾坤无索取——喻楚杰略传》——喻武星（王克然之子）。

《一代英豪》——湖南平江县委党史办、平江县委民政局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2年。

“马青天”身边的伟大女性

——李春霖

李春霖（1908—199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共产党员。曾任陕北抗属学校教师和代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陇东专员公署教育科科长、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陕甘宁边区妇女职业学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妇联会科长，西北地区妇联会秘书长、部长、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她是曾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陇东分区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最高法院副院长，被陇东人民称为“马青天”的马锡五的夫人。



李春霖在西北妇联工作报告发言

李春霖 1908 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市，原籍山东省。李春霖的父亲起初在铁岭一家铁厂做学徒工，在工作中，聪明好学的他发明了和面搅拌机、压面机、切面条机等面粉加工企业的机械设备，后来便创办了自己的机械加工厂，跻身于东北资本工业行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横行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李家虽然人丁兴旺，但无力挽救国难。深明大义的李父除了身体力行、积极帮助进步人士之外，更记不遗余力地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学读书乃至参加革命活动。李春霖的母亲相夫教子，是位贤惠、善良能干的家庭主妇。生长在这样一个生活条件优越、自然环境宽松，父母都是极具责任感的家庭里，李春霖从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她在沈阳读书时，乐善好施，敢说敢干，经常与同学们参加街上的示威游行。小小的她手举小旗子，夹在游行队伍里，嘴里喊着“抵制日货，打倒列强，支持国民革命”；嘴里唱着“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歌曲，脚下不停

地跑着。因为她年纪小，不跑就掉队了。

1931年，李春霖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年日本侵略军大肆进攻东三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同胞血染松花江。思想进步的李春霖放下学习，到抗战后方医院做救护工作。她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救护伤员，深受将士们的欢迎。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的5年时间里，李春霖有幸结交了一些进步人士，接触到了宣传革命的进步刊物，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联系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这时的她已经具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她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加紧侵略，爱国人士、青年学生纷纷投入抗日前线，保家卫国。李春霖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反日大游行，她们奋不顾身地卧轨示威，冲破重重阻拦，爬火车去南京请愿，呼吁国民党当局抗日救国，大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气概。但事与愿违，软弱的国民党政府并非热血青年想象的那样爱国，他们反而以各种理由不接受学生的请愿，甚至扣押学生。经过这次事件，不甘为亡国奴的青年学生更加看清楚了中国的去向，为国为家，他们舍弃自己的学业和优越的环境，投奔中国共产党，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李春霖联系了卓林（后为邓小平夫人）、王季青（后为王震夫人）等5位女同学，请求学校地下党组织介绍她们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去往延安的路途是遥远和充满荆棘的，弄不好会丢了性命。她们先随平津流亡学生到烟台、济南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再从济南到徐州，沿陇海线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1937年10月到达革命圣安。拿出缝在女孩子内衣里的介绍信，组织很快安排她们进入陕北公学和延安抗大学习。

1938年1月底，李春霖从陕北公学毕业，接着又到延安抗大学

习。这年4月，她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大结业后，她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工作。不久，调任陕北抗属学校教师、代校长。受过良好教育的她，不但热爱党的教育事业，而且待人热情、大方、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边区教育战线的先进工作者。1939年到1945年间，对边区教育工作有独到见解的李春霖，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陇东专员公署工作。她先后任教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充满青春活力的她，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文化人”。

从东北到大西北，从北平这座中国的文化先锋城市，到西北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山旮旯，李春霖追求到了她心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事业，也找到了她终身的好伴侣、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法曹英贤”马锡五。

马锡五（1899—1962），原名马文章，陕西省志丹县（原保安县）芦草沟村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6年毕业于保安县模范小学后，因家境贫寒，只得弃学谋生，为了生计他四处奔波，兵农工商样样都干过，历尽了人间世态炎凉，更看到了旧军警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种种黑暗。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国家、民族的希望在何处？青年时代的马锡五陷入深深的苦恼和失望之中。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开展建党和建立革命武装斗争的活动。当地有志青年，纷纷投靠到了他的麾下，马锡五下定了跟刘志丹干革命的决心。

1930年春，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县境内组织军队。马锡五闻讯，急速赶到金汤镇，见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马锡五被分配到军事委员会任管理科科长，负责管理修械厂、医院和白区小商贩的工作。1935年春，马锡五担任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部长。冬季，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12月，马锡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撤销，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机关设在曲子县，马锡五担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副专员。1939年秋，庆环分区迁到庆阳县城，改称为陇东分区，马文瑞任陇东分委书记，马锡五任陇东分区专员。

1940年春，经组织介绍李春霖在陇东妇联与马锡五相识。经过一年的接触、了解，1941年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李春霖调到陇东专署三科任副科长。

李春霖对工作不但认真负责、踏实肯干，而且具有创新，按现代的新名词就叫“干一行，爱一行”。面对陇东落后的教育面貌和不良的教育现状，她跋山涉水，走乡串户，冒着烈日酷暑、甚至中黑枪的危险，进行了大半年的调查研究。1941年9月25日，她的《陇东教育视察报告》完成。报告对当时的陇东教育现状及如何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增加教师薪金、加强行政领导、合并有名无实的学校、解决教学设备和制止学生流失等问题，提出了非常细致合理的建议和要求，为推动陇东甚至边区的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给领导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李春霖（右一）夫妇在庆阳县二十里铺参加劳动

1941年底，在蔡畅的撮合下，李春霖与马锡五结成了革命伴侣。这期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陇东磨擦事件接连不断。国民党虽然在

表面上承认了共产党和边区的合法地位，但仍然反对和限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众运动，对晚东边区采取内部颠覆和外部“蚕食”的政策。

蒋介石还把“磨擦专家”钟竟成调到西峰任甘肃第三区专员，不但，对根据地进行贸易封锁，而且还限制食盐等日用品流通。跪东这个延安的西大门，成为国共两党的拉锅之地。一些思想上波动大的群众和一些投机分子、受封建礼教毒害比较深的顽固人士，随之造出一些事端。跪东和全国形势一样，极其紧张。李春霖除了协调、管理教育工作，还挤时间做抗日救亡宣传，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配合其他干部发动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支持马锡五方方面面的工作。这期间她还带着嗷嗷哺乳的女儿马小林（生于1942年）。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对在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干部进行了表彰。毛泽东给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马锡五的题词是“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家和万事兴”。李春霖不但在工作上是个好干部、好党员，在家又是位贤内助、好参谋、优秀母亲。

1943年，李春霖任陇东专员公署教育科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办好教育，为边区培养人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教育事业积累经验，是她的工作目标。巩固庆阳陇东中学、庆阳女子高小、庆阳北关小学等学校的办学成果，总结他们的办学经验，整合资源，建设和开发乡镇教育，使庆阳成为陇东后方教育基地。她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目标竭尽全力地工作。

随着前方战事的变化，巩固后方根据地，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善人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安定和提倡人民过上新生活，教育人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我党根据地干部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任务也十分的艰巨。1943年3月，边区政府为了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各专区公署所在地设立陕甘宁边区高

等法院分庭，由专员兼任分庭庭长。依照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的规定，马锡五以专员兼分庭庭长的身份，开始从事司法工作。1943年夏，他亲自调查审理了陇东著名的“刘巧儿”婚姻上诉案，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1943年冬，他经过深入调查审理，昭雪了环县曲子“苏氏兄弟谋财害命案”，查处真凶，被陇东人民赞誉为“马青天”。《刘巧儿》原型封芝琴老人回忆道。上午，我到马专员家时，他们正在吃饭，我紧张得不知咋办，很善解人意的马夫人，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给我递来棋子和馒头，又急忙去舀汤，要我先吃饭。我要离开时，她又千叮万嘱咐，给我装干粮，还把我送到大门外，我当时感动得眼泪直流，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他们的住所，她笑盈盈给我招手。他们生活很简朴，房间里基本没有什么摆设，吃的馒头还没我的干粮白……”“马青天”的工作案边就站着这样一位贤惠豁达的女人李春霖。

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妇女工作战线曾一度急需人才。1946年，已经带着两个孩子的李春霖（马秦宁出生于1944年）服从组织分配，献身于女性教育和妇联工作，先后调任陕甘宁边区妇女职业学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科长等职。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不但为边区培养了土生土长的职业女性，而且为解放区妇女职业教育探索出了成功的路径，妇女职业学校当时非常受当地女性的欢迎。“李校长”的称谓之下，总有一串串故事，目前仍然有当地的老辈人津津乐道。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李春霖做事的原则。她忠诚的、保质保量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任务。1949年，小女儿马延林降生，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家庭生活负担加重。这年马锡五任边区人民法院院长，她也先后调任西北地区妇女联合会秘书长、部长、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务。工作责任更大了，但她的工作作风没有

变，她深入研究、大胆创新的工作态度没有变，致力于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决心没有变。她经常和机关干部一起学习、生活，凡要求机关干部做到的，她率先垂范，经常下基层和妇女干部群众谈心、了解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是她的家常便饭，干部群众都非常喜欢她。她为西北地区的妇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初期，中国的社会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新成立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困难重重。在社会制度还不健全、社



会管理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1954年，李春霖调入北京，到慰问老区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人事厅工作。她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员、代理党办主任、人事处处长、司法行政厅副厅长等

职务。司法工作是庄严而神圣的，容不得片刻的马虎。以细心、热情、实事求是著称的李春霖，加之长期在边区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总是深受同事们的欢迎，她到什么岗位，什么岗位上的工作总是更加有声有色。这时间马锡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按说她的工作强度应该弱化点、或者说应该轻松一些。其实不然，她这颗螺丝钉只有向紧上的份儿，特殊化这辈子与她无缘，包括她的孩子、家人。她的儿子马秦宁回忆说：“小时候我和姐姐住幼儿园和学校，每逢周末和假期，他们因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接我们，就让警卫员叔叔骑自行车接我们。母亲很少给我们做新衣服，衣服和鞋子常是补了又补，和其他一些高干子女相比，很是寒酸。母亲认为‘衣服穿暖就行了，小孩子没有那么多讲究，’”这种艰苦朴素、严格要求

自己、善于学习、渴望进步、勇于创新的作风，今天在马秦宁的身上依然体现得很明显。

国家要强盛，教育是根本。1959年3月，师范教育科班出身的李春霖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专职从事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又回到了她热爱的教育事业当中，从此三十年如一日，她任劳任怨，清正廉洁，公而忘私，一心为发展党的民族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和政治思想作风过硬的民族干部呕心沥血，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62年4月10日，为党和人民司法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马锡五因积劳成疾，不幸在北京逝世。法曹失英贤，举国同悲。首都各界在北京嘉兴寺举行公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公祭。相知相爱一生的爱人刚离去不久，还没有从悲痛中醒过来，李春霖就主动向组织上提出退出多余的房子，她认为不应该享受马锡五的待遇。理由其一是自己的级别不够，其二孩子无权享受。那时他们的孩子还都小，正在读书长身体阶段。但是她对孩子们近乎冷酷的要求和教育方式，甚至连我们普通百姓都想不通。马秦丁回忆说：“母亲是20世纪3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又是大学生，但她的职务和级别比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要低很多。曾有同志建议父亲向有关部门提出来予以照顾，但母亲坚决不同意，不向组织伸手，她说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同志我已经很知足了。母亲从不坐父亲的车出人办事，她经常教育子女：父母的待遇是组织照顾他们，分配给他们的，子女们决不可享用。”丈夫去世后，她怕给儿子带来负面影响，染上追求享受的生活作风，1963年，她把马秦宁送到新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戈壁滩军营去锻炼体魄，历练意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春霖也惨遭批斗关“牛棚”、“专政”、“劳改”，被赶出政府大院。

由于她不揭发别的同志，造反派们还打聋了她的右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场浩劫结束了。她积极为别人平反冤假错案奔走，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工作，她甚至担心批斗过她的同志有心理负担，经常找他们谈心，勉励他们放下包袱，勤恳学习和工作。

她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当时她唯一的儿子马秦宁从新疆回北京，连当一名工人的愿望都实现不了。但她却非常爱惜人才，只要对民族教育事业有益的事情，她会不遗余力的去努力。她曾力主将虽然没有文凭、但却有着丰富的舞蹈实践知识和技能丁英调入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事实证明丁英为民族学院的教学、发展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马秦宁从部队回来后，她就与儿子、女儿、保姆住在一起，房间狭小拥挤，学院领导向中央民委申请，按级别分配给她一套 200 多平方米的套房，但她谢绝迁人，而要了一套三间的职工宿舍和女儿住在一起，直到去世。子女和同志们很不理解，认为住马锡五的房子，是我们级别不够，你住自己级别的房子又碍什么了？李春霖说，房子是睡觉休息的地方，够住、能住就行了。现在很多职工还没房住，要多想想他们，心里就平衡了，至于职务那是革命工作的分工，没什么高低。”按副部级待遇，组织上要派车按时接送她，她婉言谢绝了，一直坚持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

她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以党的工作为己任，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马秦宁说：“与母亲阔别四十余年的三姨从新加坡回国探亲，当时我已经是一机部所属国企公司的总经理，当我提出要以公司名义派车去接远道而来的三姨并在宣武门烤鸭店为三姨接风时，母亲严词拒绝，批评我不应该用公家的车、花公家的钱，告诫我作为公司经理要带头遵纪守法，

不可滥用职权占公家便宜。后来母亲从银行取出自己的钱租了车去接三姨和在烤鸭店为二姨接风”

1982年，李春霖光荣离休，她每天早晨穿戴着儿子旧军装、军帽，在小区里搞清洁卫生，然后回家看文件、读报纸，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她是谁家保姆呢。1986年，她被评选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中央民族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受到中共北足市委和中央民族学院党委的嘉奖。

1987年11月17日是李春霖78岁的生日，这天她立下遗嘱：“今天是农历9月26日，是我满78岁的生日，78岁也算是高寿，按自然规律我在世时间也不多了，我一生对党对人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对后事做如下安排：1. 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以免浪费人力、物力和同志们的宝贵时间；2. 遗体献给医学院校，供教学解剖之用；3. 子女外出工作不要通知回来，不通知亲友和曾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如有联系，希望子女告诉他们说我离开人间了。”字里行间透着质朴，也正是由于这质朴的语言，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擦亮了多少人的眼睛，洗涤了多少人的灵魂。

从1939年到抗战结束，李春霖随马锡五一直生活、战斗在陇东这块黄土地上，她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和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不但刻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也将永远流淌在十分爱戴他们的庆阳老区人民祖祖辈辈的血液里。当我仔细阅读马秦宁寄来的沉甸甸的两大本资料时，眼里不时有泪珠滚出来；当我把李春霖的遗嘱说给我的上辈人听时，他们的眼里浸着泪花，嘴里喃喃道：“这么好的人咋就走了，她不是还和马专员到西河湾、五里铺收糜子来着吗？”忠厚的老区人民永远铭记着血祭黄土地的英烈们。1993年6月13日凌晨5时13分，李春霖走完了她人生的84个春秋，7欠远离开了我们。

她是平凡的，更是伟大的。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是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一生，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

参考文献：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庆阳地委党史办、华池县委，1996.3。

《李春霖同志生平》——中央民族学院，1993.6.18。

《我的遗嘱》——李春霖，1987.11.17。

《我的母亲李春霖》——马秦宁，2010.11。

《陕西人南下创业纪实》“激情燃烧的岁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12。

把“刘巧儿”介绍给世界的艺术家

——袁静



袁静(1914—1999),原名袁行规、袁行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边区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庆阳陇东中学的奠基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等,被誉为当代文坛的“长青树”。

袁静,祖籍江苏武进,191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封建大家庭。家族世代为官,赏文守规,以朱子理学为范本教育后代子女。家中女性亦代代受人敬慕,祖母能诗文,善书画,通医学,为人和善,济世无数,被光绪皇帝钦封为一品“诰命夫人”。母亲出身名门,身受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尤巧于工笔花并,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她的作品为当时名门闺秀中抢手之物,被当做宫廷教本,并被故收藏;亦长于吹箫、吹笛,慈禧太后曾几次特邀她在颐和园演奏,名震京城。袁静少时受家学影响颇深,父亲的严厉、谨慎,培养了她做事坚韧、细致的性格。祖母的宽容和济世救人的品格,使她深深懂得了大爱的含义,养成了无私奉献的精神。母亲教育了她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传承中国历史文明、文化的责任。她是拓展了的大家闺秀。

袁静先后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北京冯庸大学。在校读书时,既刻苦认真、好学上进,又活泼大方、乐于助人。其间,她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禁锢,看着封建军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

践踏，她无法做一个袖手旁观者。1930年她积极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了抉择，开始了革命生涯。即将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前夕，她毅然离开了那个关爱她的大家庭和生她养她的北平城。为了寻求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她克服重重困难，毫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冒着生命危险，曾先后辗转江苏、安徽、武汉、陕西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37年投入抗日浪潮，积极从事文化宣传和青年工作。其间，她与当过大学教授的地下党领导人赵梅生结婚。1940年春，由于革命的需要，双双赴革命圣地延安，赵梅生（字长远）从事党务工作，她经过在陕北公学短期学习，后来被分配到秧歌队，专门从事编写工作，袁静的文学创作生涯从此拉开序幕。

边区时期，袁静的文学创作素材来自民间，故事生动感人，韵味无穷，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多次得到中央领导人的赞扬。

为了解决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批示，在三八五旅所在地庆阳县城筹建“陇东中学”，并且亲笔题写了校名，1940年3月，陇东中学开始筹建，9月1日开学。从校舍到教师都极其紧缺，为了保证边区学校教育正常进行，1940年末，党中央派赵梅生和袁静到陇东中学工作。当时根据边区政府“少花钱，多办事”、“应想尽一切办法，能在半年内建成开学”的要求，校舍设在庆阳县城南街“文庙”内，没有教学条件，就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一切工作照常进行。赵梅生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兼任）。袁静教一个班的语文课，两个班代数课，三个班生理卫生课，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医疗条件奇差，缺医少药，学生生病无处治疗，导致小病拖成大病甚至造成死亡事故，无奈她又兼任学校医务室大夫。为尽快使学校初规模，师生自力更生、共渡难关。她还坚持参加校舍建设、开荒、种地、织裤织袜等劳动。当时除

了语文、数理化，还有时事、中国革命史等课程。教员的教学困难非常大，特别是语文课教学，因为没有课本，教学材料全靠自己去找（主要靠报纸和自己带来的少量的书籍）。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高低差距甚大，一个班级课程分几个层次上，袁静每每工作到深夜。

当时正处于抗战艰难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丧心病狂地推行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对陇东地区采取内部颠覆和外部蚕食的手段，不断挑起磨擦事件。国民党的封锁造成物资极其紧缺，百姓生活困难，当地的大地主、还乡团又十分猖獗。陕甘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庆阳县政府刚成立不久。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打败国民党对边区封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每个机关单位必须积极去完成的首要任务。学校更是重要的宣传窗口，袁静利用课余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夜里在灯下寻找材料写剧本，白天组织学生编排、导演节目。故事灵活多样，情节生动、有趣、感人。她教学生们唱“在动荡的年代里，荒漠的原野上，像孩提的降生，我们生长，我们唱歌，我们是一群鲜红的孩子……”等校歌，不但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而且这些抗日救国文化宣传活动，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指导作用，深受好评。

今天，当笔者在挖掘整理这些红色材料的时候，庆阳的许多老辈人，有人还能哼上几句她曾经编的曲子、表演几个动作，大多数人问她后来的情况、托付问个好，神奇的是末了大都会感叹一句：“袁老师啊……”有一种心灵深处的悸动，是深深地感动。袁静夫妇惠我陇东实多。作为师长，育我庆阳实多。因为赵梅生虽然在陇东中学任职只有一年有余，但他是陇东中学的奠基人，陇东中学开辟了庆阳新教育，可惜他在康生一伙所谓的“审干反特，抢救运动”中被捕。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一位在国统区出生人死都不眨赖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不久身体被摧残而病故于延安。袁静顶着极大醜痛，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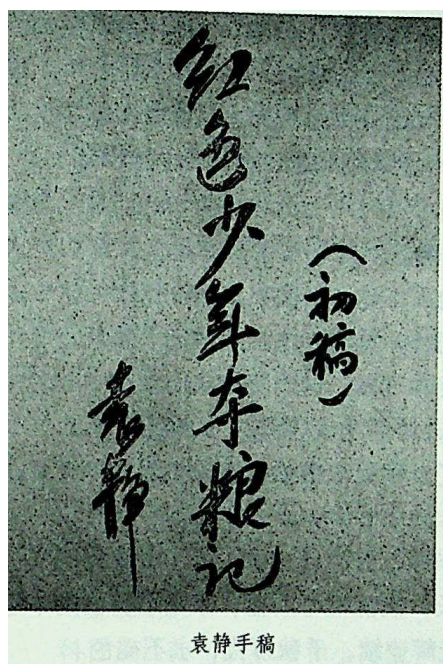
在庆阳工作。这期间，知道她遭遇的乡亲们给她送水果、送柴火和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油饼，用一双双信任而真诚的眼睛给予她默默的安慰，才是她得以坚强地挺住，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袁静夫妇为边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名字在重情重义的庆阳人心里，避立起了一座丰碑。

也是沟沟岔岔挣扎着生存的庆阳人民，用他们的纯朴、善良激励和感动着这位江南女子的创作冲动，庆阳的黄天厚土激发了她创作的灵感。如果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的司法实践开创了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新中国婚姻法的制订奠定了基础。那么，袁静呕心沥血，勤奋笔耕，为中国新婚姻法的实施做了马前卒，使土生土长的庆阳姑娘“刘巧儿”（封芝琴）走向世界，成为追求婚姻自主新女性的一个典型。

1940年，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但农村包办买卖婚姻依然盛行，华池农民封彦贵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认为娃娃捧儿是自己一手抚养大的，嫁给别人，必须有丰厚的彩礼才行。便不顾女儿个人幸福，几次卖女，法庭又生搬硬套《条例》错误判决；封捧儿在争取婚姻自主无望的情形下，几经周折，徒步40余公里到庆阳县城找陇东专署专员兼法庭庭长马锡五告状；为官正直、办案认真的马锡五，经过深入调查了解，于1943年3月二审改判，使封捧儿、张柏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维护了人民权益，宣传了婚姻条例，批判了封建买卖婚姻旧观念，惩罚了违法者，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成为当时边区的特大新闻。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给予高度评价，在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轰动了陕甘宁边区。不少文艺工作者根据此案，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袁静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成功地塑造了刘巧儿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包

办买卖婚姻现状，批评了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显示了边区劳动女性争取婚姻自主的新思想、新风尚，赞扬了清正廉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民请命的党的好干部“马青天”。“刘巧儿”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封建的先锋，极富有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由陇东剧团在庆阳首演，被延安文艺团体排演，风靡一时。后被移植为评剧，由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担任主演，许多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及外宾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袁静的第一部作品是1945年创作的秧歌剧《减租》，真实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深受干部群众的欢迎在解放区久演不衰。接着是《刘巧儿告状》（1946年），创作水平得到升华，为后来的红色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她被调到边区文协工作，与孔厥相继合作创作了中篇小说《血尸案》和歌剧《兰花花》，60多年来《兰花花》依然鲜艳地开放在中国人的心田里。1949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参加了土改和反“扫荡”斗争，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白洋淀人民与鬼子浴血奋战、坚持八年抗战的英雄事迹，与孔厥合作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



传》，不仅在解放区文学界引起轰动，也享誉整个中国文坛，被《人民日报》连载，又被翻译成俄、英、德、法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被誉为新中国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1950年袁静调中央电影局任编剧，翌年赴朝访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及中朝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深深地打动了这位人民作家，中篇小说《生死缘》（又名《中朝儿女》）一

气呵成。1954年任中国作家协会驻会作家，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淮上人家》。

1957年调入作协天津分会。“文化大革命”中，她不得不停下笔，从事上面安排的事务性工作。

袁静是个闲不住的作家，她把创作视为自己终身的使命。长篇小说《伏虎记》是她80年代的主要作品。中国的儿童读物一直很滞后，为儿童多做一些事情，充实、哺育他们幼小的心灵是袁静最大的心愿。1981年以后她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有中篇小说《李大虎和小刺猬》、《芳芳和汤姆》及科普童话集《众英雄和小捣蛋》等十余部作品出版。期间她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等。

袁静的一生是一非常忙碌，更是非常充实的。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又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她经历了胆战心惊的岁月和生死离别的悲戚，饱受战争的苦难。她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了庆阳老区子弟的心灵，培育了边区新一代革命火种。半个世纪后，回忆往事，她无不动情地说：“当时辛陇东中学，我经常组织学生搞一些文艺活动以丰富同学的课外生活。我一今还记得有个学生叫刘远达，平时很活跃，经常参加活动。一次演节目时一上台念的巧句台词是‘头痛脑子乱，想吃两碗臊子面，他那滑稽的模样和表情，逗得大家都放声大笑。后来他从学校毕业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一次在从西安返回的途中被特务抓去，敌人将他杀害在西峰南门外。据说，他临刑前毫无惧色，痛斥敌人，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确实是我们陇东中学的光荣和骄傲。陇东中学是革命的摇篮，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儿女。今天，我离开陇东中学已半个多世纪了，但陇东中学火热的生活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不能磨灭。”

同样，老区人民的心中有一块丰碑，为她菇立着。为了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为了新中国接班人的健康成长，袁静呕心沥血，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共和国的史册里记载着她的光辉业绩，千秋万代，永不褪色。

袁静主要著作目录：

- 《减租》（秧歌剧）1945年，延安新华书店。
- 《刘巧儿告状》（戏剧）1946年，延安新华书店。
- 《血尸案》（中篇小说）与孔厥合作，1947年。
- 《兰花花》（歌剧）与孔厥合作，1947年。
- 《新儿女英雄传》（长篇小说）与孔厥合作，1949年，冀南新华书店。
- 《生死缘》（又名中朝儿女、中篇小说）1951年，新华书店。
- 《淮上人家》（长篇小说）1959年，作家出版社。
- 《小黑马的故事》（中篇小说）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
- 《红色交通线》（中篇小说）1959年，作家出版社。
- 《春回大地》（长篇小说）1960年，百花出版社。
- 《红色少年夺粮记》（中篇小说）1962年，百花出版社。
- 《朱小星的童年》（中篇小说）197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 《伏虎记》（长篇小说）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李大虎和小刺猬》（中篇小说）1982年，上海儿童出版社。
- 《芳芳和汤姆》（中篇小说）1983年，辽宁儿童出版社。
- 《众英雄和小捣蛋》（科普童话集）1984年，浙江儿童出版社
- 《幸福的小舍哥》（中篇小说）与秦文虎合著 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 《水乡晨曲》（中篇小说）与秦文虎合著 1985年，江苏少儿出版社。《琼林仙动》（中篇小说集）与秦文虎合著 1985年，新蕾出版社。
- 《叮叮和当当》（长篇科普童话）与秦文虎合著 198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

《没脚的猫》(科普童话) 1987年, 湖北少儿出版社。

《怪人木罗汉》(合作) 1991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精豆子外传》(电视连续剧剧本、合作)。

《翡翠岛》

《金钥匙》

科普童话获《众英雄和小捣蛋》1984年天津市鲁迅文艺优秀作品奖, 儿童小说《小黑马的故事》获全国第二届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 《芳芳和汤姆》获天津鲁迅文艺优秀作品奖。

参考文献:

《中国作家年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 8。

《现代作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2. 5。

《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 页, 11。

《庆阳县文史资料》——政协庆阳县委灵会文卫法史工作委员会编, 1999. 12。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崔兰英

崔兰英（1927—），乳名爱华，原名崔杰。庆阳籍早期女革命家，陇东第一位留苏学生，延安时期在邓颖超身边工作，后在毛泽东身边任机要秘书，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彭德怀将军身边的电台台长，1950年赴朝作战，1970年转业到天津市邮电局任副局长。曾获得“天津市好市民”、“天津市优秀教育工作者”、“邮电优秀离休干部”、“老有所为精英奖”等荣誉。她是原三八五旅七团副营长、陕甘宁边区警一旅特务营营长、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聂德荣的夫人。

崔兰英1927年出生于庆阳县（现庆城县）城西道坡。崔家原来家境较殷实，她的祖父是个接受新思想比较快的人，眼看着国家一片混乱，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知书达理，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儿女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崔兰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境遇极为悲惨。母亲是位小学教师，父亲在黄浦军校是周恩来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南牙、被国民党杀害。父亲牺牲后，不久又生了小弟，不几天就夭折在了襁褓中。由于国民党到处追二人，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南京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后来周恩来通过党地下组织把他们转送到甘肃庆阳的新宁县（现宁县），托付在一个区委书记的家里，暂度光阴。哥哥被组织上接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区委书记就是崔兰英的亲叔父）。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国民党特务很快嗅到了一些气息，党组织就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六十里梁的地方隐蔽起来，他们孤儿寡母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呆了3年。在那衣食无着落的日子，母亲常教他们写字，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后来实在没办法生活下去了，母亲就带着他们回了老家庆城。庆阳城是军事重地，国共两党在马岭川

拉锯几十年，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有钱的人家不敢收养他们，没钱的人家又养不起他们，无奈的母亲不得不去投奔娘家。外祖父本来家境不错，但舅舅抽大烟把家败了。舅舅看这娘儿几个还能换点烟土钱，就偷偷地把他们卖给了当地一个土财主。在为母亲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被卖了。母亲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让他们赶快逃跑，到延安去找周伯伯，她自己在结婚典礼之后，在新房里上吊自杀了。当时他们不知道延安有多远，崔兰英和姐姐、弟弟三人只知道拼命地跑，他们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结果还是被那个土财主抓了回去。姐姐被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她被剃成光头与弟弟给财主家放羊，后来弟弟也丢了，那年她大约6岁。那段艰难而又惶恐的日子，使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挨打受气逆来顺受。她甚至认为穷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尤其是女孩子。

1937年，崔兰英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党组织派人找到了她，并接到延安，周恩来安排她在延安抗战小学学习，而且她还成了周恩来家的一员。那时的她不但患有肺病、夜盲症，还常常吐血不止，但得到了周恩来一家的悉心照顾，慢慢好起来。对此，崔兰英情不自禁地回忆说：“邓妈妈千方百计找大夫给我治病，她寻到了一个偏方：用白水煮猪肝，什么也不放，就这么吃。邓妈妈到处托人找猪肝，全延安所有的连队都跑遍了，哪个连队杀了猪都把猪肝要来。我简直吃不下，可邓妈妈非要我吃，我就吃，当药吃。慢慢地营养上来了，我也不知道打了什么针，还吃了点儿什么药，我的肺病好了，夜盲症也好了。”

1938年是崔兰英终生难忘的一年。3月的一天，她去书记员王才那里填一张表，王才发现这个姑娘的履历跟他一个当营长的朋友履历一样。于是，无意中她找到了哥哥。崔兰英说：“翌时我正在外边打篮球，就听那个营长大声叫我，我刚走进屋，他就急促地问：你姓啥？”

我说：姓崔。

他紧接着又问：你是旦旦吗？

我心中一紧，说：我不是旦旦，你怎么会知道我姐姐的名字？（姐姐

是元旦那天出生的，所以叫旦旦。

你是爱华？

对呀，我是爱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那你有没有哥哥呀？

有啊，他叫宝宝！他死了，叫狼吃了！（小的时候母亲跟我这么讲。）当时我还没彻底清醒过来。

对方已经哭成了泪人。他抓着我的肩膀：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我就是宝宝啊，我就是你的亲哥哥呀！’

‘你真的是我的哥哥吗？’，我使劲儿地问着，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分别的时候，哥哥给了她5毛钱，当时她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似乎抓着的是哥哥、是妈妈或者是她的所有亲人，她疯狂地跑着、跳着、喊着：“我有哥哥了，我找到哥哥了，哥哥给了我5毛钱……”偶然遇见了哥哥，对于一个好久没有得到过亲人关怀的孩子来说，那种兴奋的滋味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今天她再次回忆那段历史，仿佛整个人又进入了当时的情景。

为了给祖国培养各种人才，1938年年底，周恩来决定把部分优秀的烈士子女送往苏联去学习。手脚麻利、思维敏捷、办事大方、吃苦精神特别强的崔兰英被选中。在苏联她被分配学习译电技术。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分秒必争，很快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苏、德大战期间，崔兰英积极参加中国学生救护队，配合苏联医务工作者在医院护理伤员，这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战事，但人在后方，属于

间接参战。1940年，她们这批学有所成的孩子被接回国。此时的崔兰英成美丽的少女，她有着高挑的个儿，清秀的面庞，被分配到了部队。文人们都说她扮上妆更俊秀了，可她却哭了。后来她把自己剃成了个小伙子头，逃出文工团，跑到不远处的一个连队，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崔兰英无比高兴，每天早早起床，给大家刷好脸盆，倒好洗脸水。由于机灵勤快就当上了连通讯员。她每天兴高采烈地去给各排各班送报。一天，刚倒某排正和排长对口令的当儿，一颗子弹突然从排长门儿穿了过去，径直飞走了，排长当即就倒了下去，但他的眼睛始终直愣愣地睁着。崔兰英猛扑过去，将排长揽在怀里，大声呼喊：“排长、排长，你怎么啦？她不相信人就死得这么容易，但疯狂的敌人向战友们压了过来，哭成个泪人的崔兰英被战友拖下火线，她仍像疯了一样喊着：“他没死、没死！”当天下午排长被掩埋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睡梦中她都哭着喊排长的名字。这是她体验到的真正的残酷的战场。

译电员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常紧缺的，崔兰英自然不会只当个跑腿的通讯员。不久，邓妈妈就要她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经过邓妈妈的精心打扮，她像模像样地从周总理家出来。一出周总理的院子她就把鞋脱下来拿在手里，舍不得穿，她怕鞋子破了就再没有了。崔兰英回忆：“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说不准当时是啥滋味，只觉得心里特别紧张、特别害怕，连路都不会走了。直到毛主席笑咪咪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个14岁的小同志到我这里工作，我很欢迎你。’见我哆哆嗦嗦的，主席又说：‘你怎么哆嗦呀？发疟疾了？身上冷吗？’我嗫嚅着说：‘我害怕，我不会工作怎么办？’，毛主席安慰我说：‘不要紧，慢慢就会熟悉的，别人会教给你的。’，毛主席身材特别魁梧，但说话和蔼、幽默，我心里的紧张感慢慢消失了。”

崔兰英工作勤奋、认真、踏实，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有条不紊。她做译电员工作从没有出过差错，毛主席也比较欣赏这位工作兢兢业业

的小同志，后来要她改做机要秘书，发文件，通知其他首长开会等。毛主席很喜欢聊天，休息时间，在海阔天空的闲谈之中，工作人员的拘束感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当时字写得不好，特别大，特别长。主席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哎哟，你够伟大的啊！你字也写得伟大，人也长得伟大！，主席跟我开玩笑，我吓得直哆嗦，主席见我害怕了，哈哈一笑，安慰我说：‘我不是嫌你字丑。你的字大是大了点，但是没有错别字，挺好的。’，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你再好好练练。写字就好比一个人的门面。’”

在人们精神生活十分富裕的延安，物质生活一直困扰着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陕北这地方本来就山大沟深，气温寒冷，一年只收一季庄稼，农作物只有谷子、土豆、南瓜、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辣椒、高粱等耐旱、耐寒作物，农民本来就缺吃少穿，大批红军干部战士进驻延安，造成了生活物资更加紧缺，加之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吃不上咸盐、粮食，穿不上衣服。老百姓富点儿的吃个白面馍就算过年了。红军到达陕北，一下子增添这么多的人口，延安山洼洼里的苦苦菜根都被挖完。那段日子，毛主席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访问延安周围的农民。崔兰英等几个小女同志总是跟在他的后边挖野菜，做掩护。农民们看见毛主席也都高兴地打招呼：“老班长来了！”有很多农民还问她们：“那位高个子的炊事班长非常关心种地，是吗？”崔兰英走到主席身后，故意大声说：“班长本来就是做饭的嘛，当然关心种地了。”

1942年，全党全军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一年下来，延安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还改进了当地农民的种植习惯。瓜果飘香，蔬菜满园，牛羊满山，猪肥得睁不开眼睛，鸡鸭满院子跑。毛主席当时也有自己的菜地。试种棉花成功后，还组建了纺织厂，供销社组织搞纺织比赛，心灵手巧的崔兰英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枚

金戒指。当时毛主席鼓励她说：“别骄傲，要继续努力。一个人做点好事是应该的，谁都能做到，可一辈子都做好事很难，做不到。”这枚戒指一直跟随她到现在。

她深有感慨地说：在这位历史伟人身边工作，让我彻底懂得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要获得幸福的生活，完全靠我们自己；懂得了穷人为什么要反抗、要革命；懂得了什么是自由和民主，以至于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1947年底，解放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前方战事非常吃紧，机关大批同志支援了前线，崔兰英也被调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工作，在彭德怀的部队当电台台长，随一野的部队转战陕北。她业务熟练，收、发报准确，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带领出了一批业务素质极强的话务兵，为作战计划的准确实施、为党中央的安全转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彭德怀将军的嘉奖。

1950年，中国人民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喜悦之中，朝鲜战争爆发了，为保家卫国，捍卫和平，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11月的一天夜里，崔兰英所在部队紧急集合，开赴朝鲜，由于她业务能力非常强，分配在志愿军指挥部做译电工作，这一去就是3年。朝鲜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深受朝鲜人民的爱戴，让世界人民刮目相看。崔兰英在异国他乡又一次受到了灵魂的洗礼。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回国的路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跳呀、唱啊！途中遇到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聂德荣。由于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又多年不见，所以见面格外亲，彼此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在一起！崔二英回忆说：当时我认为他结婚了，他也认为我结婚了，我们俩就这么很自然地拥抱了。他把我抱起来抡了一圈，大声喊着：“哎呀，你到哪儿去了！你！”没想到这拥抱成了他们夫妇俩

的第一次拥抱。

回国后他们各自安排好自己的工作，然后两人约好见面，一起去看望周总理。一路上两人相互开着玩笑，欢天喜地。不曾料想，见面没说几句话，邓妈妈就叫他们俩结婚。崔兰英说：“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对邓妈妈说，老聂根本没向我提过结婚的事，他说他负过伤，身体有毛病。邓妈妈说：‘我身体也有毛病了！你就说，你从哪一方面不愿意和老聂结婚？人家老聂哪点不好，配不上你？没你长得漂亮？没你文化程度高？没你工作能力强？全国都解放了，他当师长、当军长，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还说不下个你！，临走邓妈妈又送给我一块四方的塑料桌布，当时国内还没有那个东西。不久，我就和老聂结婚了。结婚那天，邓妈妈又对我说：‘结婚以后要好好过日子，你要好好照顾老聂。至于以后离不离婚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你对老聂好不好却是个民族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老聂是为民族的解放而负伤的，你有责任爱他一辈子，照顾他一辈子。’，邓妈妈用这种激将的方式促成了我和聂德荣的婚姻。”

聂德荣（1900—1986），陕西富平县人。历任陕北中宜支队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后到三八五旅七团任副营长，陕甘宁边区警一旅特务营任营长。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赴朝指挥战斗，朝鲜战争结束回国，任某师师长。后任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

也许人生真有缘分之说。聂德荣在三八五旅工作时，就曾遇上过崔兰英。那时候在庆阳的大山里，只有七八岁的小兰英给地主家放羊，地主的孩子正在用咸麻草抽打兰英和她的弟弟，姐弟俩疼得哇哇叫，正在这个时候，聂德荣带着几个战士走过来，制止了地主孩子的暴行，弟弟乘机夺过咸麻草使舰抽打他们，聂德荣见小兰英被打成那个样子，就心疼地说：“你这个小女娃！怎么就不知道反抗呢？你怎么不知道把咸麻草夺过来打他们呢！让他们这么打你！你还不如你弟弟，你弟

弟都知道反抗。这件事情深深地印在了崔兰英的记忆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灰军装，红五星，我心里默默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对我们穷人这么关心，别就是天兵天将吧？女孩子天生就是挨打受气的嘛，他怎么让我反抗呢……”后来崔兰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聂德荣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当时的聂德荣长得相当俊朗，皮肤白皙，浓眉大眼，政治思想过硬，工作积极、踏实、肯干，邓颖超就曾经提起过这事情，只是当时崔兰英年龄小、工作忙，没有太在意，用崔兰英的话说：“那时我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似懂非懂的，也不大上心。”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大肆进攻陕甘宁边区，组织上派炮兵营长聂德荣和崔兰英假扮夫妻，去西安画地图，为进驻西安做准备。到西安后，聂德荣化装成国民党专员、商人或看风水的先生等，崔兰英则按当时流行装束，穿着高跟鞋打着伞，扮做姨太太，以作掩护。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靠着机智和勇敢，多次蒙混过敌人的跟踪、检查，20多天后终于准确地绘出了西安军事地图，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在此后的一次战斗中，敌人子弹从聂德荣的大腿胯横穿了过去，使他成了二等甲级残废，也成了战斗英雄。

婚后，聂德荣要她把原来的名字“崔杰”改为崔兰英。性格单纯、开朗的崔兰英，认为名字不就是个代号吗，就顺应他了。其实，聂德荣是个感情非常专注的人，他原来的未婚妻叫“刘兰英”，是位侦察科长，被日本人的狼狗活活咬死了，非常悲惨。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故人的怀念，崔兰英不但不吃醋，反而很受感动。他们更加相亲相爱，生活美满幸福。

崔兰英夫妇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彼此都有许多好战友，也有很多是烈士，他们为国捐躯了，有的遗留下来的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孩子还在嗷嗷哺乳，身后又没有其他亲人。这时候崔兰英除了大哭一场之外，就毅然决然地把他们都收养到自己家里，并

且对待这些孩子犹如己出。连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起算，他们夫妇先后一共有 8 个儿女。同事、战友们都开玩笑说他们家是个标准的幼稚园，聂德荣是园长，崔兰英是保育员。

崔兰英心直口快，为人正直、热情大方，堪称气度非凡。在部队是位好军人，是业务技术过硬的好干部，她既讲原则又非常关心战友，别人有什么事都喜欢找她商量，愿意听她的建议。到地方工作后，更是同事们尊敬的老干部、好大姐。1970 年，崔兰英转业到天津邮电局工作。那时候，大家除了搞好单位的基本工作和基础建设之外，干部职工每周都有义务劳动。她家孩子多，身体又不好，在单位和大家



崔兰英登万里长城

一起挖地沟、埋电缆，一天到晚已经精疲力竭，但倔强的她还坚持参加每周的干部义务劳动。把地方干部职工当部队的兵那样带，工作总是那么认真、诚恳、踏实，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符合政策

的事在她这关是过不去的，可是为工作的事情她却从不跟人计较长短。她对同事极其关心，谁有了困难，只要她知道了总是能帮助解决，哪怕自己今天没了饭吃，绝不让同志们空着肚子走出家门。同事们对她的评价是：

为人正直，平易近人。

1982 年，崔兰英离休了。她是一只闲不住的陀螺，总希望转着，可是一旦转起来，有种无形的鞭子给她的总是加速度。她认为离休只是一种形式，做事才是人之本能。人是社会的人，人活着就必须为社会做点什么。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人民开始醒悟、试图向世界迈出

脚步的年代，可基础设施总是跟不上新的步伐，比如“入托难”就成为社会的一大难题。崔兰英就和聂老商量，他俩只留下一间卧室，把自己家里的其他房子全腾出来办个幼儿园，聂老非常支持。可子女们却说：“妈妈，您和爸爸这辈子不容易，刚把我们拉扯大，又要带小孩子。您要是想要奖状，我们花钱给您买一摞。您要是爱听什么奖励的词，我们找书法家给您写，幼儿园就别办了。”

“难得一辈芋做好事。”毛主席的这句话她一直记在心里。所以她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应该办，而且做得雷厉风行。于是她腾房子，只给自己留一间卧室。开始和聂老买桌椅，请老师。不料聂德荣在外出采购幼教物品时，一辆大货车撞到了他的车上，造成重伤。人人都说好心有好报，这难道只不过是个良好的祝福而已？崔兰英非常痛苦，她觉得自己心力衰竭了，幼儿园还要不要办下去？站在病榻前，望着插着氧气时而清醒，时而不省人事的聂德荣，她思绪万千。将军自有将军风范，共和国功臣聂德荣更是楷模，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他握着崔兰英的手，拥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兰英，为社会做贡献，到什么时候都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要按期开园。你是个伟大的母亲，我相信你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祖母。”

1985年仲夏时节，将军楼里充满孩子的欢声笑语，那是崔兰英的“育美”幼儿园开业了。从1985年到2000年，幼儿园办了15年，抚育了1000多个孩子，为不少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为社会减轻了入托艰难的压力，并且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区优秀幼儿园。崔兰英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天津市的好市民、邮电部优秀离休干部，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受到江泽民的亲切接见。如今的崔兰英桃李满天下，她走到大街上时不时就有人喊她一崔奶奶。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娃娃王。”个中辛苦只有身临其境之人才会明白。

1986年1月7日，聂德荣将军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一面鲜红的党旗涵盖了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一生。崔兰英泪如泉涌，悲痛欲绝，风雨同舟30年，人生辛劳几十载，她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位民族英雄，辜负了邓妈妈。

聂德荣将军去世后，组织拨给5万元的抚恤金，崔兰英把它全部捐献给了甘肃庆阳老区——“那是我和聂德荣最初相识的地方。”并且从这时候起她还每年拿出工资1000元，资助蓟县的教育扶贫事业。“人一辈子都做好事很难，但再难我也要坚持去做。”崔兰英这么说更是坚持这么做着。她的老战友、老姐妹刘棣芬1988年2月20日写给崔兰英一封信，信上说：“……我有时间去天津时，一定去看望你，看望你的幼儿园。我觉得你也很坚强，聂司令员逝世后，你能坚强地战胜悲痛，站起来，团结教育儿孙，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优良传统，搞好我们各项事业，确实不简单。而你能在已进入离休年龄，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确也不简单……”“景平、小胖、小欣……都很好吧？我还记得他们小时可爱的模样。你真不简单，含辛茹苦，多少个日日夜夜把这些可爱的孩子拉扯大了，的确是不容易啊！胖子和小欣一对双生，你一口饭，他一口饭；两个孩子穿一样颜色的衣服、鞋子。一个胖、一个瘦，衣服尺寸样式费了多少心，平平上学打扮得那么美丽，照顾得那么周到，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送他们上学、念书成才，真是颗颗粒粒皆辛苦啊。你的心啊，为儿女、为丈夫、为事业所憔悴，晚年又把母爱发扬光大，办起了托儿所，为家长排忧解难，为社会贡献力量。你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2002年崔兰英萌发了办农场的想法。她搜集信息、查找资料，洽谈、筹款、租地，购进种羊、猪崽、猎狗、雏鸡、鱼苗、菜种，招工、制订计划、章程凡事都亲力亲为。经过一段艰辛的努力，种羊场终于办成了。可是农场主并不比电台台长好当多少，对于一位老年人

来说，代价同样是沉重的。2003年的秋天，为防止羊只乱跑，她决定在院内砌堵墙，她感觉这是项简单的活计；于是吩咐小公务员（部队配备）和她一起砌墙。没黑没明，他们整整干了一星期，几百米长的一堵墙终于砌成了，可她却感到腹部疼痛难忍，鲜血顺着裤腿不时流下来，农场的土地上，印着她红色的脚印。是子宫大出血！她不得不做子宫切除手术，手术是2003年隆冬做的，幸运的是很成功。

崔兰英的农场位于天津市北辰区，瓜菜肥硕，羊舍、鸡舍、鱼塘……蓝蓝的天空下有飞鸟盘旋，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是啊！她种植、养殖的都是精品。羊是从国外引进的洋品种，不但个头大，繁殖能力更是惊人，一胎平均生羔羊五至六只。每年繁殖出来的这些种羊，她都把它们送给了蓟县贫困山区的农民。她的农场办得红红火火，受到了天津市乃至中央领导的关注。但她的生活条件却非常简陋，甚至让人觉得还不如一个民工的房间。

庆阳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宁县支部。其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又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崔兰英的父亲是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第一个黄埔军校生，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他血祭江南。烈士后代、孤儿出身的崔兰英继承先烈遗志，毛主席、周总理培养了她伟大的人格；艰难岁月，练就了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她以庆阳人特有的坚初、朴实的作风，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己任，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80多岁高龄，她不缺身份、地位，更不缺名和利，她有显赫的将军楼居住。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并且不乏国家栋梁之才，有的当了将军，有的学业有成，其中三位是将军。由她带到十几岁的孙女圆圆，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她应该幸福地颐养天年，可她仍在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尽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她不但学会了电脑，经营农场之际

还抽时间在老年大学学工笔画。“人活着，总得找点事干，这是 80 多岁的一位老人再普通不过的想法、做法。我们衷心地祝福这位勤劳、善良的老人健康长寿、事业顺利。

参考文献：

人民邮电报——记者：温艳萍。

《崔兰英简历》——崔兰英。

《伟人身边学做人》——崔兰英、周新民，《天津日报》2007.12.27。

庆阳第一位外出求学的“女秀才”

——波涛

波涛（1925—2007），原名樊惠兰，陇东第一位延安师范学校毕业生、第一个军事学院毕业的知识女性，庆阳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和庆阳北关学校教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厅秘书，武汉军区机关管理局副政委，二级独立奖章、三级解放勋章获得者。她是曾任驻守庆阳的七七〇团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张才千将军的夫人。

波涛 1925 年出生于庆阳县城南街一个市民家庭。8 岁丧父，自幼靠母亲与哥哥给人打零工艰难度日。母亲虽然勤劳能干，无奈兵荒马乱，家里的日子异常艰难。1936 年 5 月中央红军西征。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于 11 月 21 日三个方面军在环县山城堡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即“山城堡战役”。此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使红军有了立足之地。12 月 21 日，中央红军教导师和中共陕甘宁省工委工作团在师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和工作团长蔡畅率领下进驻庆阳。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支持党的工作。那时候，五四运动所倡导的解放思想、男女平等的思潮已经影响到了庆阳城，妇女放足、女子上学读书是势不可挡的新潮流。波涛的母亲是个开明人士，1937 年春，她亲手把女儿送进了庆阳女子高等学校学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性格倔强、吃苦耐劳，而且又非常机灵的波涛，除了刻苦认真学习文化课之外，利用课余时间，还积极参加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开展的抗日宣传工作。再苦再累，她从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常常受到同志们的赞扬。

波涛是 20 世纪 30 年代，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新女性。然而，按当地风俗，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把她许配给了城东贾家。少不更事的她也没有太在意，再说了，身边的姐妹也大都是这样。

在一次庆阳县抗日救国民众动员大会上，指导委员会主任、县工委书记蔡畅作的“反对买卖婚姻，力争婚姻自主”的讲话，使小波涛心灵深处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意识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是铁打钢钉的命运，是可以打破的。会后，心潮澎湃的波涛，立即找到蔡畅主任述说自己心中的不满。孩童时订的娃娃亲至今也没有见过面，既别说了解，也更谈不上将来过日子。其实，小小年纪的她心中最大的愿望或者说秘密：想好好读书，将来像蔡书记她们一样，为国家做贡献。蔡畅非常支持波涛要求婚姻自主的请求，当即与妇女救国委员会的同志们商议，决定由妇救会主任李叶去做波涛母亲和兄长的工作。波涛母亲很识大体，千方百计退还了贾家的彩礼，使波涛摆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

在蔡畅等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天资聪颖、性格开朗，认准的事情就会不遗余力去做的波涛，很快扔掉了思想包袱，轻松学习和工作。不久，她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庆阳第一位出外读书的女子。“如今女子也能读大学堂了，你看樊家的那个女儿……”庆阳人民奔走相告。她成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女子读书才有出息”的活教材。

1937年10月，经党组织批准，县委会议通过，县委妇女部部长蒲秀珍同几位保卫战士护送波涛去延安上学。波涛克服文化底子较薄弱的困难，利用一切时间，刻苦攻读文、理和医药卫生学科知识，3年后的1940年10月，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国民政府的庐山会议后不久，蒋介石口头上承认与共产党合作，行动上却大肆进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活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把“防共、反共”列入施政首要任务，公开在陇东设立“防共线”规定了“八项方针，十二项原则”。省长朱绍良根据国民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反共政策，于1938年11月对驻防陇东的三八五旅部又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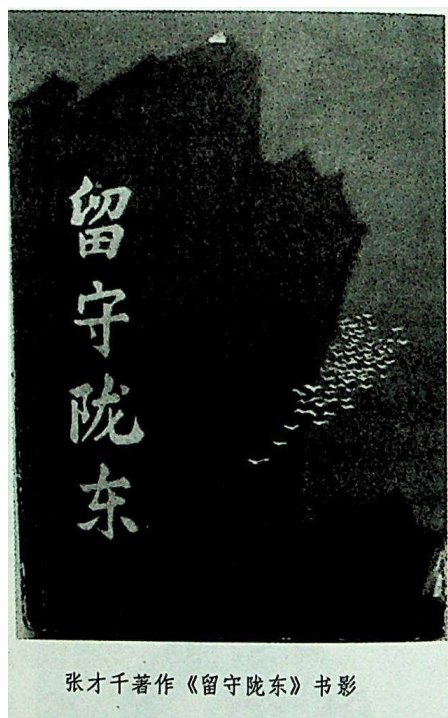
了所谓“五项原则”并对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破坏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一营驻防宁县的罪行进行嘉奖，致使陇东磨擦事件不断。1939年4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庆阳县被划分成红、白多个不同区域，加上国民党不时制造磨擦事件，作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局势非常紧张。波涛回庆阳后，就积极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为了工作方便，县政府（1940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成立）安排她在庆阳女子高等学校和庆阳北关学校任教员，以教师的身份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她号召妇女冲破封建枷锁，摒除封建旧习，从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放开缠足布，走出家门，走上社会，积极投身抗日民众救亡运动。动员妇女上学识字，实行男女平等。她教学生唱：“劝世人再莫要将女儿脚缠，女学堂不缠脚常把书念，剪了发绽了脚立志当先。有男兵上火线将贼杀赶，有女兵在后方宣传动员。”她现身说法，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极具感染力。在她的宣传和影响下，许多妇女由此走进了县政府办的编织厂（厂长李叶）、制鞋厂，磨房、豆腐房、粉房等工作。

1941年5月，经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介绍，波涛与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团长张才千结婚。



张才千(1911—1994)，原名张彩连，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张家冲一户农民家庭。少年时参加先锋队组织，青年时进入农民协会。1930年4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次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普通的战士逐步锻炼成为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他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等战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反刘湘六路

围攻的战役。在举世闻名的一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为了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带领队伍曾往返三次爬雪山、过草地。1937年10月，张才千服从党中央调遣，随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留守



张才千著作《留守陇东》书影

陇东，任三八五旅部七七〇团团团长，承担扩大革命根据地和维护后方安全工作，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艰巨任务，团部驻防庆阳县驿马关。副团长胡奇才1938年2月奉命去延安抗大学习，1942年初才由卜万科接任。其间，张才千肩负重任，忘我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围剿”和进攻延安的种种阴谋，保卫着陇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忠实地守护着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尽职尽责地完成

党交给他的一切任务。他曾著有回忆录《留守陇东》一书，翔实地反映了当时陇东革命斗争艰难的历程。

波涛与张才千的结合，不但是陇东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范例，更体现了红军指挥员王维舟关爱部下的工作作风。婚后，波涛调入三八五旅卫生部任调剂员、司药。干练爽快的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以办培训班的方式，为庆阳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接生员，大大提高了婴儿的成活率，降低了产妇的死亡率。庆阳老辈人至今还记得她讲课的姿势。波涛还先后参加了合水战役、国民党对边区的多次“围剿”战斗、关中战役等，并荣立二等功。

1944年10月到1947年间，张才千奉命率部开拔河南豫西地区，任豫西军分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五旅旅长，江汉军区司令员等职，协同豫皖苏区部队作战，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

山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又多次指挥了鄂西剿匪等重大战斗，为重建江汉革命根据地、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9月，三八五旅主力离开庆阳到延安整编，波涛与指导员们一起离开庆阳，被编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三旅，任旅卫生部司令部部队先后转战延安、山西等地。1949年3月随军南下，在湖北与张才千相逢，随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司令部卫生科。她不以司令员夫人自居，工作热情性极高在解放武汉轴战斗中，不畏艰险，掩护同志，深受指战员的好评。

全国解放后，张才千历任第十五兵团四十四军军长、海鲜区第一副司令员、南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作为共和国功勋，张才千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波涛先后在四十四军干部科、南京军区后勤部任职，为加强部队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1953年至1955年，为了不断地完善自己，她在南方军事学院学习。1956年，响应中央裁军的号召，转业到江苏省工人医院任办公室副主任。工作勤奋认真，深受同志们爱戴。

1971年4月至1980年，张才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他参与了我军在西沙永乐群岛和广西、云南边境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决策和指挥，贡献卓著。根据祖国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波涛恢复军籍，任总参办公厅秘书。根据上级的指示，对维护部队的稳定和军队战备、训练、管理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十年动乱中，张才千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波涛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博大的胸怀，用一个革命老区英雄女子的真诚和善良，保护了许多敢说真话、办实事的老干部，救助了不少思想迷茫的年轻人。

1980年1月，张才千出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波涛任武汉军区机

关管理局副政委，她积极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示，配合上级领导的工作，软件、硬件齐头并抓，官兵的政治思想建设和部队的设施建设工作双管齐下全力抓，在军区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她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始终如一，默默地支持张才干的工作，照顾着张才干的生活，使得张才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解放全中上。1982年9月，张才干退居二线；1983年3月，光荣退休。她曾获二级独立奖章、三级解放勋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本该安享晚年的他们，时刻关心着党和军队的建设，并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关心着革命老前辈到庆阳各界人士的疾苦。

1987年波涛与才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庆阳，受到了庆阳各界人士的热诚欢迎。庆阳人民奔走相传：咱们的女秀才回来了，咱们的张团长回来了。”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女将领激动不已，当两位共和国的功臣，看到魂牵梦绕的庆阳随着祖国的大发展而大发展时，十分欣慰。

1994年，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湖北人民的优秀儿子张才干同志逝世。他那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朴实热忱的优秀品格，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给庆阳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才干著有：回忆录《中原逐鹿》（198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留守陇东》（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红星骁将》（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7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庆阳人民的优秀女儿波涛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麻城人民为了纪念她，于2007年12月23日将这位优秀儿媳的骨灰安放在麻城公墓。

波涛——波澜壮阔之意，比喻声势雄壮浩大。从她的名字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位庆阳老区的红色土地上养育出来的女子的性格。她心胸宽阔而细腻，做事雷厉风行且持之以恒。她有胆有识，戎马生涯，

为共和国的医疗事业和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她是解放前夕庆阳著名的女才子，庆阳新女性的典范。她塑造了庆阳女性新形象，她的事迹为代代老区人民所传颂，庆阳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个名字——波涛。

参考文献：

《留守陇东》——张才干，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10。

《庆阳文史资料》——庆阳县政协，庆阳县文、卫、法史工作委员会，1999. 12。

《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 11。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庆阳姑娘与她们的夫婿》——刘文戈，发表于
2006. 12. 31 《陇东报》。

凤城走出来的大使夫人

——赵兰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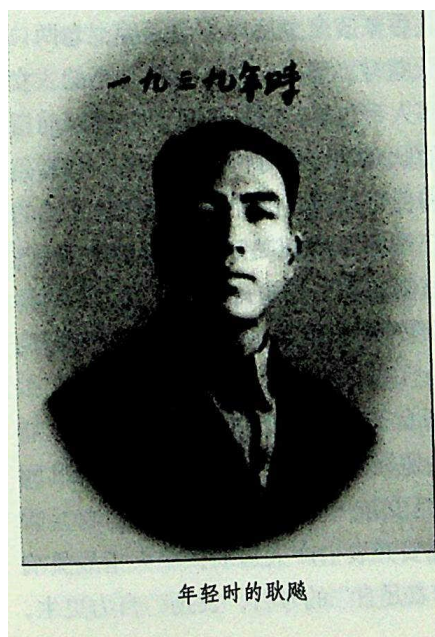
赵兰香（1923—），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陇东首批知识女性之一，庆阳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教员，庆阳女子冲破传统婚姻习俗第一人。她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耿飏的夫人。

赵兰香1923年出生于甘肃庆阳县城钟楼巷一个贫民家庭。父亲赵占海为人诚实，颇受乡邻尊重；母亲随和、贤惠。虽然生于贫寒之家，但作为独生女儿，赵兰香生活较优越，二老把她视为掌上明珠。1930年下半年，拗不过她的缠磨，父母亲把她送到庆阳县城第一所女子初级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五四新思潮在庆阳的结晶，1924年设立，地址位于县城西大街祖师庙内，招收年龄不等的女性上学读书。当时的校长是张滋兰，教员是张滋兰和他的妻子，教学内容为《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及常用字的读写，只有边兰英、赵兰香和贺惠英等6名学生。后来张滋兰夫妇离去，李接任校长，教员李淑仙、郭金仙。学生增加到15人，并开设了语文算术自妙历史、地理等课程。1934年庆阳县城又在县警厅成（高小，开设语文、算术、地理、政治课程），赵兰香随之升入该校学习。跟她一起学习的还有边兰英、樊慧兰（波涛）、龙彩琴、贺惠英等。1936年12月27日，到达陕北后进入环县的红军教导师2000余人，移驻庆阳县城。红军到来后，国民党教师外逃，女子学校停办。1937年2月，在蔡畅和红军教导师的支持下，庆阳女子学校重新开办，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重新进行了调整充实，部队将红军教导师的女干部路易和从延安调来的黄友群、何桂英、王英强4人陆续派往女校任教，路易任校长。1937年7月，赵兰香、边兰英、樊慧兰、贺惠英四人从女子高等学校毕业。为庆祝庆阳第一批从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红军教导师和中共陕

甘宁省委工作团（团长蔡畅），特别为她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蔡畅与教导师的其他首长亲自参加毕业典礼，并且给毕业生颁发了奖金和奖品。毕业生披红戴花，由众人簇拥着沿大街游行，敲锣打鼓，游行队伍的前面由两人抬着一方黑板，黑板上工整地书写着她们的名字和考试成绩。队伍所到之处，掌声、笑声、欢呼声一片，妇女们感到扬眉吐气，纷纷将自己亲手炸的油糕往毕业生手里送，整个县城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也对女子学校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培养和发展本地教师，扩大、动员更多的女孩子上学读书，蔡畅聘请优秀毕业生赵兰香、边兰英担任庆阳女子高等学校的教员。1940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成立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朱开铨继续聘请赵兰香、边兰英为教员。当时女子高小的第一任校长为杨易荣，教员杨易荣、龙淑栾。为了拓展课程范围，又聘请贾元吉、杨景修任地理、历史代课老师。不久杨易荣、龙淑栾夫妇因工作需要离开庆阳，接着由红军女干部路易担任校长，后来由赵文为（甘渭汉夫人）接替。女学生由十几人增加到40多名，又逐年增加到近百名。学校取消了《女儿经》，增开了政治课，对学生进行爱国爱民、团结抗日、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教育。当时的师生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动员广大民众起来同封建思想作坚决斗争，宣传妇女解放，宣传抗日救国，为培养庆阳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赵兰香的革命生涯也从此开始。

庆阳是西北地区通往延安的重要关隘之一。打开庆阳反封建斗恶霸、群众武装、抗日民主运动的新局面，是红军教导师开辟新区的重点工作。红军教导师决定：首先搞好宣传工作，向国民党政府及其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次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主武装，开展反封建，维护地方稳定，打击地方上的土豪劣绅。1937年1月，县工委书记蔡畅任主任的“庆阳民众抗日指导

委员会、后援会、工人救国委员会、青年救国委员会、妇女救国委员会、商人救国委员会、和北街贫民委员会”等八个委员会和六个支部成立，在群众中广泛发展党员。赵兰香、边兰英、樊惠兰、龙彩琴等文化人成为搞宣传工作的支柱。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了巩固根据地，后方留守团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于10月进驻庆阳。三八五旅进驻庆阳后，当时的统战工作是教导师、旅部工作人员的新课题，难度比较大，既要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还要向群众宣传统战工作、共产党政策的重要意义，宣传任务更大、更费周折。赵兰香、边兰英等文化人工作担子更加繁重。她们白天搞教学，晚上抄抄写写，有时候还得走乡串户去动员，吃闭门羹或被赶出大门是常有的事，但她们不畏艰难，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深受当地群众和驻地部队干部战士的称赞。回顾那段历史，边兰英曾不无激动地说：“我认为庆阳县女子高等学校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带头冲破了庆阳县的封建礼教的羁绊，开创了妇女解放、女孩子享受



同男孩子一样教育的新风；二是为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女干部。”

三八五旅共有官兵400余人，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谔！扶民。1939年冬，王宏坤奉命去抗日前线担任冀中军分区副司令员，王维舟任旅长，耿飏任副旅长兼参谋长、军法处长，甘渭汉任政委兼参谋长。

耿飏（1909—2000），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

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3岁到铅梓矿当童工，16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加入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奉党的指亦，率领由他任队长“的游击队参加了工农红军。1933年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等重大战役。长征中他率部担任前卫，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毛主席亲笔写信表扬了他。遵义会议后，他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夺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积蓄了力量。他在直罗镇战役中为掩护战士受伤，多次出生入死，为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赵兰香曾于2001年6月23日撰文回忆：1940年夏季的一天，我注意到学校来了一位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的八路军首长，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有些清瘦，但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他的粗布军装已经洗得发白，风纪扣系得严严的，一副严肃的军人姿态，但讲起话来却文雅和气，赵校长介绍说这就是三八五旅副旅长耿飏同志。记得当时耿飏和蔼地同我聊起了家常，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渐渐地我感到这位首长对人诚恳、亲切，没有一点官架子，心中对他暗暗有了好感。后来才知道，我和耿飏的相识并非偶然，那是甘政委、赵校长夫妇有意识地为我们两人牵线搭桥。

赵占海是一位务实的人，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盘算着在当地为她找一户富裕人家。他穷怕了，指望着兰香来改变家庭的贫困面貌，老两口也有所依靠。当得知女儿一心要嫁给耿飏时，坚决反对；兵荒

马乱的，女儿怎么会被随时都有可能战死沙场的军人带走呢。父亲的反对并没有动摇赵兰香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知识渊博的耿飏，那平等待人的作风，特别是他从一名矿工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传奇经历，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暗暗下定决心：“非耿飏不嫁！”于是父女间关系曾一度有些紧张，她想尽一切办法劝说父母。又请时任庆阳商会会长的张维岳（赵占海非常信任的人）从中做工作，赵占海夫妇终于了解了红军，改变了对耿飏的看法。

1941年7月，赵兰香与耿飏在庆阳女子高等学校一间教室里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没有甜言蜜语，没有山盟海誓，但两颗火热的心在为共同的理想跳动着。1942年秋，耿飏调入延安抗大学习。1944年春，赵兰香调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此时正值延安开展生产大运动，广大指战员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但生产粮食、蔬菜，还办发展养殖业等。耿飏亲手制作了一架手摇纺车，每逢周末，二人便共同纺线，1944年秋，中央批准了耿飏强烈要求上前线杀敌的请求，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不甘寂寞的又奔赴到了抗战前线。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一举收复了被日军占领多年的关塞张家口，为我军进一步歼灭日伪部队开辟了。赵兰香安学结束后重回庆阳，先后在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的助产接生班学习（教员波涛）工作，在妇女文化培训班从事宣传、动员工作，深入群众做妇女解放工作。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党组织派往华池从事新法接生助产和医务卫生宣传工作，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她和许多女干部一样走村串户，给妇女讲解革命道理，组织扫盲识字，宣传新法接生和妇女放脚等新思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庆阳县人民政府，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在庆阳城恢复成立。这时期的赵兰香不怕苦、

不怕累，处处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更加勤奋认真，为庆阳的繁荣和发展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至今庆阳还流传着关于她的许多故事。

解放战争爆发后，耿飏回晋察冀军区任野战军参谋长。1948年2月，陇东战事全面拉开，国民党政府驻军疯狂进攻庆阳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驿马关之警三旅五团二营、三营，陇东分区独立营和地方游击队坚决阻击。5月与青海马步芳激战，陇东、三边失利，县委书记杨安仁等被俘，县保安科长徐明、法院推事孙昆山等英勇牺牲，庆阳又一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飏，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分头歼灭“青宁二马”，党中央调耿飏啃“宁夏战役”这块硬骨头。耿飏不负使命，解放了宁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赵兰香不畏艰险，随到张家口、北平。1949年2月，耿飏奉命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向大西北进军赵兰香随军来到宁夏马家军（马鸿逵）曾的银川市。这时候他们的女儿刚出生，为人母亲，含辛茹苦，可想而知。但不甘落后的她又当起了小学教师，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默默奉献。

全国解放后，我国外交事业极其微弱。为了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巩固和提升新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地位。1950年，中央调耿飏外交部工作。在长达20年的外交生涯里，耿飏无论是任驻外大使还是外交部部长，兢兢业业，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大使夫人或部长夫人，赵兰香随耿飏一起调到外交部，先后在我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大使馆任职，赵兰香不骄不躁，勤勤恳恳，始终如一，积极协助丈夫完成各项使命。在驻瑞典使馆时，已是几个孩子妈妈的赵兰香，为了外事活动的需要，在丈夫的鼓励下，不怕困难，强记硬背学习英语……

1967年是我国外交部门的多事之秋。当时，各驻外使馆人员均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耿飚一下飞机便开声了被审查批斗的苦难历程。夫妇俩依然相互鼓励，患难与共。耿飚每次批斗或审问后，心情总是格外沉重。这倒不是自己受了冤屈，更多的是为党和国家正在陷进一个不测的深渊而担忧。因此，回到家中，不免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赵兰香总是劝慰开导他，给他增加点营养，让他休息好。每逢这时，耿飚更是过意不去，也心里清楚，夫人此时的心情也不轻松。每次批斗大使，大使夫人都要站在大庭广众之下陪斗。即每逢批斗耿飚，赵兰香必被陪斗。“是我拖累了你啊！”耿飚又反过来安慰妻子。每当赵兰香回首这段往事，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在‘文革’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御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撑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耿飚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外交方针，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变化多端的国际风云，冒着危险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赵兰香作为丈夫的坚强后盾，坚信人民、坚信党，以庆阳老区人憨厚朴实的作风和爱心，始终与丈夫同甘苦、共患难。

1978年3月，耿飚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1月，耿飚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兰香长期作为耿飚办公室的负责人，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工作勤恳认真，为人谦和。无论耿飚在什么岗位上，她都时刻按党中央的要求去做，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高度的责任感和警惕性，为党和人民贡献着自己的毕生精力。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赵兰香的一些亲属也想出去谋一份事业，于是理所当然想到了赵兰香这关系。赵兰香舅父侯氏家族居住地理条件较差，年轻的晚辈们想寻个好前途，先后多达

十几人纷纷上北京找她安排工作，甚至当兵都行。据回来的人说：赵兰香无奈，就把亲戚们的“工作”安排在自己家里。家里沙发、地板到处都是住人的地方，而且重新置办了餐具，提供吃住，让他们轮流干家务，月底按保姆待遇开工资。有位姑娘住了半年，照旧如此。没办法，只得回老家。



1991年7月，耿飏（前排左五）、赵兰香（前排左三）参观庆阳县博物馆时与省地县有关领导和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合影

1991年是赵兰香与耿飏结为伉俪50周年，她同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耿飏在子女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于7月初来到了陇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庆阳城，来到了她出生的钟楼巷，来到了当年她任教的

学校，来到了当年举行婚礼的那间教室，

来到了田家城度过新婚蜜月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的回忆仿佛就在昨天。久久打量着，也许她望见了当年那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这期间她与她的同学、好友边兰英促膝长谈，向当地领导询问有关庆阳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等等。她的女儿耿焱说：“母亲对庆城的怀念是刻骨铭心的。”

这天他们住在县委招待所，夜晚的庆阳县城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娘家人们希望多看一眼自己的姑娘和姑爷。但是，也有不少人是来反映情况的，有的还通过赵兰香的亲戚转来信件。午夜，当一切都安静下来时，面对百姓不满的呼声，他们心情十分沉重，忆当年百感交集。离开庆阳的那天早晨，耿飏专门接见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及甘肃省顾委的负责人。他饱含深情地讲了这么一件事：

“50年前，我们三八五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这个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战士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战士求情。我

坚持要执行。受害少女的父母也赶来求情。我决不能允许人民军队的战士欺压百姓，所以仍然要坚持执行纪律。不料，受害少女的父母竟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系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啊全都跪倒在地，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向群众说明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是流着泪接受了群众要求的！’耿飏说到这里，高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坐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他的语调非常激动。爱之深，责之切。全场一片寂静。只有他那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在叩击、拷问着每位干部的灵魂。

1994年耿飏为赵兰香70寿辰专门题了“寿”字，1997年6月27日在赵兰香生日之际，耿飏又特为她题了“情深似海、义重如山。送兰香”。这两幅题字赵兰香至今还挂在她的客厅里，是他们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共同度过60年风雨历程的见证。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赵兰香与耿飏始终情系故里。1986年，帮庆城县办起了兔毛纺织厂。1987年，争取国家投资项目资金4700万元，使庆阳结束了需要靠火电补充用电的历史，全部实现了刘家峡供电。1990年，与关心庆阳发展的老领导共同争取到了庆平铁路立项、引黄工程立项和给庆阳拨付3万吨原油指标以解决庆化厂原料不足等问题。筹建庆阳周祖陵公园时，赵兰香代表耿飏和家人，捐赠现金2万元。

赵兰香的父母到北京生活后，老家宅院一直空闲，有一个远房侄子多次写信愿意过继给赵兰香的父母当儿子，想继承这块地方。赵兰香最反对接续香火、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毅然把这座宅院捐献给了庆城县幼儿园。

2000年6月23日1时6分，耿飏同志在北京逝世。把思念和悲

痛留给了用一生追随他、热爱他、辅助他的赵兰香。赵兰香化悲痛为力量，用一年多的时间，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出版了《耿飏传》上下两册，再现耿飏传奇的一生。

为大力发展老区教育事业，使贫困女孩都能上学，赵兰香将她和耿飏生前珍藏和收集的字画进行了拍卖，将拍卖所得 350 万元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设立了“赵兰香庆阳女童教育基金”，投入到了家乡的女童教育事业。2006 年 5 月 31 日端午节，83 岁高龄的赵兰香老人带着她的女儿耿莹、耿炎，外甥女耿宏以及工作人员重回故里。她来到庆城县较贫困的高楼乡，详细地了解了这里贫困女童的生活、学习情况。在王原小学，她抚摸着、亲吻着一个个女孩的脸庞，使在场的人们都感动不已。她当场给王原小学贫困女童李慧燕的父亲李志明 1000 元人民币，并说：“你要好好教育孩子，让孩子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当了解到庆阳的小学教育滞后时，她决定从基金中拿出 50 万元，配合地方配套资金在庆城县药王洞村修建“兰香小学”。

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繁荣老区经济文化建设是赵兰香心里永远牵挂的事。为完成老人的心愿，她的女儿耿焱、外甥女耿宏先后多次专程从北京、上海来到庆阳，积极关注和尽力支持着庆阳各项事业的发展。

赵兰香是庆阳大地上开出的一朵靓丽的花朵，她塑造了庆阳第一代文化女性、新女性的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老区女性的人生观。她的人生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浴血疆场，也没有同敌拼杀的经历。从 14 岁起，辛勤的汗水就开始在生养她的土地上播撒。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把自己的安危和幸福置之度外，支持着耿飏为共和国的事业而奋斗终生。人民记着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记着她。

参考文献:

《留守院东》——张才千，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10。

《庆阳地区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 1。

《庆阳县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庆阳县委黄会文
卫法史工作委员会编，1992. 12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庆阳姑娘与她们的夫婿》——刘文戈《院东报》2006. 12. 31。

《今昔赵兰香》——悦晓华，2008 年。

德艺双馨的边区女音乐家

——李建彤

李建彤（1919—2005），曾用名韩玉芝，笔名秋心、秋茵。曾任许昌女子第一小学艺术教员，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批女学员，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高才生，边区政府办公厅秘书，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是曾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景范的夫人，革命先烈刘志丹的弟媳。

李建彤 1919 年 3 月 26 日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一陈姓人家，由于家庭贫困，刚出生即被父母遗弃，由小生意人李福顺收养，几年后过继给姑姑家，改名韩玉芝。她少时聪慧，好学上进。1934 年，考入许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写作，在河南洛河《警钟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诗歌《理解》。1935 年女师毕业后考入开封艺术师范学校学习。1936 年辍学随姑父去南京。1937 年初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图音系，主修钢琴、声乐和油画。抗日战争爆发后，胸怀一腔爱国热情的韩玉芝，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唤起民众，她先在许昌女子第一小学担任艺术教员，一边教学生必修课程，一边宣传鼓动抗日。同年冬进入中国共产党在泾阳县安吴堡开办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改名为李建彤。1938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 年初考入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拉小提琴是她的绝活，不但政治作风过硬，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很有造诣，是学习里的骨干力量，是党的模范青年。在人才极其缺乏的边区，李建彤这样的青年是党急需的人才。她 1944 年提前毕业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

俱乐部工作。1946年，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结婚，婚后由于工作的需要，调入边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

刘景范(1910—1990)，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鼎镇芦子沟村。幼时受祖父刘士杰（清末拔贡）的启蒙教育，勤奋好学，12岁丧母，辍学在家协助父亲刘培基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受长兄刘志丹带回的革命书刊的影响，自幼非常向往参加革命。

1928年秋，“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刘景范在刘志丹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次年随刘志丹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协助刘志丹在南梁地区创建游击队，同年冬天，任“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二支队一大队副队长。1932年2月因发生了“三嘉塬事件”，刘景范被迫返乡，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他于1934年2月任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率领游击队在保安、延安、庆阳一带开展游击斗争，为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年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团团长，率部参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1935年4月之后，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其间，他运用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和清剿土匪，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5年9月上旬，刘景范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去永十山迎接长征到达陕甘边区的红二十五军，积极动员边区广大干部群众慰问红二十五军将士，为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边区做了大量工作。9、10月间，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一场残酷的错误“肃反”使陕甘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受迫害。刘景范和其他党的优秀干部一样，不光是肉体上和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差点儿丧命。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他才得以脱险。1935年12月二刘景，

彻消军事部长，平息了因错误“肃反”造成的三边及保女一糾碰灭了千余名叛匪，为红军顺利东征和西征扫清了障碍，为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刘景范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长、建设厅长、司法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西北局委员等职。在民族存亡之际，他积极宣传抗日，发动边区群众送子送夫参加抗日救国，一面为前线输送物资，一面为保证大后方的安全呕心沥血。

1946年，刘景范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解放战争打响后，刘景范临危受命先后担任西北野战兵团和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边区政府代主席等职。其间，他组织动员边区群众支援前线，曾参加保卫延安、沙家店、瓦子街、陕中等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工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转战陕北，消灭国民党胡宗南部，解放大西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刘景范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建彤随丈夫到北京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秘书。1954年春，李建彤任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



1960年李建彤在华池荔园堡清音楼

1954年，中宣部希望（7）的年李建彤在华池荔园堡清音楼工人出版社出版一部关于刘志丹烈士的书，工人出版社邀请曾帮助刘景范撰写《刘志丹太白收枪》的李建彤来执笔，她1958年开始动笔。1959年李建彤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不久，经过多方协调，李

建彤请了创作假。她采访了与刘志丹同期工作的干部、战士，并到陕南、陕北、陇东一带实地考察采访，走遍崇山峻岭，采访战士群众，考察大战役的战场。刘景范原本不同意由李建彤来写这本书，他的意见是：自己家的人让别人去写，不要自己写。但他也为李建彤的顽强精神所感动，1960年曾亲自陪同李建彤采访，并给她介绍一些战争场面。习仲勋同志也关心李建彤的创作，几次为她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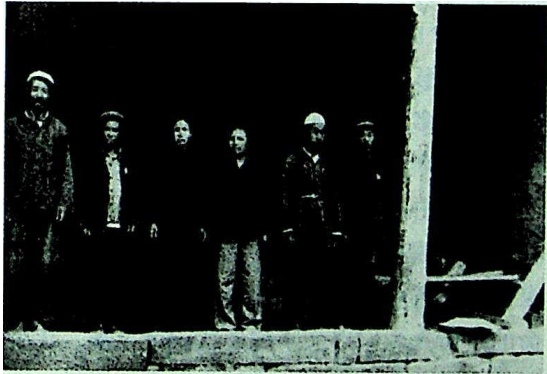
小说《刘志丹》1961年完稿，样书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提修改意见，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周扬称赞该书“有史诗气魄”1962年7月，小说《刘志丹》六易其稿后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在全国反响很大。同年9月，

有些同志对该书提出了意见。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递上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字条。于是，会议开始追究《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刘志丹的战友、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和



1960年刘景范陪同李建彤在庆阳县南梁公社采访（左五）
刘景范、（左六）李建彤

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由于曾接受过采访，或是小说中某角色的原型，以及支持李建彤写书的丈夫刘景范，都被作为主要批判、斗争对象。中央由此成立了以康生为主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1963年5月，专案委员会提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此案伪造事实，株连无辜（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甚至范围扩大到彭



1960年李建彤（右三）在华池荔园堡清音楼与烈属及地方干部合影

德怀)，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洛阳拖拉机厂，后关押。贾拓夫下放任抚顺发电厂厂长，1967年在石景山铁厂被迫害致死；马文瑞被关进监狱5年。刘景范多年停职检查，没有任何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一伙故意制造事

端，此案进一步扩大化，从工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和负责出版发行人员，到接受或协助过采访的各级干部和百姓，许多人受到牵连，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自1962年冬，李建彤开始停职检查，不断接受中宣部、中组部、文化部、中检委的会审。1968年1月被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江西省峡江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底因病回北京治疗。也是在1968年5月，刘景范因痛斥康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直至1974年12月，在毛泽东“宣布释放，免于追究”的批示下，他才重获自由。

在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李建彤郁闷难忍，情绪特别不稳定。刘景范为人恬淡，遇事总是淡淡一笑而化解，是家里的润滑剂。孩子们在他们的保护下远离政治，自然发展，个个性格开朗，才华横溢。

1978年李建彤得以昭雪，离休在家专门从事文艺创作。刘景范平反复出，先后担任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文件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0月，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刘

志丹》第一卷。这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李建彤为会员。工作雷厉风行、笔耕不辍的李建彤，更加认真地开始了自己辛勤的创作。1983年第二、三卷完稿。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间，《刘志丹》一、二、三卷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0年8月9日凌晨，刘景范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80岁。他走了，给被他宠了大半生的李建彤以极大的打击。李建彤的身体每况愈下，1991年又在家中摔了跤，腿骨、肩肘骨挫伤，从此不能下床，一躺就是14年。2005年2月14日，李建彤离世。

李建彤少时聪慧，堪称才华横溢。爱家爱国，志趣远大，放弃安定的生活，10多岁就参加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高级干部，她以身作则，时时处处表现出革命家的风范。作为一名作家，也许由于遭受过度打击，她留给后人的作品不多，目前能够读到的有诗歌《谢了吧，枯草》、故事《刘志丹在桥山》等。作为一位共产党内高级干部出身的作家，她想再现历史，让南梁革命圣火不灭。为了把争取新中国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们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让后人铭记这血染的历史，也为了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一份较为翔实的资料，她是以多大的动力和毅力坚持下来的啊！时间这个算叩器，没能安排出空缺让我采访上李建彤，但从刘米拉阿姨的言谈中我体会到了李建彤的存在，对于在南梁这块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历史贡献的红色热土上洒过热血和汗水的先烈们，我情有独钟。我希望自己笔下的他们是真实的、活灵活鲜的。至于历史问题，我了解甚少，无法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无法全面地将方方面面的评说录入其中。但我要说：历史总是永恒的，也总是悲壮的，谱写历史的人的命运不是永恒的，但他们的经历却是悲壮的。有人说历史是一位长发披肩的女郎肩上扛着的那台“世纪”相机，有人说历史是一条大河或大江，也有人说历史是一座巍峨的高山……相机不是永恒的，但那一枚枚发黄

的照片却是定格的。历史是阶段性的，我们尊重历史，那是别一种风光。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5.7

《刘景范传略》——刘米拉、刘都都，见《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刘景范百年诞辰纪念专辑》。

《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研究会编，2010年第一期（纪念刘景范诞辰一百周年专刊）。

《李建彤简历》——刘索拉（李建彤之女）。

一心为党的女干

——张月英

张月英（1909—1938），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惠安堡乡人。曾担任陕甘宁边区环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

张月英出生在盐池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生活十分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嫁给了苏明生。苏家亦祖辈务农，苏明生虽然勤劳善良，但也改变不了家庭贫穷的运势。1936年9月，红军西征解放了她的家乡，她一眼就看准了这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队伍，便同丈夫一起参加了革命，随这支西征部队到达庆阳。由于她表现积极，为人热诚，工作认真，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陕甘宁边区妇女干部，受组织的委派，她担任新成立的定环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

1937年10月定环县撤销，张月英调任环县抗日救国会主任（1938年更名为妇女救国联合会）。不久，被推选为陕甘宁省妇联执委会执行委员。

环县地处庆阳边缘，与宁夏接壤，山大沟深，人烟稀少。这里贫穷落后，国民党反动势力与土匪武装活动十分猖獗，人民对于新成立的政权不了解，对新政策一时难以接受，这就对开展革命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妇女工作。这里的女人白天基本不出家门，而且家家户户都养着狗，甚至有些人家养着不止一条狗，见陌生人动辄放狗咬。在这种艰难的工作环境里，张月英总是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走家串户向妇女姐妹们宣讲革命道理，现身说法，说服广大劳动妇女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希望她们剪辫子、放足，争取女性的人身权利，积极参加社会事务和生产劳动，争当抗日模范先锋，积极为前线部队做鞋袜、运送军粮。有时天晚了，山路难走，她一个人连滚带爬的，待回到机关才发现，自己已经遍体鳞伤。据耄耋老人讲：有一次，

天黑山陡，又被狗追，张月英脚下一滑，滚下山坡，强忍着疼痛爬回机关，结果发现嘴被挂扯了，好多天不能嚼东西，也没法高声说话，急得她用手捏住半边脸出去做工作。终于，她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可喜的果实！许多男人剪掉了辫子，女性绽开了裹脚布，拥军支前也搞得轰轰烈烈。为此，张月英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1938年4月的一天，盘踞在甜水堡的土匪头子赵老五，通过探子得知中共环县县委主要负责人不在家的消息，派股匪缪福禄、耿开邦率百余名土匪，趁黑摸进县委机关，与暗藏的奸细里应外合，对县委、县政府机关发动了突然袭击。县保安队无任何准备，更由于敌众我寡。住在县委、县政府内的干部只得向外突围，在这紧急关头，张月英背起重病在身的县委书记刘昌汉的爱人马秀兰从院内突围了出去。待脱离危险后，马秀兰突然想起还有一个文件包放在屋里，张月英迅速将战友藏好后，立即返回院子拿文件包，这时疯狂的敌人已将屋子包围，一排子弹向她的身躯射来，她倒在了血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宝贵的生命在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

战争是残酷的，它使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它可以使一龛权顷刻颠覆。张月英这位普通的党的优秀女儿，就这样永远闭上了眼睛，她为自己的信仰，为庆阳人民早日得解放献出了生命，龛的音容笑貌永远被大地珍藏，她的事迹和精神在庆阳人的心里千秋万代传诵，永不泯灭。

参考文献：

《环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4。

《庆阳地区党史人物》——孙明生，1996,3。

陇东中学女先生

——陈文珍

陈文珍（1919—），河南南阳人，毕业于南阳师范学校。河南早期女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任陇东地区组织部干事，陇东中学女教员，中南《长江日报》社记者，中共中央组织部科员，工业部科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电子仪表局处长等职务。她是著名记者，是中央农业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张铁夫的夫人。

陈文珍 1919 年 8 月出生于河南南阳一个进步人士家庭。父亲开明，勇于接受当时社会上的新思想，母亲大方能干，他们对儿女一视同仁。因此，陈文珍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是她周围许多女孩子无法相比的，也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基础。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正在读书的陈文珍，就积极参加学生示威游行，发送传单，集会演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

1939 年，陈文珍师范毕业后，胸怀满腔的革命热情，与几位进步青年一起，从南阳出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安排在延安陕北公学院学习和工作。不久，陈文珍被分配到陇东地委组织部工作。陇东山高沟深，老百姓思想相对落后。因此，动员人民起来革命，宣传妇女冲破封建枷锁，走出家门，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是当时党在庆阳地方工作中的头等大事。陈文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第一线。由于她工作热情高，认真负责，受到了领导和当地老百姓的高度赞扬，人们亲切地称呼她“陈同志”。

陇东中学是党在陇东老解放区最早创建的一所高等学校。为了解决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主席批示成立且亲笔题写了校名。1940

年9月1日陇东中学开学，但条件极其艰苦，从校舍到教师都极其紧缺，师生携手建校舍、开荒种地、织裤织袜，当时每位教员都超负荷工作着，以共渡难关。1944年，抗战正处于残酷时期，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又丧心病狂地推行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对陇东地区采取内部颠覆和外部蚕食的手段，不断挑起磨擦事件。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确保革命战果，一部分同志调往前线参战。为了保证边区学校教育工作正常进行，陈文珍被调任陇东中学任教员。作为师范毕业生，教学工作对她来说是得心应手的。因而，她尽职尽责，不放过一切教育、教学的机会。1944年底，由于工作需要，她被调离学校，继续从事组织、宣传工作。

张铁夫(1922—2006)山东省巨野县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调《解放日报》工作。1947年作为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8年调中原局工作。先后任新华社豫西分社副社长，《豫西日报》副社长，《中原日报》及中原新华总分社采通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中原新华总分社总编辑，《长江日报》副总编辑。其间，他多次来庆阳，采写了许多有关陇东解放区的报道。

为了谋求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这对夫妻南征北战，戎马半生。1953年，张铁夫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后，党组织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将陈文珍也调任中南《长江日报》社工作。1954年张铁夫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巡视员，工业部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等职，陈文珍随之调入中央组织部、工业部工作。1960年张铁夫调任中共华北局委员、办公厅主任兼研究室主任。1966年任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72年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兼任市委副秘书长。陈文珍先后调至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电子仪表局工作。1986年她从北京电子仪表局处长职务上离休。1981年以后，张铁夫先后任国家农委委员、中央农业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

中心顾问等。2006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陈文珍的工作简历，篇幅很短，似乎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里，一个小女子，能够走出家门，放弃安定的生活，从富庶的大平原来到沟壑纵横的大西北，舍生忘死，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堪称伟大举动。也由此使人们懂得：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默默无闻、始终如一地做着那些看似平凡、却是为大众谋幸福的事情。陈文珍在陇东大地留下了她革命的足迹和倩影。陇东人民永远铭记她为了党的事业，为了这方土地上憨厚的人民所做的工作。

参考文献：

《张铁夫简历》——中央农委、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006.11。

《陇东中学校史》——袁兆秀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5。

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大家闺秀

——刘文英

刘文英（1928—2005），20 世纪初庆阳知识女性的优秀代表。她是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三八五旅七七〇团营部书记，三八五旅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政治委员（1955 年授少将军衔）的汪运祖的夫人。

刘文英 1926 年出生于庆阳县城，是庆城士绅、陇东分区参议会参议长刘仲邠的二女儿。刘家祖籍山西灵丘县大道地村，为灵丘望族，祖上世代为官。其父刘钰，清朝时为武举出身，同治九年（1870 年）授武翰林，官职为御前侍卫。光绪九年（1883 年）从御前侍卫授甘肃庆阳府游击，先后镇守庆阳 20 余年。后升任陕甘总督中军协镇，不久又荐补为西安城协镇。刘仲邠 1891 年生于庆阳，兄弟三人，排行老二。他少年聪颖，笃志好学，为人正直，爱憎分明，乐善好施，生活简朴，由监生保花翎五品衔，升千总。原配妻早亡，续娶庆阳大族李氏女子为妻，故而定居庆阳。1912 年，刘仲邠父亲弃官回山西老家后，把庆阳的一份田产交于他掌管。庆城周围几十里的穷苦百姓无人不知他的为人，有困难便纷纷上门求助，他有求必应，遭到了地方豪绅恶霸的妒恨排挤和谭世麟的暗杀。被逼无奈，他只得于 1927 年秋携家小回原籍。

关心人民利益，关心国家安危、存亡，是刘仲邠这位真诚的爱国人士无法放弃的事业。回到家乡后，他发现灵丘县小蒲湾村（今赵北村）的老百姓同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由于富豪盘剥，无土地耕种。1928 年夏，他看好地势，亲自勘察设计，多方奔走，筹集资金，动员民工，在塘河上兴修塘子狐至小蒲湾水利工程，他吃住在工地，与

民工同甘共苦。经过3个月的苦干，十里堤坝竣工，造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2600多亩。刘仲邠把这些土地全部移交给国民党灵丘县政府，建议灵丘县政府分段划拨给老百姓耕种。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称颂，国民党灵丘县政府奖给他银质奖章一枚，并授予他“义士”称号。

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刘仲邠感叹地说：“整个国家都将难保，我还指望兴修农田强国富民，这能有什么作用呢？”为寻求报国之门，1934年春，他又举家返回庆阳，将自己的部分田产和生产资料，施舍给家境贫寒的佃户，扶持他们休养生息。西安事变后，刘仲邠认定了中国共产党，配合陕甘宁省委工作团，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仓放粮，救济穷困，给红军捐献军粮20多担。1937年三八五旅进驻庆阳，他积极动员群众，帮助部队募捐和购买生活必需品，腾出房屋给部队住，解决部队的办公用品，还把自己的二儿子刘克武送往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帮助政府在全区实行“三七减租”，响应边区号召办起陇东第一家“利民工厂”。1940年9月被推选为陇东分区参议会参议长后，他根据当地情况写出了切实可行的提案，例如《实行民权主义，推进民主》、《发展国防教育》、《杜绝烟毒、赌祸、酒祸》。1940年10月22日，刘仲邠患急性喉癌去世。临终前他还在病榻上批文件、与各界人士协商工作，并说：“我苦苦寻求的真理，最后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走上这条道路是我很欣慰的。但是，我不能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一道工作了，看不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了，又是很遗憾……”他正如肖劲光同志的挽联所言：“任务重于生命”啊！

刘文英就出生在这样的大家庭。她少时，跟着父亲去过农田耕地，见识过父亲同农民一起劳动的场面，领略了中国农民勤劳、憨厚的品质。后来又跟随父母长途跋涉，从山西到庆阳。一路上，她不止一次问：“我们为什么搬家，庆阳比山西好吗？庆阳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等真正到了庆阳，扑入她眼睛的不是山花烂漫，孟春时节的庆阳，乍暖还寒，一阵阵风掠过，身体被刺得发抖，县城里常常出人的是一些衣着破烂的农夫，孩子们身上的衣服补丁擦补丁，甚至眼睛直直地盯着别人手里的馒头，久久不肯离开。

1936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教导师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工作进驻庆阳，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妇女解放、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的运动在庆阳展开，刘仲邠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庆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中，给红军捐献余粮，开仓放粮，不删不同方式救济百姓，并且把他在山西的家眷全部搬到庆阳。刘文英从此看见的父亲是一个忙碌的身影。1937年春，中共庆阳第一任县委书记蔡畅发动了一次“反冯灭霸”运动，这次运动在庆阳历史上是空前的，小文英随着大人们参加了批斗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集体集会，心里非常激动，以至于回家给母亲讲述情节时手舞足蹈，小脸憋得通红，惹得全家人都笑她。1937年10月，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驻防庆阳，刘仲邠不但把家里的房子腾出来给部队住，部队的皮毛加工厂也设在他家的前院。刘家人整天和这些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很是熟悉。不久，刘文英的二哥也参了军，刘文英兄弟姐妹更拿这些军人当兄弟待。

时间过得真快，刘文英很快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皮肤白皙，容貌美丽，并且饱读诗书，是庆阳人人羡慕的一朵花。周围许多士绅，以能聘刘文英为儿媳妇或妻子为荣，媒人跑个不停，但都非文英所愿。刘家虽为官宦人家，但全家人思想都很开明开放，对女儿的婚姻大事尊重本人意愿，不加干涉。其实刘文英最是喜欢八路军，她也想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汪运祖（1915—），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三八五

旅七七〇团营部书记，1938年，任团供给处股长、供给处主任。1939年，由七七〇团调人旅部后，一直从事后勤工作。曾任三八五旅供给部生产科科长、经济建设处处长三八五旅特务营营长，三八五旅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因为他先后负责或兼办司、娜、工广录办工作，常与当地群众交往。1943年，他为旅部创办的皮毛公司就设在刘家前院，他被清秀美丽、端庄大方的刘文英姑娘所吸引。汪又觉得刘文英姑娘是大豕闺秀怕遭拒绝便问计于当地人士田仰宏。田仰宏那时虽然也不过20多岁，但思想进步，为人真诚，与三八五旅旅部的很多官兵都很熟，建议汪运祖找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作媒。王维舟人称“王善人”，平易近人，在庆阳人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又十分关心部下的个人生活，自然很乐意帮忙。再说王维舟旅长初进庆阳县城时，就在刘仲邠家中，不但与刘仲邠关系十分密切，和刘家人都非常熟悉，此时王旅长又任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专员，因公务时常与刘仲邠见面，王维舟向刘家提亲是再顺利不过的事。

果然不出所料，刘母征求过女儿的意见后，就满口答应了这门亲事。汪老说：“因为在一个院子里，她妈妈对我很熟悉，对我很有好感。”刘文英的母亲征求过女儿的意见后，就请王旅长夫人马奎宣做女方介绍人，旅部秘书程占彪为男方介绍人，王旅长为主婚人，在庆阳举办了很简朴的婚礼，时间是1944年。汪运祖与刘文英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那时他已快30岁了。婚后他们的生活幸福美满。汪老说



刘文英与汪运祖夫妇

“婚前婚后所有的事都由程占彪一手操办，当年的结婚照我至今还保留着！刘文英人很好，她虽然是大家闺秀，出身殷实之家，但是能吃苦，很节俭。我忙于工作，家里也没有雇保姆，我们的八个儿女靠她一人抚养，家务常靠她一人操持。解放多年了，我当副师长时月工资269元，靠这些钱维持一家10口人的生活实在不容易。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向组织要求过什么。在她的辛勤操劳下，我们家度过了许多困难。几年前她因心脏病去世，她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伤心得近一个星期吃不下饭。”

婚后不久，三八五旅旅部又在小南门外搞运输队，调汪运祖任队长兼辎重营营长，其实就是解决军需问题。汪运祖带领战士们很快投入到了工作中，他们从定边到西峰开了8个骡马店，办了2个盐店，在庆阳县城办了工厂、“八一”商店。‘在驿马关设卡办批发站，主要经营食盐贸易，在解决红白区商业贸易问题的同时，也为部队换来了必需品。而这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自主创业，工作极富挑战，也非常辛苦。刘文英成了他手下的一个兵，陪着他鸡叫起半夜睡，哪里忙、哪里需要她，她的身影在哪里出现，把汪运祖上到营部办公室、下到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还利用空闲时间为战士们缝缝洗洗，忙得不亦乐乎。

通过三八五旅的干部战士几年艰辛努力，在大凤川屯田，发展工商业，边区的物资丰富了，人民和军队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一切，刘文英功不可没，嫁给三八五旅干部战士的所有庆阳姑娘功不可没。虽然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这部作品里不能一一写出庆阳女性、以及曾在庆阳战斗过的所有女性的传奇故事，她们虽然是平凡的，但她们为共和的成立，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伟大的，她们的故事永远根植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世代根植在老区人民的心田里，遇风猛长，逢雨开花。

1945年汪运祖调任三八五旅供给部部长，1946年2月离开庆阳任鲁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文英始终是他的部下和得力助手。“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后勤工作是庞杂的、艰辛的，责任又是非常重大的。部队的安定与否，战斗的成败与否，干部战士的家眷安排如何，后勤工作起着重要作用。刘文英就是这样跟着部队、跟着汪运祖在“炸台”前忙碌的人，她没有起眼的职位，没有显赫的军功，但却是默默奉献的功臣。

是啊！新中国的战功簿上可能找不到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太普通。但解放后，任江苏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的汪运祖将军，他的名字很显赫。“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必定站着一位伟大的女人。”极富有文化修养的刘文英，跟着这位“红安”将军，东征西战，默默奉献，用一腔热血浇灌着生养自己的土地，竭尽全力支持、帮助着丈夫的工作。

1952年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刘文英觉得自己孩子多、拖累重，为了让汪运祖把全部的精力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上来，她不计较个人得失，毅然辞职在家，专门从事家务和孩子的教育工作。在她的精心教育下，他们的8个孩子都成为了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在她的全力支持下，汪运祖为部队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刘文英——这位知书达礼、气度非凡的庆阳姑娘、中国著名将军县“红安”的媳妇，她高尚的品德、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始终感染着、激励着后代。她的大儿子汪海庆说：“我是在庆阳出生，一岁后离开的，所以我的名字叫汪海庆。我和老人一样，对庆阳也很有感情，如有空闲，我还想到庆阳来看看我的出生地。我的一些同学在北京投资经商，我打算动员他们到庆阳来考察投资……为故乡办点实事。”

刘文英非常朴实，朴实得犹如家乡的河流、山川，没有向谁炫耀

过自己的功绩，甚至自己的存在，但为造福一方，日夜奔流不息。她的儿子汪海滨说：“母亲在世时，从不让媒体宣传自己。她认为自己这辈子是主要支持父亲的工作，为家乡没有做出什么贡献，更不敢说为党做出贡献了……”

刘文英，当年她服务过的部队花名册上有这个名字，干部战士们的心中珍藏着这个名字，庆阳人民怀念着这个名字，生她养她的这块热土地上印着这个名字。

参考文献：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华池县委员会，1996.3。

《学习与交流》——中共庆阳县委宣传部，2010.7.16。

享誉陕甘宁的陇东“女侠”

——李叶

李叶（1902—1975），革命战争时期庆阳颇具传奇色彩的巾帼人物。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到1947年国民政府撤出庆阳之前，她一直为国民党庆阳执行委员会执行代表。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她任中共庆阳县委妇救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代表。与蔡畅、邱一涵、王维舟、马锡五、波涛、赵文为等人是战友，马文瑞叫她“我大姐”。她武艺高强，庆阳人叫她“侠女”，家乡人称她“女代表”。

李叶，庆阳县城城北人，出生于一个习武世家，祖辈除了种几亩薄田之外，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给商家押送货物。由于讲诚信、重义气，李家在周围名气很大。李家的家教严厉、分工明确 男主外、女主内，武功传男不传女。所以，女性个个温良贤淑，男人则威武强壮。到了李叶这一辈，上天打乱了他们家的传统，促使李家阴阳颠倒了。李叶姊妹五人二三个妹妹和一个体弱多病的弟弟（5岁时还不会走路），父亲常年忙于押运工作，身不由己。作为老大，她养成了吃苦耐劳、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良好品德。1914物春的一天下午，父亲娜叫到跟前劈头就问：“你愿不愿意习武？”看见父亲一脸的严肃，“愿意”这时母亲一下子就流出了眼泪。父亲忽地站起来，接着问能吃苦吗？你能凌强扶弱吗？你敢于维护正义吗？你……母亲转过身去，泣不成声，她不明白母亲为“要哭成这样。”

母亲给她绽开了布，洗头、洗脚，全身擦得干干净净。夜幕降临时分，“老影”（家谱）前面点亮了三盏灯，她与父亲并排跪在“老影”前，父亲重新问了一遍下午问过她的那些问题，然后向“老祖宗”说了一些关于自己无能等之类的话，当他拉着她叩头时，她看见父亲脸上有泪痕，这时她才隐约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似乎有一点明白母亲给她放脚时双手颤抖的原因。

李叶的生活从此以后和同龄女孩子有了区别。五更起床、二更睡觉，虎叉、锚子、链枷棍、九节鞭、马刀、飞镖、锁子石……与她相伴了一生。作为李氏家族武功传人，命运为她预订了人生的目标。

武功这行当逢单升级，一年拔筋、三年有型、五年强体，再往上才叫做有功夫之人。1919年，李叶虽然还不足够称为有功夫之人，但她已经能独立进行一些短途的押送了。比如帮人从定边进盐、从长武运布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时常有之。她文静、大方、贤淑，又有一手好的女红，在庆阳马岭已小有名气。这时候，驻扎在吴忠的马鸿宾到处搜罗人才，以稳固自己的势力。农历十月刚过，他就带着侄子位国民党团长造访李家，彩礼之类要多少李家说了算，条件是只要李叶嫁给他侄子就行。父亲本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当兵的，更不要说是嫁给军阀了，可又想：兵荒马乱的，宁夏马家非一般之人，如果人家先礼咱们把握不好，等到下硬手恐怕就不可收拾了，于是当场答应了这桩婚事。马家以50根金条作为订婚礼。李叶回忆说：“马家人办事干脆利落，看上去也很富有人情味。马团长不但一表人才，而且举手投足都很富有教养，与后来形容的战场上的马家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是站错队了。”

1920年秋，青海、兰州一带战事吃紧，“宁夏马”调一部分部队去援助“青海马”，马团长被调防。这一走就是3年，3年时间人事沧桑，面目全非。一小股土匪经常掠夺县城商家、侵扰当地百姓，弄得民不聊生，官方多次下令捉拿均无果。1921年春节前后更是肆无忌惮，腊月二十七日，这天县城如过会一样，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南城门敲锣打鼓，以示庆祝。县保安队派人查看，发现东塬土匪头子的人头挂在南城门上，下面四个已毙命的并排躺在城门旁。中午时分，县警备司令部在南城门召开现场宣判大会，列出匪首十大罪状和保安队的功绩，为表明县政府的决心，匪首人头南门悬挂3天以警示民众。

那天夜里，细心的母亲发现李叶是鸡叫二遍才回家的，炕下一双还没有烧完的青布鞋上留有血迹，父亲跑去一观察：“天哪！土匪个个是彪形大汉”！可是，天一放亮女儿就帮韩家去定边运盐了，看上去很镇定。

1923年春节前夕，李叶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马岭川破落户谷老大。丈夫的父亲早亡，母亲被小叔子（丈夫的弟弟）卖掉，田产被叔父（抽大烟）侵占，只有兄弟三人相依为命过日子，她只能嫁给这样的人家。因为她的背景决定了这一切。中国的女人生活道路很难走，没能耐的被丈夫三天两头敲打、被婆婆公公看不起，能耐大了没有人敢要你，在一个家庭里只能男人比女人能干，女人哪能比男人强呢！再说她李叶还与马家有瓜葛。

1924年春，马鸿宾部回宁夏，马团长听说李叶已经再婚，很惋惜也很愧疚，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缘故，造成了李叶婚姻的不幸，就备了一份丰厚的礼品亲自送给李叶，以表示歉意。由于这个原因，李叶在马家军的地盘上畅通无阻，也因此救出了许多革命同志，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大肆封锁时期，她为中共庆阳县委、县政府机关和三八五旅运回食盐、布匹、火柴等大批急需物资。有了这笔钱，李叶家在县城一巷子口办了个杂货店，再加上她押送货物，一家四口的小日子还算过得去。但由于她仗义疏财，日子过得很平淡。

1926年，李叶的父亲去世，照顾母亲和体弱的小弟的责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1927年，大革命失败，全国形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陇东也遭遇百年不遇的灾荒。有民谣曰：“人吃人，狗吃狗，飞禽乌鸦吃石头。”李叶3岁的儿子就被人抓去吃了。从这年到1947年，长达20年，李叶一直为国民党庆阳执行委员会执行代表。1928年，她丈夫的三弟眼看着家庭日子艰难、社会又动荡不安，便偷跑出

去，参加了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由于年龄小，当了一名通讯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是刘志丹、习仲勋与党中央的联络员。延安时期，为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专使牵马和内务。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卫戍部队工作。1966年回家乡，不久去世。

1929年，开始编区划村，谷老大被推举为村治委员督导。同年底，邪教“红枪会”由河南传入庆阳，势力很快壮大，教会头子以丰厚的利益引诱李叶入会，被她断然拒绝，因此惹来麻烦。1931年西川一带瘟疫。

盛行，王九信剧团一夜间就死了20多人。1933年初秋，东西河发大水，庆阳县城南关被淹没，“红枪会”妖言惑众，说灾难皆由一武功高强的女妖引起，如果她不被镇压，更大的灾难将会如期降临等。李叶5岁的儿子也在此时丢失（怀疑被人暗害，但证据不确凿）

1935年10月，袁国平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到达陇东，李叶与中共陇东特委迫女部长邱一涵相识，帮助邱一涵做妇女工作。1936年底，红军教导团驻庆阳县城，蔡畅名义上为教导团主任，实际是庆阳县县委书记。李叶又被蔡畅收为部下，与中共庆阳县委书记陈斌（四川籍人氏）一道工作，从此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动。1937年1月，为迎接三八五旅顺利进驻庆阳，县委先后成立了6个委员会，李叶被任命为“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长蒲秀珍），配合做妇女解放工作，杂货店负责搞部分军需物资。入冬，谭世麟的“还乡团”反革命气焰嚣张，凡与共产党有染的进步人士均遭迫害。李叶家的杂货店被抢劫一空，丈夫和刚满1岁的儿子被绑架，并威逼她以每月3块金砖作为他们的经费资助，才放人。李叶与蔡畅、王维舟商议，配合；张才千的七七〇团，不但解救出了孩子和丈夫，而且给了“还乡团”以沉重的打击，扰民事件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遏制。

1938年9月，陇东的多事之秋来临，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执

行国民党甘肃省长朱绍良根据国民党中央制订的一系列反共政策，不断寻衅闹事，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并规定了“八大方针”、“十二项原则”，使陇东磨擦事件不断升级，中共宁县、合水、镇原县委接连遭破坏，不少同志被扣押或牺牲，七七〇团一营被迫从宁县撤出，暂驻白马、孟现。1939年9月奉命驻防释马关一带。李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深入食穴，配合张才千部粉碎敌人的阴谋，使不少革命战友免于牢狱之灾。

1939年冬，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前方战事吃紧，后方供给短缺。敌人采取残酷血腥的手段封锁边区，三八五旅干部战士在战事频繁的状况下，每天咽着无食盐的饭菜，战士中已经发现缺盐症（皮肤生甲，奇痒难忍）李叶的丈夫去定边驮食盐，人与牲口都被国民党吴忠马部扣押，10多天无消息。在这危机关头，李叶只身一人骑着毛驴抱着儿子赶往宁夏，途经环预麟击，好当场毙命，毛驴的肠子露了出来，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她的左脚踝骨轻微受伤伸情况危机。她说：“11月天气，非常冷，地冻得裂口子，手刨了个战窝窝把孩子埋住，在这危机关头，李叶只身一人骑着毛驴抱着儿子前往宁夏，途经环县曲子时遭黑枪袭击，孩子当场毙命，毛驴的肠子露了出来，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她的左脚踝骨轻微受伤，但情况危机。她说：11月天气，非常冷，地冻得裂口子，我用手刨了个土窝窝把孩子埋住。当时十个指头全都出了血，又喊来东沟一姓郑的拾粪老头，让他叫来村上人，当场把驴杀了。当天村上支起了一口大锅煮驴肉，村子里提前过了个年。”她说这些话时，眼睛望着远方，似乎看见了当年，看见了天宫里的儿子。

李叶在曲子东沟村修养了几天，待伤势好转后就直奔宁夏吴忠。在马团长的帮助下，谷老大及他的十几垛食盐顺利回到了庆阳县城，庆城的中共党政机关和三八五旅食盐得到了解决。后来三八五旅军需

科长汪运祖在驿马关办了货运批发站、在县城办“八一”商店、骡马店等，地方县政府也相继组织筹办了磨面站、豆腐店、编织厂等，庆阳居民生活必需品的紧缺问题才得以缓解。

李叶也利用她离开吴忠时马部赠送的金条在县城开办了“利民”编织厂，动员、组织妇女纺线、织布、织袜子、毛毡，还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等。1940年，三八五旅首先在军队中发动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王维舟领导指战员们除了在庆城周边地区大搞生产建设之外，又在合水、大凤川等地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在三八五旅的支持下，“利民”工厂更名“联合”工厂，以编织为主，给延安党中央输送生活必需品。

1939年12月，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办事处和第三区公署、驻庆阳防空监视哨和盐务税收等机关人员被驱逐，驻守州‘铺的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公署被群众捣毁。1940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成立，朱开栓任县长。共产党在庆阳县的工作基本走向正规化。8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庆阳区党委机关由曲子迁至庆阳县城北田家城，途中遭州’铺国民党余寿袭击，书记马文瑞受重伤，无法继续行走，机关同志与州铺天主教堂胃议，先将马书记秘密安置在教堂养伤。结果当天夜里洋教士就将消息走漏出国民党马家军准备策反教堂里应外合，以朱寿的民团为主力活捉马文瑞。太阳压山时分，李叶发现本村朱寿手下的一名骨干反应异常，似乎还有人在监视她。她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让丈夫去和他们拉话，自己敏捷地出了后门，一路奔跑五公里路到教堂，二话没说，背起马文瑞就往教堂背后的山沟跑。将马文瑞藏在州，铺南黄家洼村的山洞后，她又让丈夫借了邻居家的几只羊，每天扮成牧羊人，给马文瑞送饭送药。敌人兴师动众地包围了空教堂，马文瑞脱险了，但李叶的儿子从炕上掉下来摔死了（是摔死的还是有人害死的，未弄清楚）。所以，马文瑞一直称李叶“我大姐”。

李叶在世时，马文瑞经常嘱咐人探望她，她去世后，马文瑞千里迢迢赶来庆阳吊唁。

1941年，李叶应邀与王维舟、谢觉哉一起出席陕甘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另一位女代表是冯云）。1942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李叶作为一女代表，出席庆阳县第二届参议会。1944年上半年，受边区党委的指示，李叶以开办武术训练班为契机，在庆阳县赤城、白马一带秘密组建了当地武装——“赤城游击队”，由最初的十一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6月26日，国民党大肆进攻西川（马岭川），该游击队在这次战斗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是马锡五担任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第二年，形势较为平稳，庆阳的干部多以做群众工作为主。组织安排李叶与庆阳县委书记陈斌赶集做宣传，揭露国民党企图灭共的阴谋。接近年关，国民党在西北地区战局占优势，共产党人被枪杀事件频繁发生。党组织安排李叶转入交通工作。

1947年2月，胡宗南两个师的兵力沿庆环公路北上，陇东战事全面拉开。3月1日，胡宗南部驻庆阳县城，当地干部战士全部投入战斗，经过激战。3月5日，庆阳县城收复。从此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庆阳（特别是西川或叫马岭川）就成了国共两党的拉锯之地，“合水战役”、“环县战役”等战斗接连发生，国民党民团等组织气焰嚣张，革命同志经常惨遭杀害。4月中旬，由于叛徒出卖（叛徒不久就被秘密处决在悦乐）陈斌被捕，7天后在县城广场公开枪毙。李叶等人准备劫法场，由于敌众我寡，陈斌同志一次次用暗语劝解，才保存了中共庆阳县党组织。李叶生前常常说：“陈斌死得太可惜了，那个同志要是活着……我很想用自己换回来他。他被反动派执行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敌人同时向他开了三枪，有一颗子弹是他呼口号时从嘴里打进去的。那个该千刀万刚的！”说这话时，她总

会拿起衣襟擦擦眼睛，然后补充一句：“老了，眼睛雾的啊！” 19
仙年3月下旬，二边分区地方兵团南下转战陇东，李叶担任支前队队
长，组织妇女做鞋、磨面、烙饼子，率领妇女支前，保障前线战士的
生活供给。4月初，西府战役打响，她让丈夫照管两个年幼的儿子自
己随支前队入陕（宝鸡）。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国民党驻
陇东反动势力成了秋后的茄子——打蔫了。7月下旬，西峰解放，李
叶返回庆阳县委，帮助清理敌特分子。

全国解放后，1950年底，党组织安排李叶去平凉行政公署工作，
她以家里孩子小，丈夫身体不好为由谢绝了，回家乡当了普通老百姓。
后!!来，每每有人问起，她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平静地说：“江山需
要有谋略|的人坐，我没有蔡畅那样的本事，咱不识字，吃不了凉粉，
不要占着板凳。”1975年5月5日（农历端午节），李叶走完了她传
奇而平凡的一生。

战争是残酷的，它让女性失去了性别。“兵荒马乱”这词李叶触
摸的次数太多，甚至她不想谈起这类话题，直到死神叫她走的那一日，
她也没有向谁吐露过自己一生的揪心之痛或无限风光。那个年代经常
开会讲阶级斗争、讲革命家史，她常常被请到省上、县上、公社去听
会、去讲话，她讲庆阳的战斗史、讲战友邱一涵、朱开桂、王维舟、
马锡五、张才千的故事，讲到陈斌时她会哭，讲起蔡畅时，她总坚信
自己的孙女将来会像蔡畅一样做一个好人。她为人处世非常低调，从
不跟别人争什么，甚至一句话都不多说，但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很有来
头，因为经常有上面的领导打电话问候她（县里、公社派人去她家里
传达电话内容）。2010年9月27日，华池县举办红色旅游文化节期
间，“刘巧儿”原型封芝琴老人受采访提及李叶，老人很激动，说那
时候自己非常羡慕她；说她干练，不但能干，很强（漂亮、聪慧）

参考文献:

《庆阳县文史资料》——中并庆阳县政协，庆阳县文卫法史工作委贵会，1999.12等。

《李叶简历》——郑氏提供（李叶儿媳妇）

“刘巧儿”原型

——封芝琴

封芝琴（1924—），原名封捧儿。陕甘宁边区“抗婚英雄”，婚姻自主“女神”，陕北说书《刘巧团圆》、秦腔《刘巧儿告状》、评剧《刘巧儿》、连环画《刘巧儿》、数字电影《刘巧儿家飞来个小洋妞》中“刘巧儿”的原型，甘肃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劳动模范，甘肃省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胡耀邦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接见，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获得者，陇东银幕形象第一人。她的照片被国家邮政总局庆阳分公司制作成“来自刘巧儿家乡的祝福—吉祥如意”名信片。

封芝琴，1924年5月15日出生于甘肃省华池县城壕乡火连湾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家人非常疼爱她，便取名捧儿。她祖籍山西，明朝末年先辈带着家眷，移民庆阳（今庆城）县城北门封家屯，祖辈以耕种为生。同治年间，她的祖爷爷封万奎，逃荒讨生活，落户甘肃华池县原区划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村。封万奎勤劳、善良，待人和气，颇有人缘。生有四个儿子，按“仁义礼智信”依次取名，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捧儿的爷爷排行老三，名封生礼，奶奶辛氏。生活就是这样，往往期望越高，失望亦越高。封生礼30岁出头就已经堕落成远近闻名的大败家子，玩赌、吸食鸦片尤为拿手，转眼间牛羊牲畜、土地均变成了别人家的财产，一家老少只好给人打短工、租种土地为生，租一孔破窑洞居住，一件老羊皮袄“白天穿、晚上盖，遇见下雨天毛朝外”。所生一男二女就是在那吃不饱、穿不暖的破窑洞里，随着岁月长大的。

封芝琴的父亲封彦贵一生务农，勤劳、朴实，是庄家行里的能手。少年时常常遭白眼、饿肚子的苦日子，造就了他生活精打细算且诙谐幽默的性格。17岁时与悦乐赵淫子钟冬存结婚，钟氏出生于大户人

家，生性豁达，为人善良、心惠，聪明直爽，家里家外一把好手，是农家的“能媳妇”。她的到来不但使封家的日子过得有了起色，不久又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人口，生下封家的长女捧儿。当时家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平凡的小女孩，长大后竟成为新中国成千上万的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楷模。

捧儿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尽管父母勤俭持家、辛勤劳作，但因生产力落后，靠天吃饭、靠黄土地里刨食还是难养众口，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当时，环境恶劣，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与大自然的其他生物一样，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捧儿4岁时村里闹“天花”，全村小孩子因高烧死了一茬人，属牛的孩子只有捧儿熬了过来。

穷人家的娃娃早当家。捧儿过早地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也过早地懂得了劳动的重要性。大病痊愈后她过了5岁生日，慢慢地成了家里劳动的一分子，平时帮妈妈烧灶火，出去时见路边的柴火也会捡回来，甚至烧炕、喂猪、挖野菜，稍长便漫山遍野去放羊，吃得差、穿得破，经常在有野狼出没的大山深沟里冒着生命危险干活。这些虽然辛苦，但还算自由，最痛苦的是“缠脚”。母亲是位封建礼教浇灌出来的妇女，“三从四德”是她教育子女的重要“课本”。这种对子女竭尽全力的教育，无非是希望女儿将来能嫁个好家庭、好丈夫，日子过得比她好而已。

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打土豪、分田地，在南梁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华池最先享受到了红色政权的实惠。封家分到了10多亩土地、1盘石磨和1头牛。成了土地主人的封彦贵倍加珍惜生活，他痛窑、造树林、种果园，千方百计买牛羊牲畜，建造起了自己幸福家园。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和人民新政权的建立，不但给苏区人民生活上带来了极大的改观，也使人民的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列

宁小学和军政干部学校的创立，禁烟、禁毒、放脚及反封建买卖婚姻等法规的制订，大生产、减租减息、拥军优属、变工队的开展，陇东掀起了男女平等、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送儿子、丈夫参军等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

1936年城壕解放，捧儿的脚也得到了“解放”。她整天乐哈哈地跟着母亲学女红，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交流，手艺越来越精湛，巧手闻名乡里。

中国人讲究“四世同堂”，陇东人信奉“早生儿子早得福”的习俗，更喜欢串亲、连亲、姑舅亲等亲上加亲的婚姻。捧儿4岁就订下了“娃娃亲”，未婚夫乳名岁蛋，后来改名张柏，是她姑父的亲哥哥张金财的次子。她小时常去姑姑家，和柏儿一起玩过家家游戏，间或帮家里人干一点杂务，两小无猜，属于青梅竹马那一类。10多岁后，他们开始懂事了，偶尔也有村上的大人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从此彼此见面就有了不好意思的感觉。捧儿一天比一天水灵，张柏不但长得伟岸，而且为人忠厚诚实，踏实能干，他们开始隐隐爱上了对方。

“女大不中留”，这是庆阳老辈人传下来的俗话，封彦贵深知其理。但他也不能把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强”女儿白送给张家，订婚时的10块银圆，连女儿这些年的喝水钱都不够，给他张金财聘媳彩礼上个“二价坡”也不为过。可是张金财见面只吆喝着给儿子娶媳妇，彩礼只字不提。干打雷不下雨的日子过了将近一年，封家也托人带过话，封彦贵心里极其不舒服：“虽然现在提倡婚姻自主，可谁家的媳妇不是钱买的；再说你张家穷得叮当响，凭啥干娶我的女儿。”封彦贵心里有了另外的想法。1941年底，他通过二妹将捧儿许配给了悦乐人高儒海的儿子，当时的高儒海在悦乐乡公所当文书，论家庭、论地位都比他张家强得多，当下就说定了。事情一挑破，捧儿死活不愿意，高家也是个吝啬鬼，只给了几斗小麦和玉米及几块银圆，就不吱

声了。看着哭成泪人似的女儿，封彦贵心里又有了想法。1942年6月，他暗里托人，将女儿以48块银圆、2400元法币许配给了城壕张南塬张献炽的次子。张家家底殷实，父子都很勤劳、能干，女儿嫁过去不愁没好日子过，可谁知女儿还是不愿意。这三闹两折腾，传到了张家的耳朵，张金财以封彦贵屡卖女儿为由，向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告发。华池县司法处以包办买卖婚姻为由，草率地撤销了封捧儿的三次婚约，以没收买卖所得全部彩礼而告终。

山里长大的娃娃见识少，也正因为如此，对感情十分专一，爱的程度也更强烈。捧儿着实希望张家赢官司，不料得到了这样一个结心里过至极。父亲的严厉管教、奶奶和母亲的无能为力，使她第一次觉到了一个人的渺小，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个农村小女子命运的悲惨年底，华池县政府宣传队下乡宣传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抗日救亡政策等。女干部的演说装扮，让她心动。但自己不识字，要成为公家人，这辈子没可能了，可是争取婚姻自主她想试一试。1943年2月，她趁着给四奶办葬礼，与张柏私订了终身。3月初，封彦贵又以银圆20块、法币8000元和一些布匹，将女儿许配给了庆阳县新堡区玄马湾贾山底下朱财主的儿子朱寿昌。朱寿昌在国统区当过伪保长，比捧儿大11岁，边区人民看不起他，所以对象很难找，封彦贵将女儿许配给他，只是为了多得几个钱。

朱家即将来娶亲，捧儿心里火烧火燎，怎么把这消息传给张柏呢？恰好她的姑表兄张岳来找舅舅办事，捧儿将近来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张岳，张岳是个急性子，没想到舅舅把表妹往火坑里推，赶快回去报信了。

农历三月十八日，悦乐寇沟门娘娘庙会，以张金贵为首的张家人趁封彦贵看戏的当儿，组织了10多个人顺利地实施了抢亲。抢亲前张家做了两手准备，身强力壮的男子去抢人，女人布置好洞房，人一

回来就拜堂。令张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顺利地抢回来了，可捧儿死也不拜堂，张家怕逼急了捧儿会出个事，就先让捧儿休息，再做打算。第二天，封家差人报告了封彦贵，封彦贵立即到悦乐李家湾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控告张金财抢亲之事，张家又拒不交人，这是严重的扰乱社会治安，参与抢亲的张金财等6人被县政府拘留。捧儿很难过，觉得不能连累别人，与张柏商议到华池县司毕处投案“自首”，张柏当下被关押，捧儿被姚家姑妈“取保候审”。不久，张金财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其他人判处劳役，张柏暂时关押，令封捧儿在姚家听候处理。

抢亲案传沸沸扬扬，捧儿觉得天昏地暗。合水县县长姚世秀回家省亲（姑父的弟弟），听到情况后，鼓励捧儿上诉或找陇东专署马专员告状，她一下子心里有了主意。四月初六，天未放亮，她就备好的干粮，拿一根挡狗棍，匆匆赶路，到40公里以外的庆阳县城找马专员告状。

庆阳县城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眺东专员公署所在地，是陇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县长安排她住了下来，并劝说她明天回去。采访时，她说记得那一夜很长，睡在床上，她想了好多，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她揣着县政府的人送给她吃的东西，但却没有听从县政府的人叮咛她的话，一出县政府大院，就到处打听马专员的住处。当她顺着路人的指引来到马专员的家里时，马专员和爱人正准备吃饭，马夫人李春霖热情地拉她坐下并给她递来了筷子，马专员和善地问她家庭情况、来庆阳的原因。她当时满腹冤屈犹如决堤的闸，涕泪交加，一泻而尽。马专员给她讲了许多道理，并夸奖她做得对，然后让她先回去，说这事他一定马上去调查。

第二天马专员就来到了悦乐，找到了华池县县长兼司法处处长第五汉杰调查情况，认为案子需要重判。当时有些干部害怕这样有损于

法院的形象，马锡五认为“法大如天”。他组织干部学习有关边区法律知识，语重心长地给干部们做工作，走乡串户访问民意，找捧儿征求意见，最后决定暂时放出张柏等人，重审这桩婚姻案。

5月29日，马专员召开了温台区三乡群众大会，除了当事人封彦贵、张金贵、张金财、捧儿和张柏到场听候审判外，参加大会的有2000多人。临时法庭审判席的两侧坐着马锡五、陇东分庭推事石静山和华池县司法处的审判员，石静山介绍了案情的经过，马锡五让到会群众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得非常热烈。法庭最后合议作出了如下判决：一、封彦贵违犯边区婚姻法，屡卖女儿，所得法币7000元没收，并判劳役3个月，以示警诫。二、张金财、张金贵等黑夜聚众抢亲，惊扰四邻，有碍边区社会治安，判处为首者张金财徒刑2年零6个月、张金贵1年零6个月；判处积极附和抢亲者张德、张仲等3人劳役各3个月；其他附和者予以严厉批评教育，以明法制，以儆效尤。三、封捧儿与张柏虽属幼年订婚，但双方情投意合，自愿结婚，其婚姻准予有效。接着，马专员将一张“结婚证”

双手递给了捧儿和张柏，祝愿他们和睦幸福，希望两家和好如初……这样一的审判方式是首例。既合理地惩治了违法者，又保护了边区婚姻法，更赢得了群众的拥护。马专员从此有了“马青天”的称谓。封捧儿婚姻案的成I功审理已成为中国司法史上著名的案例，被誉为20世纪八大名案之一，是共和国法制史上唯一以人名冠命的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

捧儿跟着张柏来到张家，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两家人经亲朋的劝说也和好如初了。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娃娃从此以劳动为荣，开始了他们将近半个世纪的恩爱生活，成为边区夫妻互敬互爱的典范。

捧儿婚后改名封芝琴，她抗婚的事迹成为边区的特大新闻。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题披露了

此事，并予以高度评价，于是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根据地也引起了古元的《马锡五调解婚纠纷案》开始，有著名记者李普的《一件抢婚案》，陕北著名民间盲艺人韩起祥长篇鼓词《刘巧团圆》，脆东中学语文教师袁静崑腔剧本《刘巧儿告状》。长篇鼓词《刘巧团圆》首次将主人公封捧儿改为刘巧儿，张柏改为赵柱。生活中的封芝琴成了艺术界的刘巧儿。延安文艺工作者还编排了话剧《刘巧儿告状》，50年代中国评剧院又将其改编成评剧《刘巧儿》。从此“刘巧儿”的名字响彻全国，“刘巧儿”精神宣传了《婚姻法》，鼓励了一批又一批男女青年追求自由婚姻。

1956年，随着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戏剧电影《刘巧儿》的上映，她成为陇东第一个走上银幕的人物，“刘巧儿”成为“婚姻自主”的代名词，成了妇女争取婚姻幸福的品牌。

银幕上的“刘巧儿”活泼可爱，舞台上的“刘巧儿”光灿照人，生活中的“刘巧儿”积极响应党中央政策，无私配合当地政府工作，但她的人生道路充满着荆棘，她毅然努力用自己的热情和心血艰难地跋涉着。

封芝琴婚后不久嫂子就去世了，留下3个女孩子，最大的才6岁，自己后来又生了2个女儿、抱养了1个儿子。对于偏远的陇东山区人来说，养大这么多孩子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但她含辛茹苦地把她们带大了，并且6个孩子都是婚姻自主，都不要彩礼，这在当时的这块土地上确实是罕见的。

1943年，城壕村先后被树立为边区文化教育和卫生文明模范村，村长张正财响应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10天开荒25亩，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去延安参加劳动英雄大会，受到了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亲切接见，被誉为“张铁人”。边区政府对此进行了大巧宣消息在生产落后、思想观念保守的陇东山区如若惊

雷，对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强”媳妇的捧儿震动很大。“谁说女儿不如男”，要成为劳动能手。事实上她不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还带动了村里的其他妇女。

1947年春，国民党集结加万大军大肆“围剿”陕甘宁边区，止酣开延安大门。战事十分吃紧，扩兵宣传力度一次次加强。这日子过甜蜜，张柏似乎一步都离不开她，但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张柏送到了前线。张柏作战机智勇敢，不久就被提升为班长，大小十几次战役都表现得极为勇猛顽强。在庆阳县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遭遇战中，他左胸被弹片击伤，落下终身残疾，他的左臂再也没能伸直过，直到1991年4月10日去世。但是在封芝琴的带动下，张家人从没有在关键时刻给政府丢过脸，他们急政府所急，想政府所需，张柏负伤不能上前线，哥哥张德接替他去参了军。

张柏在前线作战之际，他的母亲、嫂子相继去世、不到半岁的小儿子夭折，大儿子又奄奄一息，封芝琴无奈之下，听从公公的建议，在就近部队选了一位“命大”的战士当了儿子的干爹，但不久儿子还是死了。1998年2月，几经周折，当年儿子的干爹、现在西北大学的退休老教授张宣与74岁高龄的封芝琴，在西安重话当年时，两位老人深深陷入了对半个世纪前往事的回忆。四川籍人士张宣当时在延安大学任教，刚20出头，未婚。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延安所有党政机关全部撤离，学校师生在边区内开展实地教学活动。5月张宣带领部分学生到陇东分区，协助后方部队工作，不料被选中给移风易俗的青年榜样“刘巧儿”的儿子当干爹，他欣然应允了。按照华池的习俗干爹需要给干儿子拴银锁，是为“长命锁”。张宣没办法，只好从一位军属送给他的“红裹肚”上剪下了一节红丝带拴在了孩子的脖子上，实施了拜认仪式。半个月后，由于行军需要，他没能来得及与干亲道别就离开了这片让他牵挂的热土。在那艰难困苦的战斗岁

月里，生死未料，匆忙一别 50 载，历经坎坷的张宣每每念起那次经历，感慨万千。退休后的一篇回忆文章引起了他的学生的注意，后经他的学生阎琦教授的张罗和媒体的帮助，几经周折，终于与封芝琴于 1998 年 2 月 8 日相见。回想当年，他禁不住老泪纵横，特别是知道他这个“命大”的干爹没能留住干儿子的一条命时，非常悲痛。这次干亲相会，《西安晚报》、《甘肃日报》、《陇东报》、《大连晚报》等分别作了报道，再一次掀起了“刘巧儿”热。

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热潮。封芝琴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力所能及地维护国家的方针政策，做着自己的贡献。1955 年封芝琴被选为悦乐合作社副社长，并担任了村妇女主任、生产队妇女委员，由管一个小家变成了大家的主心骨。”56 年当选为悦乐公社第四届人代会代表，196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出席华池县历届代表大会，从此成了华池县代表。1964 年又被届人大代，人大常委会委员，表面上看十分风光，不仅工作词任务重大，而且家乡流言蜚语四起。人们认为能随时走州过县的她：说不定啥时候就跑了，张柏只能算个踏板……不是没可能，由于她工作很积极，组织也很重用，她确实有好几次参加工作成为公家人的机会，但她都放弃了，张柏是她的全部，她舍不得他，他在家里等着她哩！

队里更需要她，封建势力的影响在穷山沟里一时半会儿还消除不掉。其实，她的要求很低：“我喜欢劳动，把地里活干好，把孩子拉扯大，这是我的任务。”她从不与人攀比、不苛求待遇。这样一位中国农村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却还要顶着来自外界的闲言碎语去工作、去生活。人常说唾沫星子是大海，白眼也能瞪死人。但是有张柏的信任和支持，她义无反顾地冲破封建思想做她认为正确的事。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混

乱，封芝琴和许多受害者一样，不明不白地被卷进了漩涡。1968年，《刘巧儿》被当成“毒草”停止放映，舞台上的“刘巧儿”新风霞和生活中的“刘巧儿”封芝琴都遭受了株连。新风霞被折磨成了残疾人，后半辈子没能离开过轮椅；封芝琴被当作“婚姻的大骗子”被隔离审查，接受批判、劳动改造和交代与“黑帮”人物的反革命关系，她成了阶级敌人和坏分子，被拉出来在悦乐全乡，一个村挨一个村地进行游村、揪斗、批判。她说每当听见“打倒坏分子”的口号，看见台子下面那么多熟人都拿眼睛看她，那份羞辱啊！她恨不得脚下有个老鼠洞钻进去！这么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村女性，她的地位太低，接受批判的级别却很高，她只能硬撑着这防不胜防的“枪林弹雨”。“抗婚英雄”的牌子没能改变家人的社会地位，却株连了一大片，张柏常常受到造反派的凌辱，走路不敢抬头；二女儿被迫辍学，回家操持家务；规规矩矩参加生产劳动的兄嫂、弟弟、妹妹们也常常遭到造反派的“点评”。一年多时间里，封、张两家的亲属精神上受到了无端的折磨。幸亏有张柏自始至终与她共同抵御风雨。1969年2月，经组织多方审查，她被无罪释放。今天提及此事，老人感慨地说：“世上还是好人多，我啥时候也忘不了受批判时期，一些干部群众私下里对我的关心。”说这话时她眼里流露出无限感恩和善良。

在这个世界上，封芝琴最热爱的是共产党。她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怀着敬爱之情，真心实意地用自己的血汗捍卫着对党的忠诚，克服种种困难，竭尽全力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大跃进”时期，村里的男人都去华亭大炼钢铁，她把当时还小的女儿寄放在别人家，带领全村妇女几十天不回家，在封冻前耕完了所有的土地。华池山大沟深，土地广袤，女人们累得变了人样子。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她身为民兵连长、突击队长，对毛主席的《愚公移山》活学活用，在地如鞋带宽的山洼里修出了层层梯田。“三忠于”、“四无限”期间，她积极带领

村上的妇女识字等，为了巩固学习成果，她强调全村人把对应的汉字写在农具、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上，成为庆阳农民识字学习的典范，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中国的事情，要从娃娃抓起”。作为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她不会高谈阔论，摆不出很多的道道，但她明白脚踏实地的道理。20世纪70年代，为了让村里的娃娃就近上学，她腾出家里的窑洞，解决村里孩子的上学问题，而且还给来上课的孩子烧开水、补衣服、烤干他们弄湿的鞋袜，给娃娃们当了一年多时间的代理妈妈。实事求是，是中国老百姓的信仰，也是封芝琴的一贯作风。70年代末期，一些党政干部不重视调查研究，片面地认为粮食特大丰收。她心里嘀咕：长此下去，1958年后的悲剧又会重演。1977年，她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她向上面如实反映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发展生产的建议，为此得罪了不少年轻干部，特别是当地一些领导干部。

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庆阳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吃饭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封芝琴干劲十足，她在地里没有少投入，各级代表会没有少参加。国家和省级领导、知名人士都没有忘记她，总书记胡耀邦、中顾委委员刘景范、甘肃省委副书记仲兆隆、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副省长刘平、副省长张学忠、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刘志丹女儿）、《刘巧儿》扮演者新风霞、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石宗源、甘肃省电视厅副厅长海飞、习仲勋夫人齐心、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倪萍、《人民日报》记者郑秀满、《甘肃日报》记者常垦及当年在陕甘边区工作过的老同志汪锋、肖华、黄罗斌、王秉祥、孙作宾、李登淑、戴占魁等，分别于不同时期专程看望了她。石宗源题词“开创新时代，跨入新世纪”。齐心以“开启

一代新风”给予她高度评价。可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广种薄收的种植习惯，祖传的务农本领并没能使她家富起来。她的家庭依然供不上电，买不起电视机，张柏患病偏瘫在床3年，她卖光了家里能卖的东西，也没能凑够钱去大医院治疗，终于造成遗憾。她卖了庄稼人赖以生存的家畜也没能凑够孙子的学费钱，眼看着孩子有些怨愤的目光，除了心酸，她还觉得无地自容。后来，她的困难被长庆石油勘探局领导知道了，他们慷慨捐助，每年供给她3个孙子学杂费，直到中学毕业。不服人、更不服老是封芝琴的性格。1995年她听取专家的建议，带领儿子、媳妇种植了地膜覆盖玉米，在大旱的情况下仍然亩产400多公斤。

1996年在华池县“九五”规划讨论会上，她建议在全县大面积推广这种科学种植方法，得到了县上领导的重视。这一技术的推广，使华池县农民人均产粮过千斤。她的儿子张文平说：“妈妈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毋宁说：她与千千万万个祖国的优秀儿女一样，是国家的“顶梁柱”。

“让共产党的江山，就像庆阳漫山遍野的山丹花一样红艳艳。”她这么说，也这么做。40年代封芝琴就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是全国“双拥”模范。抗美援朝时期，她捐献出自己仅有的2元人民币和1块银圆。几十年来，她情系军营，始终与战士心连心，拉练的部队战士们能吃上她的水果、喝上她烧的开水，穿上她亲手做的军鞋或鞋垫。每逢“八一”、“春节”等重要的节日，地方人武部的官兵总能吃到她包



封芝琴送孙女参军

的饺子、收到她送来的土特产。2002年11月，他又把孙女送进了部队。这就是多次评为“双拥”先进个人的封芝琴，一位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教育着子女、感动着我们。

人生风雨几十年。如今已经80多岁的老人，她最感激的人是封芝琴送孙女参军“马青天”。“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要不是‘马青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个普通的农村女人，办不了啥大事。但是，只要符合党的政策，能办到的事就尽力去办，我不能辜负马专员。”从20世纪40年代起，“刘巧儿”和“马青天”因一桩婚姻纠纷案在陇东结下了情谊，共同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艺术生活，至今已经68年。作为陕甘苏区红军创始人之一，马锡五的事迹在庆阳广为流传。马锡五先后于1946年4月、1955年9月、1961年9月3次看望封芝琴并与之长谈，关心她的家庭、生活与学习，句句激励、谆谆教诲，使她终生难忘。1962年4月10日，马锡五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4月中旬，封芝琴才从广播上得到此消息，当时就失声痛哭，她不明白“连毛主席都夸赞的好人命咋就不长？”40多年过去了，回忆那段历史，老人仍然泪流满面，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当听见有污蔑马专员的言论，她都会据理相争，哪怕自己多站几次批斗会也无所谓。“为人民谋利益，死而后已”是马专员的为人。“向马专员学习”是她一直告诫自己的内心独白。封芝琴是那类说到做到的人。她呼吁关心妇女儿童工作，先后提出《关于做好妇女病普查》《关于集资办托儿所》等十多项关心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提案建议，认真履行一代表、老委员的职责。庆阳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经过40年的开发，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规模，也成了不法分子盗窃、破坏的目标。封芝琴家住在公路边，经常看见不法分子肆意猖獗地破坏国家财产，常常心里火烧火燎，想去

报案，又力不从心。2008年10月，她卖了家里的杏仁、杏干和黄花菜，终于凑够钱安装了电话，发现有人偷油就报案，使国家少遭经济损失。

封芝琴为人和善、热情、大方、重感情，她最牵挂的是曾经帮助过她、或与她的事件有联系的人。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在银幕上是家喻户晓的“刘巧儿”，她把这位民主革命时期反封建的先锋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1950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点名观看了新凤霞领衔主演的《刘巧儿》。大幕降下，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演职人员时亲切地说，感谢你为全国妇女们演了一出好戏。邓颖超提出，把《刘巧儿》灌成唱片，在全国宣传。随着中央领导和外宾观看次数的增多，“刘巧儿”走向了世界。可新凤霞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致残，“评剧皇后”的后半生只有坐在轮椅上带学生。两个“刘巧儿”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3月7日，年逾花甲的封芝琴和老伴赶往北京新凤霞家，两位老人促膝长谈，

封芝琴带了许多家乡的土特产和亲手绣制品，新凤霞送她彩色泥塑刘巧儿。1995年1月封芝琴受全国妇联和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邀请，参加全国百名老人游京城活动，在“春晚”制作，两位“刘巧儿”与观众见面，在全国再次掀起了“刘巧儿”热。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去世，6月9日闻知噩耗的封芝琴，默默地捧着泥塑“刘巧儿”，站在新凤霞送她的《老来红》国画前照了一张相，然后在桌子上，摆放好泥塑，给她点上香，泪流不止。这是陇东人最原始、最虔诚的祭奠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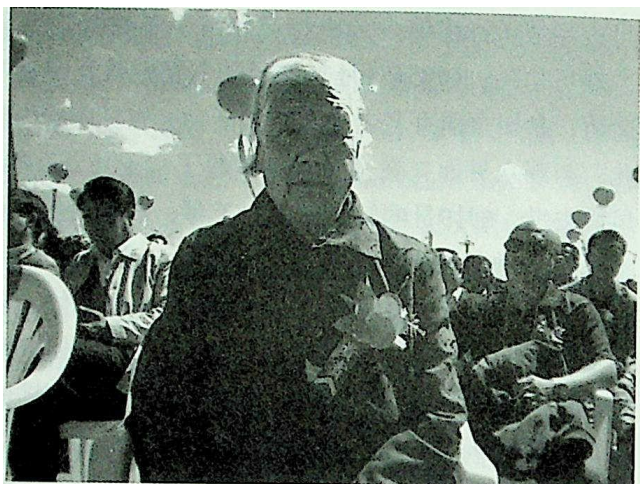
在她的生活谱系上，需要感恩的人很多。马锡五夫人李春霖、表哥张岳、合水县长姚世秀、老支书李培堂、支“左”解放军排长谷天建、干亲张宣、长庆石油勘探局团委书记许允、长庆石油勘探局局长胡文瑞、方挪、李银、张雷欣、马斌、张万福、闫焕智……包括她的

子女们，唯独没有她自己。

风风雨雨，她心里最舍不得的人是张柏。历经坎坷，轰动陕甘宁，19岁与张柏结婚，她与这位老实本分的庄稼汉恩爱一生。如果说马锡五对这桩婚姻案的处理维护了边区《婚姻条例》，那么他们夫妻的美满婚姻为贯彻《婚姻条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宣传作用，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婚姻法，堪称实践《婚姻法》的一座丰碑。在她不辞辛劳的宣传和带动下，本村年轻人婚事新办。1980年9月10日，我国第二部《婚姻法》颁布，增添了实行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新内容，陇东人历代讲究“多子多福”，她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工作，儿媳妇李永莲也支持婆婆的工作，做了结扎手术。2000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2002年中央电视台和中国评剧院拍摄了8集电视连续剧《刘4儿后传》，讴歌了纯真、高尚、忠贞不渝的爱情。可惜张柏已经去世11个年头了，封芝琴非常难过，她与张柏相依为命49个春秋，丈夫偏瘫在床3年零8个月，她变卖了所有家产、甚至贷款也没能凑足他医疗费。

“我死后，你把我埋在庄跟前，还要照看孩子和你哩。”每当看见那座坟墓这句话就在她的耳边回响，她觉得自己没能把丈夫留住，是她最大遗憾。

电视剧《苍天》，2010年8月13日中央电视台又播出数字电影《刘巧儿家飞来个洋妞》。国人永远惦记着这位陇东土地上生长出的抗婚“女神”，关于“刘巧儿”的故事不断翻新，“刘巧儿”的精神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



2010年9月27日，封芝琴在南梁红色旅游文化节上

一代年轻人。

党组织始终没有忘记关心爱护这位传奇老人，1989年，华池县筹资在她家原住宅的东边新修三孔窑洞，用青砖箍了窑口面，封芝琴搬进了“巧儿新居”。1994年县委、县政府决定新建“巧儿新居”，创办“封芝琴事迹陈列室”，全方位向世人介绍刘巧儿。又在窑洞对面北面北修建瓦房五间，建了大门楼子。新房为“封芝琴事迹陈列室”，分陈列室、休息室、展室三部分，系统展示了“刘巧儿”大半生的珍贵照片、资料和纪念品等。时任县委书记王憨群题写了“巧儿新居”。2003年“巧儿新居”扩建，“封芝琴事迹陈列室”改为“刘巧儿展览馆”。2005年华池县委、县政府举办了“巧儿喜相逢”活动，中国评剧院的三代“刘巧儿”扮演者谷文月、戴月琴、王丽京亲切看望了她。2010年7月30日，华池县投资50万元，在“巧儿新居”附近新建了“刘巧儿事迹陈列展览馆”，“巧儿福居”落成揭牌仪式非常隆重。数字电影《刘巧儿家飞来个小洋妞》首映式：在“巧儿新居”举行。《刘巧儿》生生世世，魅力永恒。

封芝琴这位朴实的普通的农村妇女，凭着她的特殊经历和吃苦精神，红遍祖国大江南北，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浪又一浪“巧儿”热潮。封芝琴如今已年过八旬，身板依然很是硬朗，每天坚持劳动，说起话来有板有眼，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叙述清楚。一身普通农家老太太的打扮，和千千万万个陇东老人一样，平凡得犹如华池漫山遍野的白剑子草。她总是那么刚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困难上不找组织、下不麻烦邻居。凭着她的“资本”完全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但她认为剪剪纸、绣绣花很有乐趣。身为“华池县刘巧儿民间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5年6月，她被中国民间工艺家协会评为“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华池县政府为她编辑出版了《刘巧儿剪纸作品集》，她笑着说：“现在手笨，做得少了，成了个名

头。”意思是空头衔，但又有谁不认为是“品牌”呢？这“品牌”很大，早已是国际名牌了。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不了大事，管好后代是庄稼人的本分，她以身作则，教育儿女尊老爱幼，勤俭节约，损人利己的事不能做。儿女个个自幼品行端庄，连孙子辈都被“巧儿”精神浇灌得“根正苗壮”。2009年5月8日，全国禁毒志愿者在“刘巧儿”旧居进行参观访问，封芝琴被甘肃省禁毒委员会聘为“甘肃省荣誉禁毒志愿者”。开朗、坚守、大度的封芝琴，更不为名利所累，对刘景范、齐心、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探望，她只觉得很感激，却从来没有炫耀的意思，从不提任何要求。2010年9月24日马锡五的儿子马秦宁来看望她，得知她的小孙子工作没有着落时，马秦宁慷慨地说：“我父亲解决了您的婚姻问题，我解决您孙子的工作问题。”马秦宁走后，她告诉我说：“真不好意思。”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2010年9月26日，“中国华池第一届红色旅游文化节”，封芝琴作为华池的“名片”出现在屏幕上时，把整个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名声至红“刘巧儿”，平平凡凡封芝琴，始终为中华儿女的楷模，她的魅力将光照千秋，永放异彩。

参考文献：

《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2。

“陕甘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

《庆阳地区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1。

《封芝琴—刘巧儿》——杨正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4.4。

休言女子何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田书云等

庆阳是周祖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探古溯源，社会经济发展，以务农为基业，人民世代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庆阳有史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殷商时期，商王派大部队伐犬戎；“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秦汉筑长城，设边卡。唐宋将士血染边关……庆阳是西北革命的摇篮，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西北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庆阳人尊师重教，子女知书答礼，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庆阳人讲究情义，待人恩重如山。庆阳女子美丽大方，个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936年12月到1945年8月，红军中央教导师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驻防庆阳，与庆阳人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达8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或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搞磨擦事件，或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渡难关。在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之中，男女青年之间产生爱慕之情，成就了多少美满姻缘。

旧中国封建婚姻严格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庆阳更不例外。再者，当时兵荒马乱，姑娘们面对的是一旦成婚，夫婿或自己随时都有走上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危险，父母岂敢对姑娘的生命或命运不珍视，但庆阳的姑娘们还是奋不顾身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禁锢，毅然决然地同自己心上人结成人生伴侣，一同走上革命道路。她们这种追求婚姻自主和光明信念的精神，数十年来被传为佳话。据了解，这些和部队将士喜结连理的姑娘约有20多位，堪称一个群体。后来，这些夫婿、夫妇们有的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有的因各种原因做了一介平民，还有一些姑娘和她们的夫婿一道成为共和国的功臣。除了前面单独列篇的赵兰香、波涛、崔兰英、刘文英、李

叶之外，还有一部分暂时找不到线索。由于历史线索少，资料欠缺，在这里，仅把找到的有限的资料列举出来，期待关心和熟悉边区时期庆阳姑娘的读者，积极提供线索，以便后期查漏补缺。

田书云

田书云，庆城县人。原家住庆阳县城北大街田家城，出身富户人家。其父田仰梓精明能干，治家有方。母亲胡惠子，是庆城八大家之一、著名文人胡廷奎(贡生)的女儿。田书云自幼聪慧好学，遇事善求教。西大街苏氏与田仰梓是好友，往来甚多，见书云乖巧机灵，求人提亲。由于双方家境相当，苏家一门为人正派，她的父母就包办了这桩婚事，田书云长大后就有些不愿意。三八五旅住进庆阳后，军人办事利落、精神焕发、英姿飒爽的气势感染了她，于是她更加反对这门亲事。苏家眼看着田书云一天天出落得芙蓉花似的，又见本城好几位知书答礼的姑娘与军人结了婚，就一次次催促举办婚礼，田书云也一再借故推托。不久，田书云与住在封家大院内的军人刘殿英邂逅，一来二往，彼此产生了爱情。庆阳城就那么一块地，北边一踩脚，南边都响动。苏家人很快知道了真相，找田仰梓夫妇论理。田仰梓问明女儿真相后，觉得脸面丢尽，于是怒不可遏，当即就对女儿实施了暴打并关了家庭禁闭。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于父母的软硬兼施，田书云始终只有一句话：“非刘殿英不嫁。”

大户人家出身的胡惠子，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影响，一来觉得女儿悔婚，难以答复苏家；二来觉得无颜面对街坊、亲友，一时想不通，便跳北城门楼自杀了。对于母亲的死，田书云悲痛异常。田家办丧事那天，苏家的儿子以女婿的身份参加了祭奠仪式。按常规，日后田书云肯定得嫁给苏家，尽守妇道，可在她竭尽全力的抗争下，还是

嫁给了刘殿英。从与耄耋老人的交谈中，我似乎亲身经历了田书云的坚强和果敢，也尝到了她的泪水，看见了她的笑脸。

更感人的故事是：苏家的儿子也是位令人敬仰的铁血汉子，不久，他就报名参了军，在部队一直很优秀。1951年，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之战。为了保家卫国，争取世界和平，把年青的身躯埋在了异国他乡。不知他是否为庆阳第一位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军人，但他却是在传统观念与新思想的抗争中留下了一段凄美故事的人。

刘殿英（1919—1956），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2月至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陇东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分区司令员，后调入新疆自治区工作。1953年由朝鲜回国后，曾任中央气象学校校长、新疆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西北军区气象处处长等职。1956年在奇台县检查工作时，因战争年代留下的枪伤复发，住进了医院。同年6月的一个夜晚，特务分子潜入医院，用斧子将他头部砍伤，不幸身亡。由于祖国刚解放不久，少数民族地区鱼龙混杂，一些反革命和敌特分子利用一切机会滋事生非，使得这位党的好干部、庆阳姑娘的优秀夫婿，挺过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洗礼的英雄，却倒在了敌人的暗箭之下。

田书云结婚后，就一直跟随刘殿英在部队生活、工作，勤恳、认真是庆阳姑娘的天性。20世纪50年代初，随刘殿英调入新疆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情之所有、情之所依啊！

郭淑英

郭淑英，家住庆城县鹅池洞巷子，出生在庆城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郭维蕃在庆城小有名气，母亲是庆城八大家之一胡老三（胡贡之弟）的女儿。按传统观念讲，作为礼仪之邦的庆阳人，哪个不是维护旧礼仪的孝子，谁人不尊老爱幼？结亲上，查三代，下访为人，是庆阳老辈人为儿女订亲的基本准则。给自己女儿找个了解的、看得见、靠得住的殷实人家，是父母亲一生的心愿，何况郭、胡两个名门之家呢！

三八五旅野战医院，原设在庆城东的麻家湾，离县城有 2 公里左右，战士、群众看病都不方便。待到部队与地方关系融洽后，绅士刘仲邠让出自家的铺面，医院在此设立了便民门诊部，医院派刘云龙和潘医生在便民门诊部坐诊。性格活泼开朗的郭淑英，与门诊附近韩姓人家的年轻媳妇是好朋友，三天两头一起或读书、或做针线活、或交流感情。朋友知道郭淑英喜欢 5 人，又见刘云龙为人正派、厚道，而且又有看病的手艺，就介绍她和刘云龙相识了。郭淑英与刘云龙彼此都有好感，不久便建立了恋爱关系。郭维蕃夫妇知道女儿要嫁给一个没家没舍、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军人，坚决反对他们再来往。郭淑英见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便寻找机会跑到麻家湾军医院里藏了起来，郭家人发现女儿不见了，四处寻找未果，怀疑是医院将人藏了起来。于是，郭、胡两家组织人员，拉着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的韩家媳妇去围攻医院，逼着医院的钟院长强行要人，当时钟院长确实不知道郭淑英就藏在医院里，双方相持不下。一大帮人包围了医院，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不听劝解、甚至与医院的同志发生争斗。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严重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医院的同志朝天放了一枪，郭、胡两家人才在围观群

众的劝解下散去。

不久，郭淑英与刘云龙在医院简单地举行了婚礼，从此成为了三八五旅后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生米虽然做成了熟饭，但好面子的郭维蕃夫妇坚持不让女儿、女婿上门认亲，“就当我们没有生这个女儿！”他们对外人总这么讲。

全国解放后，刘云龙任天津市儿童医院院长，郭淑英也随之在天津市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将成为回忆，或者说成为了一段传说故事，不过有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是自己而已。郭维蕃夫妇也愈加思念女儿了，郭淑英了解到父母亲的心思后，就将他们接到天津，同自己一起生活，直至二老驾鹤西去。

龙彩琴

龙彩琴，庆阳县城人。20世纪30年代，陇东首批知识女性之一。是原八路军骑兵一师师长，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军区分区司令员孙继利的夫人。

龙彩琴出生于一般市民家庭，家住庆阳县钟楼巷。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父亲为人耿直、豁达，母亲勤劳、善良。1930年下半年，父亲受新思想的影响，把她送到第一子弟小学读书，她与赵兰香、边兰英同生长在一条巷子，又与赵兰香同岁，3个小伙伴就这样高高兴兴的一同出人、一同识字、一同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1934年庆阳县城又在县警厅成立了庆阳女子高等学校（高小，开设语文、算术、地理、政治课程），随之龙彩琴、赵兰香、边兰英、樊惠兰（波涛）、贺惠英等又一同升入该校学习。1937年1月，县工委书记蔡畅任主任的“庆阳民众抗日指导委员会、后援会、工人救国委员会、青年救国委员会、妇女救国委员会、商人救国委员会、西街

和北街贫民委员会”等8个委员会和6个支部成立，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宣传工作。赵兰香、边兰英、樊惠兰、龙彩琴等新女性成为搞宣传工作的支柱力量。三八五旅进驻庆阳后，当时的统战工作是教导师、旅部宣传工作人员的新课题，难度比较大，既要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还要向群众宣传统战工作、共产党政策的重要意义，宣传工作难度更大、更费周折。龙彩琴不怕苦、不怕累，刷标语、作演说样样都行，又经校长赵文为的介绍，她认识了孙继利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孙继利，山东省海阳县人，30年代来西安经商，受党的影响，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遂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弃商从军。与龙彩琴认识时，他在三八五旅旅部任科长。

龙富海的思想比较先进，不但送女儿读书识字，也支持女儿给八路军搞宣传，还将二女儿嫁给了八路军的一名军人，对小女儿的这门婚事起初并不太反对，后来仔细一想，觉得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已经将一个女儿嫁给了当兵的，女婿经常行军作战，自己陪着提心吊胆，吃不好、睡不香，岂能让另一个女儿再嫁给军！为此，父女二人经常争吵不休，眼看2年时间了，女儿不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思想更加坚定了。接着，又传出孙继利要调走的消息，龙富海思前想后觉得情况不容乐观。庆城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姑娘与心上人强行结婚的事例，龙家人的事情必须通过商量解决，决不允许来硬的。于是就不让女儿出家门，为了防止女儿乘夜色逃跑，他用凳子在大门口支撑着一块木板当床铺，每晚睡在木板上，龙彩琴见父亲如此认真、坚决，知道走大门行不通，便乘父亲熟睡之际，翻墙出走了。由于她提前同孙继利商量好了，有孙继利在墙外接应，她很顺利地逃出了家，与孙继利成婚，不久，夫妻二人随三八五旅离开了庆阳（1946年）。这故事现在听起来很乏味，殊不知，在那个年代，是轰动庆阳乃至大西北的事，

这就是胆识。

龙彩琴与孙继利结婚后，一直随孙继利在部队工作。在当时文化人奇缺的情况下，她积极从事各项文化活动。为培养部队干部战士学文化，利用空闲时间办识字班、手工制作班等，为丰富部队文化生活、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解放前夕（据龙家人回忆，大约是 1949 年 4 月或 5 月），已是骑兵一师副师长的孙继利，在驻守固原时，趁部队休整之机，夫妻二人回庆阳探望老人。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龙彩琴赤脚穿着草鞋，母亲心疼女儿，给了一双袜子。

新中国成立后，孙继利任骑兵一师师长，驻守平凉、固原、宝鸡一带。60 年代后期，孙继利任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军分区司令员，离休后，他们定居兰州，几年前，已先后故去。

罗云霞

罗云霞，乳名粉娃，家住庆城罗家坑。与庆城开明人士相比较，她的父母思想较僵化，认为女儿天生是别人家的人，不但不可能送出去上学读书，而且从小就得拼命地为父母家干活。小云霞的工作是整天跟在驴屁股后面，为罗家一大家子人推磨、碾米，稍有疏忽，锅里就会没有米下。

1936 年 12 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师进驻庆阳县城，随即，教导师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工作团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庆阳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罗云霞 12 岁，聪明伶俐，干活细致又卖力，已经成了家里推磨碾米的顶梁柱。

罗家住的是崖庄，地势比较低，面朝西河、背靠县粮食仓库，故称“罗家坑”。仓库旁边是县城广场，每逢集市日，周围人赶几十里

路程来赶集，甚是红火。红军女战士白云蕃常常利用集市日组织工人救国会的店员合唱革命歌曲。歌声传到罗家坑里，罗云霞觉得很好听，就一边推磨一边跟着唱，有的歌曲她虽然没记下词，(四)个曲子却能从头唱到尾。一天，白云蕃从罗家坑崖庄畔走过，听得下面有人唱自己唱过的歌曲，调完整，节奏准确，不由得吃了一惊，便立即请求见面。见面之后，白云蕃发现唱歌愿来虽长相、1 不识字的小显。当时人才紧缺，特别是文艺宣传人才稀少，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有天赋的，白云蕃就动员罗云霞参加工农红军的宣传队。能让她唱歌，云霞心里极为高兴，但她的家人却极力反对。因为她一走，罗家一大家子人的食用米面谁去推碾呢？为了防止罗云霞逃跑，他们立即组织人力，在罗家坑的崖上面打了一圈土墙，安装了大门，不许她越出一步。白云蕃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有一天乘风高夜深之际，帮助罗云霞翻墙逃出了罗家坑。由于罗云霞年龄尚小，无法参军，她被暂时安排到陇东剧团（庆城北大街德佑观玉皇庙院内）栖身。在走上革命道路的庆阳姑娘中，罗云霞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与现在 12 岁的小女孩相比较，谁人不对她大胆的举动敬佩呢？

吴志坚，庆阳县城人，是庆城参加革命年龄最小的一位小伙子，家住钟楼巷口。到三八五旅当战士时，还没有枪高。因此，安排在由三八五旅与陇东分区合办的“庆丰源”商店当店员。

1947 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大肆进犯解放区，吴志坚毅然参加了游击队。边区光复后，他与罗云霞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吴志坚在西北军区（兰州军区）司令部工作，后来从师级职务上光荣离休。

刘针民

刘针民，庆城县蔡家庙乡史家店村人。她出身贫寒，但心灵手巧，

聪慧能干。原经媒人介绍、父母包办，她嫁给庆阳县城一杨姓人家。杨家家底殷实，祖辈为人厚道，刘针民本应该过上一份舒适、安闲的日子，谁料婚后不久丈夫就病故了。当时她才十几岁，就成了寡妇，按当地风俗习惯，婚后不久丈夫亡故，属于克夫女子，命硬，一般男子再不敢娶她为妻。按封建礼教，她需从一而终，不能再嫁，她得在杨家独守空房一生。

刘针民初嫁到庆城时，八路军三八五旅已经驻防庆阳，她常常上街听报告，看边区政府宣传队的宣传演出，深受影响。所以，丈夫去世后，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经同乡介绍与三八五旅后勤部科长夏继平相识、相知并结婚，彼此互尊互敬。她跟随夏继平东征西战，共度艰难岁月。刘针民相夫教子，使他们的四个孩子（三子一女）都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夏继平（1921—2003），湖北武汉人，全国解放后，任甘肃省军区副政委。1970年，国家在庆阳搞油田大开发，由兰州军区组建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受党的委派，夏继平调任指挥部副政委、党委常委。1971年2月，他任长庆石油勘探指挥部二分部党委书记。1973年7月回归部队，从甘肃省军区离休。

总之，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庆阳姑娘危难之中识英雄，顽强抗争，最终不但争取了婚姻自主，而且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富有特色的一页。

参考文献：

“庆阳姑娘和他们的夫婿”——《陇东报》第4版，作者刘文戈，2006.12.310

《庆阳县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庆阳县委员会文

卫法史工作委员会编，1999，12。

“三八五旅老干部访谈”等。

写在后面的话

这块土地，质朴而伟大。

这块土地，神圣而亲切。

这块土地上留存着历史的足迹，也记录着现代文明的辙印。探古溯源，都以其朴实的民风、敦厚的诗句、嘹亮的哨音、猎猎的雄风，写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上。

这块土地，饱经风霜，是一块中国革命历史的记时表、中华民族的族系谱。于是，这块土地上刻下了纷繁壮丽的大足印，他们或灿若星河、或可歌可泣。

然而，知男人者众，知女性者寡，中国历史概以如此。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他们以勤奋、善良而著称，但他们也摆脱不掉历史的烙印，对男性，动辄百万字以树碑立传；对女性，在地方文献上最多只给她们方寸之地，算是精英。殊不知，这块土地，养育了男性的粗旷豪放，更滋养了女性的多姿多彩。嫫祖“课民桑蚕”，嫫母德盖群芳，商王“登妇好三千，伐犬戎”……20世纪初，祖国大地硝烟弥漫，这块土地也未能幸免，并肩当大任，成为中国革命血与火的前沿。尽管它沟壑纵横，严寒酷旱，但为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庆阳这块土地上养育的女子犹如这朴实的土地一样，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保存了革命火种。赵兰香、波涛、崔兰英，智勇双全、德才兼备，是冲破封建枷锁、走上光明道路的典范人物，被记入共和国史册。张景文、高敏珍，不远万里，栖息于这片国土，如若凤凰，天人共仰。在艰苦的岁月里，热血燃烧成火炬，在和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南国女子邱一涵用“三寸金莲”走完长征路，又攀登在环县的沟沟岔岔、山山梁梁上，道路是崎岖的，

革命信念却坚若磐石。蔡畅不畏生命危险，领导人民战斗在最前沿，为人类谋求解放。郝明珠数次死里逃生，号召妇女起来革命。李春霖从大东北到大西北，从京城里人们视为稀物的女知识分子到帮助庆阳农民割糜子，挥洒青春于西北，用热血汗水耕耘共和国的大地。谭嵐从大洋彼岸风雨兼程，弃家回国，为挽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们，而今七十多年未谋家人面。采访时她对我说“作为军级干部，不想给党增添麻烦，家不回也罢了”。当我问到当年时，她笑而答：“在庆阳工作四年，是庆阳人民养育了我，是三八五旅收留了我。我做机要秘书工作，不是直接上前线杀敌人，所以对人民没有贡献。后来，随部队参加‘延安保卫战，我仍然是秘书职务，没做出贡献……”朴实得就像这黄土地上的一株草，随处可见。还有争取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凡此种种，都赫然见证着这块土地上女性的生活史、情感史、革命史、战斗史，她们无论是嫣然一笑或是挥戈跃马均震撼着历史，感动着后人，激荡着我的生活，我总想把她们所经历的人间之苦和精神之美，用文字表达出来，以记载中华儿女固有的浩然之气。因为采访时，我不止一次泪流满面，甚至泣不成声，但当我深夜坐在写字桌前提笔时，才深深感觉到文字这东西是乏力的，她们的灵魂岂止一般文字所能描摹，于是顿觉有辜负英烈之羞愧。

研究中国女性史十七年之久，当笔触到生养自己的这块血染的土地时，更加窘迫难安。在这里十分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这本书的人士，特别感谢书中的主人公及她们的亲属们，你们提供的这些翔实的资料将永存于史册。

南梁啊！你这棵梧桐树，引来了无数只凤凰，她们或经枪林弹雨、或在祖国建设的征途上，洒尽了热血和汗水。亦有成千上万的英雄姐妹，她们的身躯和灵魂永远种植在了这片国土里，甚至没有来得及留

下自己的姓名，但她们的英雄业绩、崇高品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2011年3月